

# 中共党史资料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 18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 中共党史资料

第十八辑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封面题字：舒 同

封面设计：马少展

## 中共党史资料

第十八辑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25印张 161,000字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60,000册

书号11310·25 定价1.45元

内部发行



# 目 录

## 文 献

- 关于“三勤”政策 ..... 周恩来 ( 1 )  
附：“三勤”政策是党在国统区工作的一项重要政策  
..... 吴瑞章 黎 勤 ( 4 )
- 陕甘宁边区三三制的经验及其应该纠正  
的偏向 ..... 林伯渠 ( 16 )
- 陈毅同志一九四二年五月七日在盐阜区  
各界座谈会上的演说 ..... ( 52 )  
附：盐阜区士绅座谈会工作经验 ..... ( 78 )

## 回 忆 录

- 抗战前后天津地下党组织和平、津、唐  
点线工作委员会的情况 ..... 姚依林 ( 85 )
- 我在抗战时期的经历 ..... 胡愈之 ( 97 )



- 一次重要罢工的回顾 ..... 周 林 (143)  
 抗日战争中的在华日人反战同盟 ..... 小林青 (151)

人物介绍

- 李维汉同志对统一战线工作的卓越贡献  
 ..... 王刚 李青 余鉴则 (164)

专题资料

- 抗战期间中共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  
 会组织发展概况  
 ..... 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181)
- 抗战时期党在赣南“工合”中的活动和作用  
 .....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198)
- 抗战时期党在国统区统战工作的一些情况  
 ..... 杨圣清 谭宗级 (211)
- 东北抗日联军组织序列  
 ..... 金字钟 常好礼 (226)

# 关于“三勤”政策\*

周 恩 来

“三勤”政策即勤业、勤学、勤交友。

问题一，形势决定策略。“三勤”系一个时期、一个地区、一种情况下党的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其主要根据系决定于当时（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三年）的蒋管区政治形势，即新四军事变<sup>①</sup>后蒋管区由于消极抗战、积极反动出现民主低潮。因此，这一地区的政治形势既不能与抗日民主高潮的解放区类比，也不能与抗日运动并未消沉的敌伪统治区上海类比。因此，这一低潮时期也不能与后一时期——民主高潮时期（一九四四至一九四六年）的政治形势相比。形势既不同，组织形式、斗争形式当然不同。

问题二，历史发展的需要。蒋管区的党经过武汉时期的路线错误，全部暴露无遗。经过一九三九、一九四〇年的疏散、撤退和隐蔽都还未奏效，而皖南事变又起，当时党中央的方针是“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等待时机”，而具体指示是尽量疏散和不要动作与割断关系。我们在当时情

---

\* 这是周恩来同志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七日与廖志高、于江震、杨超三同志谈话的一份提纲手稿，发表时作了个别文字订证。

① 即皖南事变。

况下，力求实现这一指示，还能起某些积极作用；故乃于职业化一项以外，加上学习、交朋友两项；经中央批准定为勤业、勤学、勤交友三项任务，实际上就是“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方针的具体化。故从历史的发展上来看，当时采此策略方针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且在指示时，说到甚至不作声息也是需要的，等待两三年形势就会变的，到那时斗争来潮一到，就可起积蓄力量的作用。交朋友就是如此，这也是对的。

问题三，执行过程的证明。执行此策略方针的历史过程，也证明其成功：一、如承认当时的组织形式不同于上海的组织形式是对的，那何以这种组织形式、斗争形式不同于上海就不对呢？二、办事处直接领导的各组也执行了“三勤”政策，已显然在推动和领导抗战后期民主高潮上起了很大作用，可见不是“三勤”政策之过，而是某些地方（如马子卿、王、李）执行不力的错误，甚至是执行错了的缘故。三、同样由南方局领导而且也执行“三勤”政策的云南党并没发生与马、王、李三处的同样错误，而且一经上级推动，即在民主来潮时起了模范的作用，可见不是“三勤”政策不对，而是执行错了。

问题四，责任谁属。执行错了的责任谁负？首先应归咎于领导者。我在倡导“三勤”政策时，并未象现在说得如此透彻，故在传达上自然会有偏差，这是一。当时情况，重点放在长期隐蔽，积蓄力量上头，自然在这方面说得多点，于是在比重上起了暗示作用，这是二。当时虽有新华<sup>①</sup>

---

<sup>①</sup> 即新华日报。



“团结”栏解释这类文章，但许多隐蔽的同志看不到，没有想别的办法来补救，这是三。等到一九四四年民主来潮的前夜，没能有预见地告诉各地党，在形势变动时改变以前的组织形式、斗争形式，这是四。第五点，南方局后来领导的同志自然也负一部分责任。在执行上的本身错误，如勤业，连本身职业化都未做到；勤学，连报纸都不看，更说不上政治提高；交朋友，与群众毫无联系。这些，自然应由这些地方的领导同志自己负责了。

问题五，有无成绩。执行“三勤”政策有成绩的地方，如办事处各组和云南党不去说它，就连执行不力或执行偏于消极、保守的地方，只要它没有损失党的力量还能保存到民主来潮时用上，也还是它的成绩之一。只有既执行错了，等到来潮时又已一无所有，而且还又反对别人积极参加新的斗争，那自然应该加以清算了。

问题六，这种“三勤”政策，在蒋管区另一时期，另一地区，只要遇到相同的形势而主观力量又曾暴露得很多的地方，仍然会成为主要的组织形式、斗争形式。不过现在蒋管区，政治形势已经是革命来潮前夜，主观力量又已隐蔽多年，故一般地应采两面斗争策略，而组织形式也应采取一方面既能分散隐蔽，另一方面又能集中领导，并使这两方面结合起来的形势，这就要如城工部原草案所说，集中领导，分散经营，各个负责，互不打通。

附：

## “三勤”政策是党在国统区 工作的一项重要政策

吴瑞章 黎 勤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三年相继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在这种严重的局势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为贯彻党在国统区的隐蔽精干政策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勤业、勤学、勤交友”的“三勤”政策，使大后方的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下得以巩固，党员得以埋藏在群众之中，团结群众，积蓄力量，到一九四四年形势好转时，能够迅速有力地投入斗争。

对于“三勤”政策，近年来在党史界和一些革命回忆录中有所涉及，不过说法不一。例如，有的地方文史资料说，“三勤”政策是昆明西南联大的某些地下党员根据南方局指示精神，对学生工作提出的方针和口号。有的又说，“三勤”政策是一九四七年中共上海分局提出并报中央、而后传到全国的。本文仅就有关“三勤”政策提出和执行的情况，作一些介绍。

## 一、“三勤”政策形成的过程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由于中国共产党多年的努力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国民党蒋介石被迫作了一些政策上的转变。九月，国民党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以及蒋介石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和国共两党合作的谈话，使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正式建立。然而，国民党蒋介石的基本思想仍然是反共的。即使在抗战初国共合作的最好时期，也未放弃企图消灭共产党的祸心。抗战开始时，蒋介石在同周恩来的几次会谈和会晤中，就提出过对各党派“唯愿溶成一体”、“中共最好与国民党合成一个组织”、“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退出共产党”等主张，当即遭到周恩来的拒绝。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又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设立了“防共委员会”，将它的政策重心由抗日转向反共。政治上肆意诽谤、中伤共产党，军事上不断制造磨擦进攻事件，在国民党统治区则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大加迫害。

时局的急剧变化，使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斗争方式也必须有所变化。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一年间，党中央逐步确定了隐蔽精干政策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在一九三九年中央关于对待国民党防共的一份文件中就提出：“今天华中工作的一般方针，是要多注意掩蔽力量，积蓄力量，埋头苦干，以待战



争情况之变化。”一九四〇年四月二十二日，中央在给湖南的工作指示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这个方针也被称作“隐蔽政策与精干政策”。为了执行这一方针政策，中央还相应地提出了一些具体政策和措施。例如从一九三九年五月到一九四一年，党中央曾几次就共产党员被迫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发出指示，说明国民党强化“限共、反共”活动，在大后方党政军机关及学校工厂甚至农村，强迫群众表明反共态度，加入国民党。一方面扩大自己的力量，加强其反动统治；另一方面则想通过各种特务方法暴露和打击共产党员，以达到削弱、孤立与消灭共产党的目的。同时指出，为了不致暴露政治面目，保持大后方党员的社会职业与合法地位，地下党员如果遇到强迫受训，强迫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时，不要拒绝与拖延，应和一般社会人士一样去受训、填表，但必须向党组织报告。党组织要加强对党员的教育，以坚定他们的立场。指示还对国民党强迫我党党员进行特务活动等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对付办法。显然，这样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都是为了使党员和党组织能够更好地埋伏隐蔽下来，以便积蓄力量，等待高潮到来时带动群众投入斗争。

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根据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对国民党统治区地下党的工作作了认真周密的布置；对党员和干部按照不同情况，加以分散、隐蔽、转移或撤退；对党在国统区的公开机构，按短小精干的原则加以调整。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在二月三日写给书记处的关于疏散干部的信中讲到，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一百五十多人拟

疏散至六十人，新华日报二百一十六人拟疏散至最小限度四、五十人。

一九四一年五月八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大后方党组织工作的指示》，要求坚决地、勇敢地撤退已暴露的党员、干部，坚决地、勇敢地打破组织上的公式主义，改变联系方式，强调党员独立活动，党员转移时暂时不转党的关系等等。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五日至五月二十二日，南方局召开会议，总结和研究了国统区党组织工作的经验教训，讨论了中央的指示。周恩来在会上发言说：中央去年确定了组织隐蔽、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是很正确的，但这种政治路线是需要正确的组织路线保证才能完成。我们的组织方针是继续发展，所以对过去的经验也要加以检讨。他还说，国民党的政策日益走向法西斯化，即特务化，它的组织政策是实行党化全国的路线。我们的政策就是要针锋相对。我们要撤退已暴露的干部，提拔新干部，这是保存力量的重要措施。但光是这些还是不够的。如果忽视了国民党日益法西斯化这个特点，不及时改变我们的组织路线和工作方法，干部和党员还会继续暴露，党的组织还不能巩固，甚至还不能立足。他指出，要改变公式主义的思想和工作方式。那种认为不联系就不能为党工作的思想是不对的。党员要在社会生根、交朋友、学习——巧妙地实施党的政策来为党工作。在社会生根也就是巩固自己的职业，多交朋友，学会认识社会，鉴别各种人；学习、研究学问，学习主义。十二月上旬，南方局进一步确定，大后方一般党员与干部“以巩固社会地位，加紧个人学习，广泛结交

朋友为中心业务”。这样，“三勤”政策的基本思想就逐步提出来了。到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三日，在毛泽东就整风学习等问题给周恩来的一封电报中，明确地说，大后方党支部的任务是“勤学、勤业、交朋友三项，以待时机”。七月份，在《中央关于取消秘密党的省委特委组织的指示》中，再次指出：“支部每个党员的任务就是勤学、勤业、交朋友。”后来，这三项又被称作勤业、勤学、勤交友，简称“三勤”政策。

解放战争时期，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在转战陕北时曾对廖志高、于江震、杨超三位同志就“三勤”政策比较系统地谈过一次话。他说：三勤是在皖南事变后，蒋管区由于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民主运动处于低潮时期党的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实际上就是‘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方针的具体化。”

## 二、“三勤”政策是一项积极的有效的政策

在国民党统治区民主处于低潮时期，党的地下组织，由于认真地贯彻了“三勤”政策，不仅组织得到了巩固，而且取得了许多成绩。

首先，实行“三勤”政策有效地挫败了国民党顽固派妄图破坏共产党组织，搞垮进步力量的阴谋。

很明显，在国民党连续发动反共高潮，对其统治区人民实行高压政策，企图搞垮我党的一切地下组织的时候，如果不改变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仍然强调不停顿地进攻，



那就是十足的盲动主义，完全中了国民党的诡计。

改变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执行“三勤”政策，也不是没有困难的。当时，相当一部分党员是在一九三八年抗日高潮、国共合作最好时期发展的，他们比较习惯于公开的、热火朝天的抗日救亡工作，不习惯、不会或者不愿意埋头做秘密工作。转入地下隐蔽起来，要在没有组织联系和直接领导下独立工作，一时很难适应。因而产生了一些思想问题和出现了一些错误作法。如有的不肯正视现实，不愿在艰难环境中埋头苦干、联系群众，而将自己囿于小圈子中，思想上感到空虚、苦恼；有的仍想采用过去的工作方式，想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在一份经周恩来仔细批阅过的南方局青年组一九四二年工作总结中，谈到了这方面的情况。它说，在重庆、成都、贵阳有五十多名党员和进步青年发起组织“全国读书会”，以重庆读书会为核心，各地青年朋友为对象，组织分会或小组，以不定期的油印秘密刊物《火与刀》作联系工具。工作任务是“除巩固已有的小组外，广交青年朋友，改进他们的意识，使之热爱中国共产党，并以它的主义作为自己唯一的信仰，尽量设法帮助因失业而贫困的青年。”显然这样做是违背中央的方针政策的。经过南方局青年组多方工作，说服开导，讲明在当时的条件下，组织秘密团体，尤其是全国性的团体，不仅事实上行不通，而且必然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只有认真贯彻“三勤”政策，以交朋友的方式去团结青年，才能帮助一部分青年朋友进步，推动抗战事业的进展，“这就是自己责任最好的完成”。重庆读书会的负责人接受了青年组同志

的意见，取消了读书会 and 秘密刊物，改变了工作作风和方法，这不仅保存了力量，而且形成了重庆市南岸、城内、磁器口三个区职业青年的据点。与此相反，贵阳分会不肯接受意见，不久就被破坏，三十多名党员和进步青年受到牵连。

第二，贯彻执行“三勤”政策的另一个效果就是巩固了党员的社会地位，提高了党员的政治水平，使党员和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和“三勤”同时提出的还有一个“三化”，即职业化、社会化和群众化(或合法化)。“三勤”和“三化”精神是一致的。这就要求党员改变过去那种没有职业到处跑街的工作方式。党员不仅要有职业，和群众一样生活、工作，而且还要勤于业勤于学，要把自己从事的工作做好，当会计的要管好帐，当学生的要念好书。这样就不仅使党员在社会上站稳脚，在群众中扎下根来，而且还学会了一些生产和生活的本领。《新华日报》在宣传“三勤”政策，引导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如何搞好工作和学习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在《青年生活》和《团结》两个栏目中，用指导青年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形式，有针对性地介绍如何巩固职业，精通技术业务，刻苦学习，广交朋友等等。例如《谈青年应有的品质和作风》就比较具体地阐明了“三勤”政策的内容和要求，说明青年“在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尽管今天的学校管理和教育方针有不敢苟同的方面，可是学校有着人类长期积累起来的经验和科学成果，“必须以最大的努力去学习”。对职业青年，“主要任务是精通本部门的工作和技能”，

“不管工作的大小都要按步就班地去做，替自己造就出特长和技能”。在交朋友方面，文章说，“要融合到同学和同事中去”，以“合群、友谊、互助、互学”代替孤独和小圈子。“道义之爱的朋友是人生不可缺少的，是有价值的助力。”还有一些文章如《谈职业青年的学习》、《谈青年的路》、《一种青年人的危机》等，都是针对职业青年和学生的思想，阐明站稳岗位，切实努力，精通业务，把根深深扎在社会土壤之中的重要意义。事实证明，由于执行了“三勤”政策，党员在复杂的环境中就站稳了脚跟，学到了知识和技术，增强了本领。

执行“三勤”政策，还必须进行调查研究。每个党员必须对自己所在的单位或部门进行调查了解，弄清这个单位或部门有什么政治背景？人员的组成情况怎样？有哪些党派团体？领导成员的政治面目和政治态度怎样？周围人的思想状况和兴趣爱好是什么？群众的困难和要求是什么？通过调查，一方面可以向中央和南方局提供情况，便于上级决定政策；另一方面，也使党员学会调查研究、分析情况，学会根据实际情况办事的工作方法。这就大大提高了党员的战斗力和战斗力。

第三，执行“三勤”政策为一九四四年以后群众运动重新活跃准备了条件。一九四四年国际国内形势起了重要变化。国际上，希特勒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后败局已定，日益走下坡路。在国内，解放区战场转入局部反攻，国民党统治的腐朽和黑暗，更激起了人民对国民党的愤慨和不满。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截击，也鼓舞了国统区的人民群众。



因此，一九四四年，国统区的群众运动又逐渐恢复起来。国际、国内的形势虽然是群众运动勃兴的有利条件，但如果没有扎根于群众之中的党的组织的领导，新的群众运动的高潮也是不可能出现的。以周恩来肯定和表扬过的云南为例，皖南事变后的几年中，云南省工委坚决执行了中央的方针和“三勤”政策，隐蔽下来的党员和进步群众，在校读书的绝大多数学习成绩是好的；有社会职业的，也做好自己的工作，因而得到了周围群众的信任。交朋友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以分散的、小型的、生活的各种形式把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这些积蓄起来的力量成为以后爆发波澜壮阔的一二一运动的重要基础。

总之，通过贯彻“三勤”政策，认真落实了党中央的方针，扎扎实实地积蓄了力量，有准备地迎接了一九四四年以后的民主运动高潮的到来。

### 三、“三勤”政策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白区工作原则的继续和发展

党员职业化是二战时期地下党秘密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则，这个原则是在同国民党白色恐怖斗争中逐步形成的。周恩来在白区工作中一贯倡导和坚持这一原则。他在一九三一年年底进入中央苏区以前，在上海担任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和中央军委书记时，在他起草或参与起草的中央给各省关于白区工作的指示信中，都不断强

调党员职业化的原则。

党员职业化是在白色恐怖下恢复和建立党组织的首要条件和基础。一九二七年四月到七月，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扼杀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共产党员如果没有社会职业作掩护，根本不能生存，更谈不到恢复和建立组织。周恩来在一九二九年五月十六日《目前中国党的组织问题》一文中，把指导党员职业化列为地方党部的一项重要任务。他指出，过去党习惯于委派同志去包办群众工作，这些人因为参加革命工作便断绝一切社会关系以至家庭关系。到白色恐怖严重时，这些没有职业、没有社会地位的党员便站不住脚，只好回到党里来靠党生活。由党组织来救济失业党员，这对党来说，不仅不应该，而且也做不到。失业的党员今后必须到社会中去寻找生活，打开工作出路。周恩来同志把党员职业化当作地方党部的重要任务，这足以说明党员职业化具有何等重要意义了。

党员职业化的原则，也是针对当时一些不切实际的党组织机关化提出来的。各地党组织遭到破坏后，往往是要求上级派人来建立领导机关，这种机关因为没有下层组织基础而成为与群众隔离的空架子，有的很快又被破坏。只有坚持党员职业化原则，才能纠正党组织机关化的错误观念和作法。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在为中央起草给顺直省委的指示信即《在白色恐怖下如何健全党的组织工作》中，对这一问题讲得很清楚。信中指出：各级党部必须在“其所管辖区域的下层组织已经建立起来，工作已

有开展”的基础上成立。凡是下层组织没有工作，或是遭破坏之后，主要领导同志要到工厂、农村、社会中去，“寻找职业，深入群众，以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如果先建立起来的上级机关没有基础，只是空架子又不合实际需要，就会使那些无职业、无社会关系的同志围绕在机关周围。“这种人越多，越妨碍党的下层基础的恢复和建立”。

党员职业化的原则，也是为了纠正和克服在党员中发生的一些不正确的思想和观点。当时有一部分没有社会职业的党员不愿意寻找职业，而想依赖党生活。他们认为只有领取党的生活费用，以全部力量做党的工作，做职业革命家，才是真正革命，才是“以身许党”。周恩来在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改造顺直党的工作过程中，曾指出，假使党内尽是这样没有社会职业、没有生活在群众中的人，这简直不成其为党，将成为吃饭的机关了，更说不到革命了。

二战时期提出的党员职业化，是党在白色恐怖下的一个正确的组织原则，是我党优良传统的一个重要部分。抗日战争期间，周恩来根据新的斗争形势提出的“三勤”政策，正是二战时期党员职业化原则的继续和发展。周恩来于一九四一年四、五月间在南方局会议上讲：要实现“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仅研究两年来的经验还不够，还要研究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三勤”正是历史上职业化经验的运用并有所发展。首先，在职业化之外增加了学习和交朋友两项内容，使党员能够广泛地深入群众，团结更多的群众。其次，在职业化方面也较二战时期有了发展，不仅取得职业，而且在工作中要有责任心和创造力，

努力做到精通业务，掌握科学技术，成为本行的专家。因为中国需要真正精通业务而不靠亲戚撑腰的各种专家。这样就进一步提高和深化了党员职业化的思想，为祖国伟大解放事业培养人才奠定了基础。

“三勤”政策是一个特定时期、特定地区的特定政策，它曾在党的历史上起过一定的作用。今天，我们党已经取得了政权，成为执政的党，正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但是，“三勤”政策对于党员和党组织在思想作风方面也有借鉴的意义。



# 陕甘宁边区三三制的经验 及其应该纠正的偏向\*

林 伯 渠

## 一、三三制的选举

一九四〇年，陇东、绥德两个分区试行三三制，先后召集了分区临时参议会，各县临时参议会和政府委员会，一般是经过聘请方式。陇东分区做得比较认真。

一九四一年，依据边区中央局关于彻底实行三三制的选举运动指示，实行了普选。全边区自下而上建立了以边区施政纲领为基础的三三制政权。边区二届参议会大会，给这次选举运动作了政治上组织上的辉煌总结。边区施政纲领、三三制选举和二届参议会，团结了边区内部的各阶级、阶层，改变了边区内部关系的面貌，对全国民主运动起了推动作用，尤其对中间阶级发生了积极影响。

一九四一年的选举，边区各阶级百分之八十以上选民进入了运动，在土地未经分配区域，进入运动的还有国民

---

\* 这是林伯渠同志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的报告。

党。这是各阶级、各党派间的广大团结，又是广大的斗争。斗争的出发点在各阶级、各党派间是不一致的，而在我们则是为了实现合理的团结。当时，这运动对于我们还是创举，由于前无经验，又由于党员和干部中思想准备不足，运动过程中曾经发生过或“左”或右的摇摆现象。然而全部运动给予我们以关于三三制选举和三三制议会的第一次经验，这经验是那么丰富而又生动，同时，这经验又给两年来政权机关的三三制工作留下了许多影响。因此回顾下一九四一年的选举运动，对于我们的研究是有重要意义的。

当三三制选举的号召已经发出，边区施政纲领已经发布，全边区各阶级、各阶层的人民间即反映出他们自己的关心和态度。在土地分配已久的区域，也还有地主和士绅，他们从绝望的地位见到三三制，就多表示出意外与兴奋的心情，例如说：“共产党宽宏大量，仁义治国”；“从前以为革命不要咱们这号人了，今天咱也能管政权”；“迩刻事情真不同了，咱们也有权利，也能干事，同别人平等了”；“真的，迩刻真正实行了三三制了，咱的名字也能上红榜，土地革命时咱可没权”。华池有一个地主感激地说：“三七年选举，咱们没有选举权，现在共产党、八路军、边区政府看得起咱们了，又给咱们选举权，咱今后一定要选好”。农民方面，尤其是贫农、雇农，他们记起了过去如何受压迫，又如何翻身的经验，对三三制政策就多怀着疑惑或忧虑的心情：“咱们流血搞起来的政权，又让地主、豪绅跑进来，敢保不会上当？”“没有他们该可以省去多少

麻烦！”在绥德分区，一部分地区未分配过土地，一部分地区则在土地斗争中经过长期的反复，对三三制的反映就是另一个样子。一部分较开明的士绅，他们赞同我们提出的施政纲领和三三制，愿意同我们合作，但有些观望：“三三制是不是摆个样子？”对于工农积极分子和工农干部，他们怀着传统的成见与不信任，提议“要有一定的文化程度才能有被选举权”。或者说：“民主是好的，但人民文化低，粗鲁简单，解决不了问题，最好还是家庭可以些的人出来吧！”另一部分较反动的地主，起初是不信任，观望态度；随后三三制果然是事实，他们想着机会来了，就马上从观望转为积极，为着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地位出来竞选，口头上“今天的事不好办，谁想出来？”实际上积极活动，“老粗也要上台了，赤足汉要当咱们的上司，得了嘛！”就宣传穷人“不识字，家里又没办法，过去又没干过事，这些人办不了事”，以打击农民。更坏一点的分子，就同国民党特务勾结一气，明里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名单，暗地威胁和欺骗穷人。富农多取冷淡态度，因为“在经济上他们同贫雇农有矛盾，同地主也有矛盾，又担心白军有一天还会开来”，处于两者之间；但有一部分依附于地主一边的。清、绥等地的农民经过长期反复的痛苦经验，很不高兴地主们又进入政权，甚至愤慨地说：“让一些坏东西进来看看咱们的主张也好，但为啥要那么多呢？三分之一呀！”至于土地未经分配区域的贫苦农民，他们热望着翻身，积极参加选举，可是，他们没有选举经验，对地主、士绅们还多少保留着传统的胆怯心理，有些农民“望见财东向自己走

来，手里东西不自主地往下落”。因此，他们，贫苦农民们，就更加迫切地要求党的支持：“你们不作主，咱们啥也不敢言传了”。

边区中央局的指示，在详细分析了边区内部阶级关系及阐明了边区彻底实行三三制政策的必要和重要之后，指出被选举到参议会和政府机关的非党人员，“应尽量做到有各阶级代表，并且的确是各阶级群众自己所拥戴的，而在政治上是赞成坚持抗战坚持团结的（当然，要警觉不要让反共特务破坏分子混入）”，“特别要做到使在群众中有威望的政治上比较进步的非党人士为候选人……必须对每个人作各方面的考查”。因此“要加强党对三三制选举的领导作用”，“要防止在实行三三制选举运动时的各种倾向”，即“不放手做”的倾向与“放弃党的领导”的倾向。但由于三三制的选举在当时是一种创作，在相当一部分党员和干部中，对三三制的认识是不统一的。“党员三分之一，进步分子三分之一，中间分子三分之一”，这个正确原则的认识，当时在干部中并不普及。一部分党员和干部还存在有不正确的看法：“共产党三分之一，国民党三分之一，无党无派三分之一”；或“共产党三分之一，非共产党三分之二”；还有以为是“共产党三分之一，国民党三分之一，哥老会三分之一”的。党内认识不一致，思想有分歧，自然要影响到实践，实际上也发生了影响。但是实际情况究竟怎样，还得从更实际的材料来看，才易明白。

一般地说，从土地革命经历过来的中下级干部和一般工农党员，选举中迁就的倾向是少见的。相反的，他们多



要求按已往的经验办事，不敢放手。许多同志，对地主、士绅参加政权放心不下：“从地主豪绅手里夺过来的政权，流了多少血，怎敢又随便让他们进来！”“大革命时咱们被国民党赶跑，现在实行三三制，敢保不再上当？”个别同志气愤地说：“干脆给人算了吧！”乡上同志讨论候选名单，提到工农分子时，“啊，好成分！”提到某某是地主，大家就低下头去，不做声。下级同志同一般进步群众一条心，对选举顶认真，顶抓得紧，他们的注意主要不是三三制，而是“好成分和公正人”。凡属党组织有基础的地方，一部分地主、士绅和国民党员的当选，如果不是他们平日为人公正，对群众有好影响，那就是由于共产党上级的指名保证：“组织决定要保证，咱们选举就是。”“反保证”（保证别人当选），这是一九四一年选举运动的一个特点。由于下级同志和群众抓得紧，就使得乡参议会的成分中，共产党员和进步力量（从阶级成分看）合起来占着极大的优势。

这种情况，形式上还没有做到三三制，实际上却是合理的。尤其对于土地未经分配区域，那边农民还没有翻过身来（未经减租斗争等等），“十个小参议员斗不过一个大参议员”，倘若地主、富农和国民党员占了三分之一的议席，农民敢保仍是被压迫！实际上，米脂、葭县的某些乡政权，由于我们党组织力量过于薄弱，地主、豪绅或国民党员就乘机占了统治地位（例如米脂全县八十九个乡长中有十六个国民党员，三十一个非党员；银城市与附城区的十五个乡长中，没有一个共产党员，却有六个是国民党员）。农民们对这种政权深致不满，并向我们的同志发出质问：“是

山羊、绵羊之分，还是谷子、莠子之分？”实际上，下级同志抓得紧，并不等于要自己包办，许多县的乡参议员总数中共产党员并没有达到三分之一，下面所指出的八个县，共产党员在乡参议会中平均只占将近百分之二十的议席，最高如合水，也只占到百分之二十九点三。

县 别	乡(市)参议员总数	共产党员总数	共产党员所占百分比
安塞	一一八一	二一七	一八点四
绥德	二八八九	四〇〇	一三点八
吴堡	八四九	二四七	二九点一
米脂	二七六二	五〇三	一八点二
合水	七六九	二二五	二九点三
镇原	五三九	八三	一五点四
环县	九三六	二五三	二七点〇
新宁	五八六	一五一	二五点一
合 计	一〇五一—	二〇七九	平均 一九点八

关于乡政府委员会的情形，一般与乡参议会差不多。至于乡长人选，各县都有一部分非共产党员，在土地未经分配区域，还有若干国民党员当了乡长。

一九四二年的乡选，一般没有改变上述情况，但也有个别县的乡选，表现出特殊情况的，如庆阳四一年选举结果：是共产党员一九六，国民党员四一，无党无派七三二；而四二年选举结果则成为共产党员一八〇，国民党员一〇一，无党无派七三三。

两年的乡选又从另一方面教训了我们，如果我们党组织对选举采取放任主义，抓得不紧，其结果就一定不妙。农民中有积极分子，也有落后分子。落后分子由于对乡议会的作用不认识，又由于怕负担，在四一年乡选中，他们曾经选举了一些二流子和坏人。经过一年的经验，他们看到乡参议会会有权分配负担和决定动员问题，看到二流子或坏蛋当参议员并无好处，于是进了一步。在四二年选举中，他们不选二流子或坏人，也不选积极分子或公正分子，而选一些老好人或能“抗上”的人。积极分子中也有怕误工、怕惹人，而活动落选的。所以，就在农民中，也需要党出来保证党的和非党的积极分子当选。四二年安塞乡选运动中，出现过这样的事实：某乡议会中，共产党员原占三分之一，改选时党组织决定不保证党员，只保证两个地主，结果地主没选上，积极而公正的共产党员也被选掉了。由此证明，强调党组织不要保证自己人当选是不对的。说在新区，只要形式做到民主，毋须区别好人、坏人，就更其错误，更其危险。葭、米经验（见前）如此证明，其他地区的经验也如此证明。例如吴堡岔镇一乡政府委员中，混入了特务分子；又如镇原三区清水乡全部政府委员和乡长都是地主、富农；又如庆阳市五个乡的选举结果，乡议员中共产党员五个（本来只有五个共产党员），国民党员却有八个，乡政府委员中共产党员四个，国民党员却有七个。四一年和四二年两次乡选结果，确有一部分乡政权（主要是土地未经分配区域），混进了土豪劣绅和其他坏分子，并为他们所把持。前年高干会后，经过减租运动、

生产运动和防奸运动，大都改过来了。

从一九四一年和四二年的乡选经验中，可以获得关于乡政权人员分配的规律：（一）乡（市）参议会和乡（市）政府委员会中，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二以上，中间阶层的开明分子占一部分；（二）乡长中共产党员占大多数，其次为非党进步分子，中间分子中真正公正并愿意接受党领导的人，也可以充任乡长。这规律形式上与三三制有出入，但其基本精神则是三三制的。它是大多数人民的创造，又适当地反映了边区内部的阶级关系。在土地已经分配区域，可能分配到这种程度，因为中间分子的数量不太多；在新区则以这种分配比较合理，因为那里的地主阶级在经济上和社会地位上的比重相当大，不如此，不足以防止豪绅、地主把持乡村政权。

四一年的选举运动，同时又使县级三三制普遍建立起来。边区二届参议会后，因陇东及延属各县共产党员所占位置太多，不合三三制，又于四二年实行改选，或用退出（共产党员）与增聘（非共产党员）办法以调整之。从阶级结合的关系看，县参议会比乡参议会有不同之点，这就是在县参议会内，除共产党员外，进步势力的成分相对地减少，中间势力的成分相对地增多。（新区更明显，例如：绥德县参议员的成分：地主二二，富农二六，商人一二，中农六〇，贫农六九，雇农七，共二〇六）。县政府委员会内和县常驻会内，这种比较更来得明显，除共产党员外，主要就是中间分子。例如延属市（改选之后）政府委员十一人，五个共产党员，四个中间分子，一个落后的小资产



阶级分子，一个外籍学生；常驻议员五人，二个共产党员，二个中间分子，一个进步分子。延属县（未经改选）政府委员十五人，八个共产党员，六个中间分子（一个坏分子），一个进步分子；常驻议员七人，三个党员，三个中间分子，一个进步分子。甘泉县（改选后）政府委员九人，三个党员，四个中间分子，二个进步分子；常驻议员五人，二个党员，二个中间分子，一个进步分子。除共产党员外，在乡参议会和乡政府委员会内，从进步势力中来的代表，要比从中间势力来的多；而在县参议会和县政府委员会内，则从中间势力来的代表，要比从非党进步势力中来的多。三三制形式，主要在县级以上政权表现出来，中间分子在县级政府机关中占取三分之一乃至更多一点的位置，对于争取边区和全国的中间势力有重大作用。在这方面四一年的选举和四二年的部分改选，是有成绩的。但是有几点：第一，非党进步分子所占位置太少，影响政权机关同非党群众的联系。同时使他们觉得我们太信任绅士们，“还是他们吃得开！”第二，更重要的缺点则在于吸收进来的中间分子中（当时都看作中间分子），良莠不分，混进了一些反动分子与特务分子，“利用三三制以破坏三三制”，对于政权与人民的联系，对于党与非党人士的团结，给了某种程度的损害。在新区好几个县的县议会、常驻会与政府委员会内的人员分配上，似乎真正实行了“共产党一分，国民党一分，无党无派一分”的误解，请看下表：（见下页）

中间分子和国民党员之进入县级三三制政权，大都经过三种形式：一部分是经过人民自动选举，因为他们平日

县 别	机 关	共产党	国民党	无党无派
庆阳	议会	二三	一七	二四
	常会	三	二	四
	政会	三	三	三
合水	议会	二〇	一四	二七
	常会	二	一	二
	政会	三	三	五
镇原	议会	二〇	一七	一二
	常会	二	×	三
	政会	三	×	六
郿县	议会	×	×	×
	常会	三	四	二
	政会	四	四	四
清涧	议会	五四	三三	六七
	常会	三	二	一
	政会	七	三	一
绥德	议会	五五	五〇	一〇二
	常会	三	三	一
	政会	五	七	一
葭县	议会	×	×	×
	常会	二	三	×
	政会	三	四	二

为人公正，有好影响；另一部分经由党组织指名保证选出；还有一部分则为上级所聘请。保证和聘请在当时都是必要的，问题在于思想、认识方面有毛病。而思想、认识方面的毛病则在于：（一）对中间分子和开明士绅的实质缺乏明确了解，从而对一般上层分子和旧社会有地位的人

缺乏开明或反动的区别；（二）对边区内部国民党组织的实质认识不清，从而对国民党员不加以中间分子或反动分子的区别，一部分公开反共分子也拉进边、县参议会或县政府委员会；（三）对进步分子之物色未加重视，于是“凑数”就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左”倾情绪也赞成凑数的办法，“三三制不过摆摆样子，对外好影响……拉几个上层人物凑凑数吧！”边区二届参议会后决定一部分地区再改选、“补选”的时候，对于年前的选举经验似乎未曾深刻检讨，改选的精神集中在形式一方面，片面地强调共产党员退到三分之一，而对其他三分之二的分配，则缺乏明确的指示。形式是重要的，没有它就没有三三制，但如果内容被忽视了，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三三制。“四一年选举，陇东分区搞得严格，谁是进步，谁是中间，都有研究。边区二届参议会后，说我们抓得太紧，要再选举，为要凑数，就聘请了一批，现在看来，有许多是坏人。”这是一个严重教训。

在县一级，由于选了一批中间分子和开明士绅，由于共产党普遍地约束了自己的位置，同时也选进了一些进步分子，确实把三三制建立起来了。这是重要成绩。其缺点，则在于非党进步分子太少，而中间分子中又混入了一些反动分子和特务分子。边区参议会的情况（准备另行详细研究），大体上与县参议会相同，常驻会与政府委员会，则基本上是共产党员和中间分子组成。上述缺点在初次建立三三制时，是难以避免的。倘若没有这类缺点，三三制的力量与作用一定会比现在表现出来的更大一些。

如何识别中间势力和中间分子，是必须搞清楚的问题。在三三制人员分配中，最容易使我们弄糊涂的，首先也就是这个问题。边区二届参议会前后，有同志把一切上层人物看成都是中间派，甚至把国民党员也看成都是中间派，没有把反动分子从中间分子之中区别开来。而现在尤其经过去年反特务斗争之后，又有同志把真正中间分子看成反动派，把所有国民党员看成特务，没有把中间分子从反动分子之中区别开来。二届参议会前选举出来或聘请进来的上层人物，绥德分区在数量上首屈一指，比起其他分区缺点较多成绩更大（编者注：原文如此）。可是现在又可以听到这样的说话：“那边的地主、富农都是仇视我们的，谁是中间分子，大成问题。”偏左偏右，把中间分子估计成反动分子或进步分子，或把反动分子估计成中间分子，都是不对的。富农算不算中间力量？商人算不算中间力量？有的说能，有的说不能。抽象地问抽象地答。形式上可以安排问题，实质上不能解决问题。我们的主要弱点是对原则没有完全掌握，对实际缺乏具体分析。识别中间分子应该从阶级关系来看，又从政治态度来看，又从个别人物的本质来看，才算全面。要把反动分子、中间分子、进步分子，作一种比较的观察，才能确定。什么是中间势力？一般地说，就是开明绅士，亦即地主阶级的左翼，中产阶级，亦即资产阶级的左翼，并还有地方实力派。在边区，主要的就是地主阶级左翼，其次为中产阶级。他们的政治态度：“关于中产阶级及开明绅士，他们可以同我们共同抗日，也可以同我们一道共同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但不能进步到土



地革命。在对顽固派的斗争中，有些人可以参加一定限度的斗争，有些可以保持善意的中立，有些可以表示勉强的中立”（中央）。什么是中间分子呢？一般地说就是“不左不右的中间分子……他们代表中等资产阶级，与开明士绅”（中央）。“不左”以区别于无产阶级与一般小资产阶级，“不右”以区别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与顽固派。我们要分给他们以三分之一位置的，就是这类不左不右的人。至于“国民党是一个由复杂成分组成的党，它有顽固派，也有中间派，也有进步派，国民党并不就等于顽固派”（中央）。边区内部的国民党员中，确实还有中间分子，也许有个别进步分子。照上面一般阶级关系和政治态度的分析，边区内部，尤其土地未分配区域，中间分子的社会基础及其数量还是相当广泛的。在土地已经分配区域和未分配区域之间，又有颇大的区别。在土地未分配区域，地主阶级当然存在，有中间势力，也有反动分子。商业资产阶级中，也有中间势力与反动分子之别。富农一般属于中间势力。在土地已经分配区域，地主阶级虽已不存在，但有地主出身分子，其中有许多属于中间势力，新起来的商业资产阶级，一般属于中间势力，新起来的富农（由贫农、中农上升的），则一般属于进步势力。至于知识分子也有中间、进步与反动之分。在确定谁是中间分子的时候，应该看看他的阶级关系，又看看他的政治态度，看看他的历史，又看看他的现在。总之要掌握原则，又要具体分析。

经过伟大的生产运动，经过彻底减租运动，经过自卫运动和防奸运动，不但在基本群众中，涌出了成千的非党

积极分子和劳动英雄，而且中间势力和中间分子也经过了相当严格的考验，反动分子也有了进一步的暴露。在下次选举运动中，我们一定能够而且一定要更多地选举非党进步分子，更好地选举中间分子，但决不能选举反动分子，以使边区三三制政权建立在更实在更合理更健全的基础之上。我们一定要这样做，而且现在就要开始准备。研究过去的经验，是准备工作的一种。除此，应该：（一）对已经参加了各级政权的党外人员，加以各别的具体的研究，熟悉他们，以便在下届选举时有可能决定适当的去取；（二）团结党外劳动英雄和积极分子，培养他们，从中间势力中发现新的开明分子，团结他们，为下次选举准备新的力量；（三）乡参议员与县参议员中有真凭实据的坏分子，应提交选民撤换改选之。

以上是关于三三制选举方面的经验，下一部分就来研究三三制政体方面的经验。

## 二、三三制的政体

政体问题就是民主集中制问题，就是政权组织多元化还是一元化的问题。

边区二届参议会前后，曾有同志主张二权论，或二权半论。“议行并列”是之谓两权，加上司法半独立则为两权半。

司法审判该独立，因此，司法机关在政治上虽应受政府领导，但在行政上则要保持独立，这就是司法方面应该

取后半权的理由。前年高干会批评了“司法独立”的倾向之后，这倾向在思想上和实践上都有改正，司法机关及其工作已经统一在政府领导之下。

“议行并列”亦即两权并立的二元论，在前年高干会上也曾受到批评。但因为各级参议会的选举条例及组织条例，非依法定手续，不便修改，这问题在组织上迄今尚未彻底解决。“议行并列”的思想，在二届参议会以前即已存在，二届参议会至前年高干会期间，则思想上的分歧与组织上的混乱，更加发展了。思想上：（一）误解三三制与苏维埃制之间的“很大的实质上的不同”，不仅在于阶级结合的变化与我党政策的改变，而且也在于改变民主集中制为“县与边区两级议会与政府并列，与一般民主国家制度相同”；并分别参议会为“权力机关”，政府为“政权机关”（正确的认识：参议会和政府都是政权机关，而政府机关又一定是而且不能不是权力机关）。（二）参议会是政府的监督机关（或制约机关），“本来参议会与政府并列，议会监督政府，理由是怕政府专权渎职”（参议会又从权力机关降为监督机关；参议会以自己的决议为基础，选举自己信任的人去组织政府，又怕他专权！）而在三三制时期，则“不同利益阶级合作的统一战线政权，需要有独立的监督机关”（作为监督机关的参议会也就是“不同利益阶级合作的统一战线政权”）。（三）常驻会是参议会的代表机关，“常驻会是参议会闭幕期间的唯一民意机关（参议会选出的政府却不能代表民意！），它的工作就是代表参议会完成其议事管事的工作”（不止于监督）。于是在组织上：（一）

边区常驻会对县参议会（或常驻会）、乡市参议会，县常驻会对乡市参议会；同样，下级参议会或常驻会对上级参议会或常驻会都要经常取得联系。“常驻会可分工到各县各区乡出席各级参议会，指导与了解人民生活情况及其要求”。（二）“每县的边区参议员应组成小组，两个月会商一次，汇集意见，送边参常驻会审议，转达政府”。“各行政区的县参议员组成小组，他们除按时集会向县常驻会反映意见外，还可参加该区乡长联席会议”。（三）在乡村中一方面有自然村与民选村长，又方面有与之并立的由乡参议员领导的居民小组。由此，不但各级参议会与其同级政府并列，而且逐渐形成了参议会系统与政府系统的并列。

我们必须从二元论回到一元论，即从二权并立论回到民主集中制。必须承认参议会和政府都是政权机关，都是人民的权力机关。对政府而言，参议会是最高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而在参议会闭幕期间，由参议会选出并对参议会负责的政府，就成为该级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

民主集中制在乡上与在县级以上的运用应该分别加以研究。

在乡上：

首先应该取消居民小组的制度，因为它有三弊无一利：（一）“乡市参议会每二十人至六十人的居民小组得选举参议员一人”的规定，圈子太小，不能适应三三制选举所需要的成分的调剂。以后应该依地区（一个大自然村，几个小自然村，或一个行政村）划分选举单位。（二）这制度



是模仿苏维埃时代乡代表和管理一定居民的成规，但那时是工农代表制，现在是三三制，阶级结合已经不同，现在也实行乡议员代表和管理一定居民的办法，就不合时宜，就等于让一部分不良地主去把持村政权，实际经验曾如此证明了的。（三）一方为自然村长，另一方为居民小组长，违背了民主集中制。

其次，前年高干会前，某些地区为要实行“乡市参议会采议行合一制”，行政村主任和自然村长一律由乡议员兼任，这办法同样便利了一部分豪绅、地主把持行政村和自然村的领导权。“简政实施纲要”有鉴于此，明文规定，行政村主任采委任制，自然村长采选举制。看人说话，可以是议员，也可以不是议员。从此，参议员只有经过委任或选举的，才兼任行政村主任或自然村长，这规定的合理性，已由绥德分区经验所证明。其他地方，还没有完全执行这规定。以前乡政府委员会，下设有经济、文教、优抗等委员会，由各委员任主任。但实际经验证明，这类组织有名无实，去年决定暂时取消它，是对的。

去年许多地方的乡参议会比前年更为活跃，生产、征粮、防奸与整理民兵等大事，都开了参议会。开会时参议员、政府委员、村主任、村长都到，支部干事也参加，叫作“一揽子会”。大家议、大家决、大家分工、大家去作，无分于党员与非党员，也无分于议员与非议员。议员兼了村主任或村长的，固然加重了职权，不兼的只要肯到会，肯负责，也是有职有权。总之，议决哩，一揽子，执行么，也是一揽子，“大家动手”。这种方式又民主，又集中，合

乎三三制精神。能解决问题，能办好事情。没有形式主义，也没有教条主义，它是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我们应该接受这种方式，并把它传开去，使它合法化。只要在几点上加以确定：（一）用乡参议会的名义。（二）除议员、村主任、村长、自卫军连长、支部干事外，还可吸收党小组长、劳动英雄、防奸英雄等参加。（三）保持大家议，大家决的习惯（已成习惯法），不必搬用有表决权与无表决权的教条。（四）提倡大家分工负责，人人执行决议的精神。（五）建立领导会议的党的核心，三至五个人就可以，或由支干会担任，或另行组成（郟县防奸运动中，是由支书、乡长和防奸主任三人组成核心），以保证党的领导，但必须是群众中有威信的党员才便于随时影响非党群众。

这个照顾了三三制的一揽子形式 还没有普遍采用，还有些地方“乡参议会前年还开会，去年以来就不开会了，只开村主任、村长联席会，不兼村主任或村长的议员，就不通知他到会”。这样无形中把参议员取消了，这是缺点，应该改正的。

全乡的群众性的大事，开参议会的大一揽子会，是最好的形式。但不能所有事情，都开大一揽子会，有些事情可以开乡政府委员会的小一揽子会（乡政府委员会是表现民主集中制的形式之一，又可照顾三三制，而如果乡长是非党员，又可在委员会中选进党员。去年决定不要乡政府委员会，似不妥当）。例如生产、征粮等大事，经过参议会布置下去之后，需要检查；又如某些临时重要任务，需要布置或传达下去；又如某些比较重要的事情，需要作决

定，这时召集自卫军连长、指导员、行政村主任及其他有关人员参加的乡政府委员会小一揽子会，就是合适的和必要的。而如果是讨论合作社问题，就可以吸收与合作社有关的积极分子参加，讨论变工队问题，就可以吸收变工队方面的积极分子参加，其他以此类推。在小一揽子会上，同样要形成党的领导核心。

再次，日常政务上有些事情，乡长不便单独作决定时，可以找自卫军连长、支书、文书等乡级负责干部商讨。此种形式，名之曰政务会议，也是可以的。

另一个问题：居民小组取消之后，不兼村长、村主任或其他固定工作的乡议员，他们平日是否应该有所活动并如何活动？绥德分区的经验是这样：乡参议员团结在村长的周围，受村长领导，参加各种工作。这经验是值得介绍的。

一个缺点：去年，有些乡长和行政村主任的调动或撤换，未经过乡参议会；又有许多乡参议员撤销了，也未经过选民的罢免与改选。乡上是直接民权，这个原则不仅要在议决复决上表现出来，而且要在人员的罢免与改选上表现出来。这一层，还需要做许多宣传教育工作，县、区政府尤要注意从实践中来教育群众。

乡上问题说到这里止，以下说县、边区两级的问题。

县参议会和县政府委员会的活动，前年满起劲，到去年就冷淡下来了，县参议会都未开。因试行农业累进税，经边区政府指定庆阳、绥德和延安召开县参议会也未照办。上半年县常驻会和政府委员会还有照常开会的，下半年防

奸运动起来后，开会的就更少了。常驻会和政府委员会有的是分别开的，但实质上多是一个内容，两套形式；也有合在一起开的，也是一种形式。去年春冬两季，边区常驻会和政府委员会各开过两次会，头一次分别开的，后一次是联席会议。

前年高干会后，作为二权并立的常驻会，实质上已改变，但形式上仍然存在，以县为单位的边区议员小组，以区为单位的县议员小组，也无形中取消了。但问题尚未彻底解决。

关于常驻会，照过去经验，大致有两方面工作：一方面，向政府反映人民意见，或提出某些建议。这方面做得不多，成绩不大；又方面，听取政府工作报告，或通过它交来的重要决议和法令等，这方面形式居多，作用也不大。同议员取得联系，反映民间意见，确属重要，但这些工作不必设常驻会，只要有常驻议长，就办得了。至于批准或否决政府之施政方案、工作报告和法令等，则是参议会大会的权力，三几个常驻议员不能有此大权。且就人数说，常驻议员一般少于政府委员三分之一，同为参议会所选出，并对参议会负责的机关，而常驻会却对政府委员会有批准、否决之权，于法理也属不合。提议边、县两级常驻会取消，政府委员会即为常驻会，名额可以扩大些，注意三三制成分和地域上的调整。

参议会大会和政府委员会开会时，出色的模范工作者和劳动英雄、党政军各方面的负责干部，必要时也邀请出席。开会期间党团为领导核心，或同级党委直接为领导核



心。关于路线、政策和方针上的问题，党内先讨论，而政权工作范围内的一般具体问题，则均在会上讨论。这样作，将使领导与群众间的意见有适当的结合，各方面工作中的经验有必要的交流，党内党外的政见有更好的沟通。这样作，将使三三制的形式更为完善，其内容也更加充实。这种形式将更能保障群众，特别是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更大地发挥。

如果各级参议会和政府委员会真实成为解决问题进行工作的机关，那末，这种会议就有多开的必要，也不会是形式的会议。提议县参议会半年一次，边区参议会一年一次，两次参议会之间，各开政府委员会一次。

今年作为过渡时期（因为制度上的重大改革，有待于下届边区参议会），县参议会需要开一次，吸收县区干部及出色的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列席，或者与下半年的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同时开。今年可考虑边区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和边区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大会，同时召开，并有时合开。

关于三三制政权中的民主集中制问题，可以说到的就是这些。上述问题的基本精神，是贯彻政权机关的民主集中制，并使政权机关成为更充实的权力机关。这样作，要求各级党组织对政权工作的领导更有远见，尤其各级政权工作的党员，要时刻警惕和防止对党闹独立性的倾向。另一方面，也要求各级党组织和政权工作领导的灵活性，照顾三三制政策，注意使政权机关及各级参议会形成为唯一的权力机关，不代替政权，不直接去进行政权范围的工作，

否则也可能形成二元化或多元化政权。

三三制政权的形式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带着基本性质的问题。我们现在就是要找到这样一种适当的形式，这种形式既能保障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没有阻碍地充分地发挥，又能不致使作为中间分子的地主、资本家难于忍受；既要能够充分反映工农群众的要求与利益，又要能够反映地主、资本家们合理的要求与利益；既要能够密切联系广大的工农群众，又要能够集合适当数量的一定地主、资本家阶层代表。它是唯一的权力机关，是说了就做的“议行合一”的机关，它是不能为其他任何组织形式所代替的。这也就是目前在中国行得通的、集中一切权力的、最高度的民主的机关。这种形式，在我们目前所已找到的一揽子会中，是相当具备了上述这些特点的。在今后，我们要使它更加完备起来，并使之普遍起来。

从整风以来，我们曾经在党内充分地发扬了民主。许多干部会、座谈会等曾经多次地举行，批判与讨论之热烈，前所未有。因而区别了良莠，团结了党，并使党的干部和党员积极活跃起来。这种民主形式，不只是应该在党内发扬，而且应该在一切革命人民中发扬，才能更进一步的团结人民，并使人民更进一步积极活跃起来。今天，我们党内的情况更加一致了，提高了。在人民中又经过了土地革命（在边区）、减租减息、生产运动、防奸运动等，我们的党与人民有了更进一步的结合，人民的觉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因此，我们不怕在人民中发挥充分的民主，不怕将一切的重要问题、重要设施，提到人民中去作充分的讨论

与批评，并由人民大家动手来做，也不怕反动分子利用这种民主来进行反党反政府的活动。只要我们不犯严重的原则错误，这样作，对于我们是不怕有什么危险的。相反，这将使我们党更密切地与革命的人民结合起来，暴露反动分子，提高人民的觉悟，并在人民中提高党的领导作用，提高党的威信。在政权与党的机关中，清洗官僚主义及一切弱点，而使党与三三制政权更加健康起来，这是我们目前提高自己、团结人民最有效的办法。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的各种弱点就很难清洗。

在三三制政权中，党员与党员之间，对于一切政策与关系重大的具体问题，应该采取完全一致的立场与态度，不能有所分歧。非如此，党就不能对三三制政权实行领导。党员与党员之间尤其不能有互相攻击、互相排挤等现象（如果发生这种分歧和现象，党委与党团应立即加以约束和解决）。这是必要遵守的法律，不能丝毫通融。但并不能因此就说，对于一切个别的、具体的、技术的问题，在三三制政权中党员与党员也不能有任何不同的意见，及正当的辩论。如果被约束达到这种绝对的程度，就要使大多数党员在三三制政权中不能充分地活跃起来，因而也就要使党外群众及政权机构不能充分活跃起来，使他们受到过多的拘束而死气沉沉与照行公事。这种情形正是我们目前所要避免的。在三三制政权中的党员，对于一切问题，在基本方针与基本态度上完全一致的前提下，应该允许所有党员从各个侧面去发表意见，进行讨论与辩论。这一点，也是应该加以指出的。

### 三、三三制的团结与斗争

三三制建立后，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经验，大致可分两个时期。如一部分分区和县上负责同志座谈会上所反映的：“前年，只顾团结，迁就多；去年，又丢了，没有管”。这反映可以代表相当数量的情况。

迁就了什么？在某些政策上，如减租问题，某地“当时没想到地主不减租，只说农民抗租，并在报上批评农民过火，别人说农会不好，就把农会取消”；农民说：“地主怕农民，农民怕政府，政府怕地主”。如教育与司法工作中的国民党化倾向（主要是主管机关）。在制度作风上，如偏重形式，轻视内容；如议行并列，强调正规化等。对党外人员只有团结，没有必要的批评和斗争，这种情况相当普遍。

前年“有些右”，在地方上的情形应该这样看：“政治上的迁就并不多，只是个别部分的情形，主要是对一部分党外人员的错误或不正派作法不加说服和批评，对坏分子采取容忍态度”。这情形，一方面，由于对所谓中间分子认识不明确，换句话说，有右的认识；又方面，也与这种心理有关：“主人总是我，他们总是客，表面上恭恭敬敬，宾礼相待，骨子里还是讨厌的心情多。”换句话说就是右中有“左”。

“去年丢了，没有管”，提到有什么经验，大家都说不上来。“丢了，没有管”，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此次座谈会



上一个分区负责同志这样说：“去年一年没谈起过，县参议会没开，常驻会也不开。精兵简政，县区干部从新配备一下，乡政府大部换成党员。去年工作繁忙，中心放在生产、防奸上去了，但认识上对三三制也起了变化，县以下干部完全忽视了它，以为这政策实际上已结束。前年有些右，去年又有些左，去年让其自流，经验讲不出多少。”

去年“有些左”，大致情况是这样：对三三制很少谈论，或没有谈论它；对中间人士冷淡起来，甚至可有可无；对组织形式（常驻议会、政府委员会等），少一点好一点，“工作总是靠我们做”。前年高干会上，对三三制中迁就现象的批评，有些同志是以“左”的情绪来了解它，或接受它，实践起来就转到对三三制的消极态度。去年的整风防奸运动，教育了我们的党员干部，也教育了非党人员，一部分中间人士确实从生产运动和防奸运动提高了一步，更加认识党的正确，信任党的力量。但另一方面，也有一部分同志发生了对党外人员的一般不信任和一般消极态度，还有一部分党外人员（坏人除外）对我们有误解，或存着恐惧心里。

一般说来，由于去年整个工作的进步，特别由于生产运动、自卫的政治运动和防奸运动，一部分党外人员（进步分子和更开明的中间分子）更加靠近我们，认识我们和相信我们；一部分坏分子则被清查出来，清洗出去，三三制政权比以前更加巩固了。但又要注意，还有一部分党外人员，由于我们的工作不够，或有缺点，对我们存着或多或少的猜疑恐惧心理，彼此之间，有些疏远和不信任。

在三三制的团结与斗争的经验上，值得提起的，有以下问题。

(一) 党中央关于三三制人员分配的原则是：共产党员三分之一，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这是按照三三制中共产党员与其他阶级代表的相互关系上说的，若按照整个党的政策与实践来说，则是代表整个赞成抗日与民主的人们的利益）；非党进步分子三分之一，代表小资产阶级；不左不右的中间分子三分之一，代表开明士绅和中产阶级。这原则需要再度向党内解释，尤其在下届选举时。解释这个原则之所以必要：第一，是为要纠正某些同志对于共产党员外三分之二的人员的误解与糊涂观念，如不懂得物色真正的中间分子，不注意物色非党进步分子等。第二，是为使党员和干部更明确地认识“上述人员分配是党的真实政策，不能敷衍塞责”（中央）；“一党包办”的观点是不对的，“凑个数算了吧！”的观点，也不对。第三，这原则是党争取各抗日民主阶级共同合作，实行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具体形式。因此，党外人员之参加政权，应该是真正的有职、有权、不是来做客，而是和我们一起做主人。边区的特点是这样：“天下是共产党打下来的”，并经过工农专政的时期，对于新民主主义的创立，中间分子一般没有出过力（就边区说），有的还采取敌对态度；三三制实行，他们也要参加政权，有些党员和干部就觉得不舒服，组织上决定，只得服从，就“凑个数吧！”或者“他们总是客，咱们总是主人”，甚至“把党外人员当作工具，当作幌子，需要时捧一捧，拉一拉，不需要就无形中丢了”。这类情形和观点，如

不纠正，真正充实的三三制就难以建立起来。另一方面，事实上，边区是我们创造起来的，施政纲领是我们提出来的，实力在我们手里，基本群众在我们一边。这种情况使得党外人员的心理上容易形成一种主、客之感，与观望态度。因此要消灭主客界限，使党外人员感觉得自己也是主人，就首先而且主要靠我们负起这个责任，这里有职、有权，就是解决问题的首要关键。第一，要给党外人员以适当的职务，参议员和政府委员中，能够工作的，要尽量吸引他们参加适当的工作。除此，还要尽可能照顾到：“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施政纲领）。要这样作，除开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外，还存在着实际上的矛盾，即党外人员，尤其中间人士的工作效能，与精简政策间的矛盾。去年三次精简时，未能适当地解决这个矛盾。目前，在乡一级，我们要团结党外参议员参加工作，让支部同志学会团结自己周围的非党积极分子，尤其是担任乡长、村长、村主任的积极分子，诚恳帮助他们。向在区以上各级政权机关，提议从进步分子和中间分子中物色二三百党外人士作职员（即增加这批职员），有适当条件的可以任副科长、科长、副区长、区长以至副县长。为了在实际中培养一批非党干部，财政上多开支一点，也值得。第二，要尊重党外人员的职权，一方面在其职权范围内的事情，放手让他去做，同时帮助他完成任务，以提高其积极性和责任心（这层特别重要，真心同我们合作的人，希望做出成绩，恳切地期待我们的帮助）；有成绩，给以表扬，有缺点，帮助他改

正。总之，不可遇事包办，还要积极帮助人家。又一方面，要“提倡民主作风，遇事先同党外人士商量，取得多数同意，然后去做。同时，尽量鼓励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和议案，并倾听他们的意见。绝不能以为军队、政权在手，一切都要无条件地照我们的决定去做，因而不注意努力说服非党人员同意我们的意见，而心悦诚服地执行”（中央）。此外，一般参议员和政府委员，他们散居民间，凡属平日为人公正热心的分子，如同他们取得经常的联系，平时委托他们帮助某项工作，临时委托他们帮助某项工作，都能起一定的作用。

（二）三三制是各革命阶级的政治合作，它的基础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民主政治，具体地说，是施政纲领。由于施政纲领照顾了各抗日民主阶级的利益，所以我们能广泛地团结中间分子与非党进步分子，共同合作，建立三三制政权。但同时也正由于这是各阶级（各抗日民主阶级）的联合政权，党外人员的社会出身不同，所要求和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因此他们对于共同纲领的认识角度和着重点也就不同，在这纲领的具体实施上也就可能发生分歧。这就是说，我们同党外人员，特别是同中间人士的合作，虽然今天的政治方向是一致的，虽然有共同的施政纲领作基础，但在许多具体复杂的实际政策上，不会完全一致，不可能完全没有原则性的分歧。我们必须承认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与必然性，并有精神准备。不然的话，临到有这种种情况发生，就难免或左或右的摇摆。我们应该经常掌握住高度的原则性，同时又善于把这种原则性同具体问题的



灵活性结合起来。例如，对国民党作风之侵入不加阻止，甚至采取附和态度，又如在土地问题上偏听地主、绅士们一面之辞，以致农民讥讽“政府怕地主”等等，就是缺乏高度的原则性，失掉立场。又有一个时期，有人对工农干部存着相当深的成见和不满，甚至表示要把县长换成外来知识分子，又对保安机关也存着成见，它是否存在也成了问题。对这类意见我们没有让步，也决不能让步。但是，在施政纲领和总的政策之下，对于个别具体问题，遇有争执，不能一致，虽是带原则性的分歧，我们也得有适当的让步。例如，租佃问题上我们有过这样的让步；土地纠纷的个别案子上，个别犯人的处理上，个别干部问题的处理上，也曾有过这样的让步。本来，三三制内部争议的最后的合理解决，是少数服从多数，但依据实际经验，在今天非到最后不得已时，不要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形式。党外人员，尤其中间人士们，不习惯于在会议上讨论问题，尤其不习惯于在会议上争论问题，这虽然是他们的弱点，是他们在政治上还不够成熟的一种表现，但我们今天还不能不顾及他们这种习惯。因此，一切重要问题，全靠至少主要靠会前会后经过个别协商或座谈方式决定，提到正式会议上，只是取得合法手续而已。这经验，在边区的实践中已充分证明。可是，一般说来，我们这样做得还是很不够。总之，重大问题，预先交换意见，到相当成熟的程度，然后提到会议作决定。遇有原则分歧，争论不能避免时，也要尽量使用会外谈话方式求得解决。这样做，不但易于解决分歧，而且能减少分歧。会场上针锋相对的辩论方式，

中间人士极不习惯，又很容易变成僵局，一般应避免采用。但一般没有争论的问题，“如发展生产，提高文化等”，就应在会议上发挥一切人的积极性，进行热烈的讨论。

“在决定各地党所提出的施政主张时(实际就是各种政策的具体化)，必须适合于统一战线的原则。一方面要不失保护工农劳动人民利益的立场；另一方面，又不要伤害地主、富农、资本家当前必须限度的利益”(边区中央局)。而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要注意避免过左的行动。例如减租运动中要注意避免过分伤害地主阶级，倘若发生这种情况，应该及时予以纠正，予以调解；而如果党外人员提出意见时，应该适当地采取，不要故意推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或错误，也要采取这种态度。这样作，可以表示我们的负责精神与公诚态度，对于团结党外人员是有好处，而没有坏处的。

(三)现在参加了政权机关的党外人员，大致有三种类型：第一类是进步分子，他们赞成彻底反帝反封建，奉公守法，勤于职务，对共产党信任、爱护。这类人，乡村政权中最多，区级以上也有，对于他们不仅应该使其有职、有权，而且需要以对待同志的态度对待之。不然，他们会觉得不满足，但也不可以要求于党员的去苛求于他们。第二类是中间分子，基本上又可分三类：(1)政治上有见解，也有作为，大方向跟我们一致，并有决心一起干下去，希望“我们这集团兴旺”。但遇到与其本阶级利益有关的问题，如土地问题、租佃问题、负担问题等，就往往有所左袒。这类人是中间分子的左翼。对于他们要使其有职有权，担负领导责任，大政方针务求一致(同我们一致)，具

体问题上有时需要让步。倘若从我们方面获得有计划有步骤的帮助，他们能够进步。中间分子中，争取这类人最为重要。“对好好先生感到满意，对有独立意见的感到头痛”，是不对的。中间分子的左翼人物中，还有是旧社会的正派人，地方上的宿望，对我同情，对群众有影响，但因年老体衰，或其他原因，而不愿或不能参加工作者，对于他们应该敬老尊贤，取得密切联系，听取意见，并关心其生活。（2）典型的不左不右分子，政治上唯唯否否，态度中庸，不惹人，作为不大，工作平常，与其说是为了政治理想，不如说是为了生活出路。我们有力量能给他好处，所以跟我们走，并依靠我们。这种人也有他的社会基础，应该争取他们，给以一定职务，但难以担负主要领导责任，帮助他，影响他，督促他，也能进步。（3）不顾大局，对一切事务都从本阶级利益和一己私利来衡量，对旧政权有不满也有留恋，对新政权有称赞也有怨言，参加进来，主要是为了取得地位，以达个人目的。这种人是中间分子的右翼，对于他们也要争取。县以上参议会中，可以吸收这种政治态度较右但不是坚决反共分子的少数人（用聘请方法）。这对于影响外面的地主、资本家，与安定本地富有阶层，都有作用。对待他们的态度要团结和斗争并重，责之以大义，晓之以利害，可使其服从大局。应该给以适当的礼貌与尊重，团结他们，并利用其一技之长，但不可任以要职，更不可授以大权。第三类是坏人、特务分子。又可分两种：顽固不化的职业特务和悔悟自新的失足分子。对后一种人，如非罪大恶极，在群众面前完全失去信仰的，

还应给以适当职务。这样作，对于打击特务和争取社会上的失足分子有积极的影响。至于仅仅是隐瞒过党派问题的人，一般仍应保留其原任职务。在分别是非之后，对于戴错了帽子的人，应实行平反，在什么场合戴上的，在同样的场合取下来，例如由群众大会戴上的，仍然在群众大会上取下来，以服人心。

应该这样说，凡属参加政权机关（政府与参议会）的党外人员，只要不是真正不可救药的，即坚决反动而不愿改悔的坏蛋，我们的方针总是争取他和团结他，诚恳地帮助他。

（四）为了团结，不可避免必要的斗争。迁就政策同样不能建立真实的合作，是过去经验已经证明了的。对于坏分子的破坏，不应该容忍，但要依靠真凭实据，使其他党外人员了解；对于政治上自私自利的分子，要进行恰当的批评，同时不忘争取。批评以使其服从大局，而当其能顾全大局时，就不放松对他的争取和团结。真心同我们合作的人，由于阶级的限制和成见，其主张或其行为往往有错误，我们对之应该有解释，有时也应有适当的批评。即使在实际上实行让步的时候，也不应该模糊我们自己的观点。如果我们能够反复曲折地（注意方式）从理论上和实际上进行说服解释的工作，他们的某些错误和成见也往往能够改变（例如前面提到过的关于工农干部问题和保安工作问题，就是这样慢慢改变过来的）。对于真心合作下去的人，我们是应该这样严肃而又诚恳地履行自己的责任。有些人的错误，不是由于成见，更不是由于恶意，而是由于



糊涂不觉悟，好心肠却做了坏事，对于他们应该诚恳亲切地去帮助其认识和改正错误。总之，批评和斗争是必要的，但应该区别其是非轻重，照顾不同的人 and 不同的事实。至于批评的方式和场合，更需要审慎。党外人员，尤其中间人士，特别爱惜自己的面子(自尊心)，因此，除坏人外，一般要避免当众批评和当场批评，而多用个别谈话方式，婉转说理的方式，并出以诚恳帮助的态度(即对于坏人，也不要个个撕破其面皮)，一面批评错误，促其改正；一面顾全面子，使之感激。边区参议员×××，前年减租时，明减暗不减，去年被政府发现，他勉强减下来，但又令其儿子出面抽回某佃户土地，佃户拒绝退佃，被打坏了耕牛、农具，告到县政府，县府把他的儿子押在看守所，派人把他请来向他说：“减租减息是边区参议会的决定，老先生参加通过的，现在令郎犯了法，老先生是上司，请指示如何处理”。他一点也没法支吾或分辩，当场道错，答应赔偿佃户损失，把儿子领回去教训。一场严正斗争，出之以和平形式解决了问题，教训了×××，又保存了他的面子。听说经过了这一次后，他变好了些。有一次，我们为了试探中间人士对这种问题的态度，故意提起这事情的经过，他们听了之后，连声说道：“好。这方式好。人谁不爱惜面子。人家做了亏心事，咱给他留个面子，一辈子感激。”关中专署在发动减租时，把参议员中的地主请来，讨论减租法令如何执行，让大家提出办法，他们在场面上要顾面子，都如法减了。与此相反的一个对照：×××是参议员，在减租斗争中跪在大众的面前叩

头，完全忽视了他的身份。又有一个例子：镇原县一科长，边区参议员，中间分子较进步人物，下乡处理土地纠纷，把农民土地退还地主，是一个错误。回到县府会议上，一科员（党员）公开批评，使他过不去，长久放在心里。这类经验是值得注意的。

（五）为了团结和合作，不可避免必要的批评和斗争；为了更好的团结和合作，还要注意党外人员的提高和培养。这方面我们作得很不够，经验也不多。工作中帮助他们，固然是一种提高方式，但更重要的还是从思想上提高他们。事实上不但非党进步分子能够前进，就是许多中间分子搞得久了，也是能进步的。除开工作的接触外，同党外人员建立一种思想上的联系，分别对象，由适当的同志同他经常地交谈，只要人对头，谈得来，就很有效果。对于文化高的人，依据他的思想情况，介绍适当的书籍给他看，同样很有效果。日常实际问题和政权问题的座谈，也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在各种会议上正确地发展民主讨论，更是有效的方法。总之，我们要主动地适当方式地去帮助党外人员，提高他们自己的思想政治水平，以达提高工作效能和巩固合作的目的。

（六）会议是表现团结合作的形式之一。乡上一揽子会开得好，前面已说过。至于县上开会偏于形式的居多。据说有些县政府委员会开会，是这样的：事先发出通知，通知上有写明议程的，有不写明的，对乡下到会的委员，招待客气，态度恭敬；但议程的内容，会前就一般不谈论，或很少谈论，开会时县长作报告，报告后，请求发表意见；

有的临时凑上几句意见；有的说几句门面话；有的就一言不发。在开会的问题上，边区政府委员会有一点经验可以在这里提一下。

去年春，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开会，以简政、整政为中心的报告，对一部分委员是突然提出的，结果没有什么讨论，仅只几个非党员厅长说了几句话。准备通过的条例，预先发出，就有讨论，但因为对党外人士有些不同意见，没有事前交换成熟，以致争论不决。今春第四次会议，主要议程是总结一年的工作。鉴于前次会议的教训，我们改换了一个方式：头几天各主管部门作一年工作情况的口头报告（党内外负责人都作），有问题随时可提，有感想随时发表。估计教育方针与司法方针的问题，对党外人士可能难于了解，就在开会前分别交换意见。我和李鼎铭的报告也是相互商量好才提出。各主管机关报告完毕，又休会两天，使大家有考虑时间，然后作总结报告。会议取座谈形式，让党外士绅们想起了什么就说什么，扯出真心话来。（某地常驻会开会时，绅士们随便拉话，议长宣布“请大家注意开会秩序。”从此他们象菩萨一样坐着，再不开腔。）这样所有党外人员，都积极参加讨论，“党内人只管讲，党外人只管听”的形式消失了，要解决的问题圆满解决了。不一定要搬用这个方式，但一定要注意：（1）使党外人员对报告和讨论的问题，有机会知道具体内容，有时间考虑意见。（2）对重要问题和可能的争论，要尽量在会前同他们交换意见。（3）尽力造成他们积极参加讨论的机会和条件，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4）会议形式要

随便一些，使他们觉得不受拘束。

(七)关于党外人员的生活，有两方面问题：生活习惯问题与物质待遇问题。我们应该本着中央指示和高岗同志在二届参政会上演说的精神去处理。中央的指示说：“对参加我们政权的党外人士的生活习惯及言论行动，不能要求与共产党员一样，否则将使他们感到不满与不安。须知普通人士在这些方面是不能与共产党员相提并论的”。高岗同志说：“我们主张对政府工作人员采取薪水制度，保证他和他的家庭生活能够维持，至于其他一切私生活上的自由，只要不十分妨害政府的工作，政府都一概不加以干涉”。我们有些同志，因为看不惯党外人员的生活习惯，就不愿同他们接近，是不好的。要求党外人员象我们一样生活的情形，也是有的，某县姓唐的参议员兼副科长，生活习惯不大好，就取笑他，甚至勤务员也“糖儿，糖儿”地对待他。某县科长是党外人员，下乡时生活不够艰苦，区政府干部就不多理睬他。关于物质待遇处理得适当的比较多，但也有两种相反的情况：一种是过分迁就，要什么就是什么；另一种是党外人员领取的津贴，反比不上我们党内干部的供给标准。物质待遇是干部和党外人员很注意的问题，但过去经验，边区政府的统一规定很难行得通，提议由各分区本着“保证他和他的家庭生活能够维持”的原则，分别规定发给。

(八)提议各地委、县委和区委，及各级政府党团切实检查和总结三三制的经验，并积极地改善和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 陈毅同志一九四二年五月七日 在盐阜区各界座谈会上的演说

各位士绅先生，各位工农代表！我今天代表中共盐阜区区党委、行政公署发言，同时我又代表新四军八路军同人出席座谈会，提供一些意见。

我首先诚恳坦白地说，这次座谈会各位士绅及各位工农代表所说的话，特别其中对党政军工作方面的批评，我认为都是对的，我代表党政军三方面诚恳地接受。昨天下午会议上有一位农救代表对庞友兰老先生的话有些误会的地方，我认为这是某些词句上的问题，庞老先生的意见其基本精神和用意完全是对的。庞老先生的话和几位士绅先生的发言，都是一片好意，都是为了抗战利益，都是信任和爱护党政军的诚恳表示。昨天会议之后，黄师长（即黄克诚——编者注）向我说：“会议上各位先生的话正是我们自己要讲的话。”我完全承认黄师长这句话是对的，因此我代表党政军各方面诚恳接受各位先生的指教。（鼓掌）

庞友兰先生以前清名举人七十高龄积极参加抗日民主运动，这种精神首先值得佩服。他说：“盐阜区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享受了幸福，这是事实，拿在敌伪区的生活，拿在其他方面统治下的生活三者相比，就可以明白人民实

在享了幸福。新四军上下都爱国爱民，部队首长穿吃不如中等百姓。地方安定不受敌伪蹂躏，地方建设工作次第兴办。我们老百姓享了幸福应该感谢，不应该不满意。但春秋责备贤者，我们应坦白指出工作中的缺点，即工救、农救工作因初初开放，学识浅，阅历不多，往往逸出轨外，造成人心不安。比如增加工资，资方替工人解决衣服、药费等都应该，但不能因此而剥夺资方雇用工人的自由。比如照政府法令四六分租，这是应该的，地主不减租和隐瞒田亩、不负担公粮，这是不对的。我去年未减租就不对，今年要我退租我就照退。但地主如减了租而又强迫借粮超过他所能负担的范围，甚至侮辱地主，我看这就不对了。毛泽东先生说反对主观主义，要加强调查研究工作，要改造我们的学习，我完全赞成。工救、农救同志应该切实照毛泽东先生的话办事，宽宥既往，改造将来，革命一定成功。”庞先生这些说话，我认为正当的，不应该在某些词句上发生误会。朱墨香先生说：“盐城为游击区，应照中共中央规定，其减租应较中心区通融一些。”王子山先生亦同此主张，并要求收揽人心，注意敌伪区人民动向，反对敌伪归化办法及怀柔政策。政府和工救、农救同志应知道革命的目的和任务不变，但手段和策略应灵活改变。田厚斋先生说：“现行四六分租办法尚不是孙中山先生二五减租办法的彻底实施，我人应赞成四六分租。但有一事实，即四六分租办法在某些地方使小地主过活困难，应该照顾一下。”计雨亭先生说：“参议会无事可做，应该改革，区乡范围如何划法，增加工作人员和行政经费多少，应该考虑。”唐碧

澄先生主张提倡手工业，打破敌人经济封锁。李济南先生主张政府应注意安定社会秩序，照顾全民利益，人民应拥护政府，各尽本职。各阶层人士应站在团结御侮的立场，不要互相歧视。工农运动在发展初期，一切是可以改善进步的，不应该根本反对。杨幼樵先生说：“抗战要素有三：人力、物力、财力，均应爱惜，有力出力，有钱出钱。中国历来办事不彻底，照旧例者多，现在减租减息，扶助工农，团结抗战，应彻底实行。”汪国华先生报告淮安边区与敌伪苦斗情形，要求援助边区。指责农救干部在借粮中的某些过火或借到之后又在赌场放注的不当。又指出地主不能做到开明，至少应该识大义。边区工作不改善可能帮助敌伪归化，值得注意。杨芷江先生根据情、理、法，号召各方“认识敌后局势，风雨同舟，忘记往事。不要只顾个人利益，应团结抗战。现在的共产党和政府军队办事认真，而且办得好，使人民享福。新四军、八路军的首长有三能：即毅力，诚恳，道德。这是事实，绝不是歌功颂德。”王冀英先生说：“天生人，人人应平等，有生活的应替无生活的解决问题，这是天理。大家要注意团结。以前新四军初来，有些地方部队确实不好，破坏纪律，现已改善。”了性禅师主张僧界积极作事参加抗战，要求与一般公民享受平等的待遇。杨镜吾先生要求盐阜区各位家长培养子弟，注意增加智识，培养人材，学籍文凭视为次要，应协助政府兴办文教。各地工救代表、农救代表发言：叙述工农生活痛苦以及如何担负抗敌工作，要求彻底执行政府法令。并承认工会、农会开办初期有缺点，个别分子有过火行为。同时

他们也指责某些士绅违法不减租，并有压迫农民和破坏农救等行为等。还有其他各位先生的指教，恕我不能一一引用。上面这些提议和批评我认为都有理由，都是正确的。这些意见应照办一部分或全部照办。这正是我们党政军自己要说的话，所以应该听，所以我代表党政军三方面完全接受。（鼓掌）

我不仅接受到会各位先生、各位代表的意见和批评，就是各位对政府、军队工作的表扬，对我党的正确领导之赞许，我同样表示接受且引为光荣。（鼓掌）这正如杨芷江先生所说，绝不是出于阿谀和歌功颂德，这完全是出于至诚。因此你们的赞许是对的，我代表党政军方面接受这个赞许也是对的。双方的态度都是根据真理和事实，都是出于爱国的热忱，没有虚伪，没有夸张，更没有阴谋鬼计。兄弟敢说，我们中国三十年来能这样聚合党政军民一堂，来商量国家大事，来商量老百姓自己的事，而且可以直言无隐，可以面折庭争，既不阿谀权贵，又不压迫下层，恐怕只有今天抗日民主根据地才可以找得到，如说这是破天荒的创举，我想绝不是过甚其词。这种真正民主的政治生活，是经过若干年的奋斗才能获得的。首先在于我们有了新型的党——中国共产党，这个党是为实现民主政治、为全国人民利益而奋斗的真正革命的政党。任何艰难困苦，都没有改变他为民主而奋斗的初衷：当着他开始主持敌后抗战任务时，即首先实行民主政治，尊重民主权利。没有中共这样新型的党，我们要享受民主幸福是不可能的。其次，还在于我们有象八路军、新四军这样的新型的人民军



队。这个军队对外是抗战的模范，对内是扶助保护人民利益，支持民主的台柱。这样军队与专作个人工具去争夺个人权利的雇佣军队是完全两样的。有了这样新型的军队，所以在这个军队所到之处，他不怕人民讲话，只怕人民不讲话。因此民主风气就能随着军队所到之处而风起云涌。没有这样新型军队，我想民主政治也是不可能的。还有，我们不仅有了为民主奋斗到底的党与军队，还在于我们有了倡导民主的新型的政府，即各级抗日民主政府。以前的政府是压制民主、妨害民主的，更是害怕民主的，他们的哲学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而现在的政府则反是，业已真正开始做“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理想工作。这个新型的政府不管在草创时代还有若干不完备，甚至很多的缺点，甚至党与军队和人民都对他一面拥护，一面又不能完全满意；然而这个政府业已开始改造，任何人想拿着他去图谋私利，卖国求荣，摧残民众，是困难的。我们在敌后有了这样的政府，是应该引以自豪的。

另外，在我们有了新型的党政军时，我们还有了更根本伟大的力量，那就是有了有觉悟的、有了有组织的新型的伟大民众。首先我们有了新型的士绅，过去的士绅多半株守家园，“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不仅国家大事的最高问题他们无法管，连个人生活也要受着恶势力的摧残。现在不同了，士绅先生们一面帮助军队参加抗战，一面领导武装进行保家自卫。尤其难得是拥护政府法令，愿损失自己利益，减轻租息，增加工薪，以实际从事抗战工作。千百年的古旧陋规，在士绅自愿原则之下进行

了新的改革。历史上的毁家纾难，仅是少数贤豪的行为，而今在敌后已成为士绅、巨商的广大运动。这些绅商们首先赞助民主，首先支持政府，信任我党我军，没有这个条件，我们的进步是不可能的。在我们有了新型绅商之时，我们更有更广大的新型的工人、农民和进步的青年们。过去的工人、农民进行生产劳动，反受轻贱，视为下流，受尽政治、经济压迫，人间地狱式的痛苦，谁来替他呻唤一声呢？现在有几百万工人、农民到前线当兵，担负第一线的浴血奋斗。有几千万几万万进行后方生产及各种劳动，而且均是在挨饥受饿的情况之下去度过其辛勤的。现在他们不同了，能自己开会，自己组织团体，开始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积极参加抗战，成为抗战力量的伟大泉源，这又是几千年来的创举。各位昨天所说的那些民运同志们，这些同志们，离开家庭从事抗战，其政治认识，其爱国热诚，其牺牲精神，其吃苦耐劳，均不愧为民族的优秀分子。而且都是极其纯洁，不为私人利益，不为升官发财来从事抗日救国的艰苦事业。这些新型青年是几十年来中国革命先烈们的优秀继承者，是抗战的先锋。没有这样广大的工农和青年之出现于政治舞台，从事于下层工作的活动，我们虽有党政军士绅，我们的一切建设是不会成功的。正因为有了这样新型的党、新型的军队、新型的政府、新型的士绅、新型的工农和青年，所以我们才能建设起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创造民主生活，也才能使我们有今天座谈会的新气象。这是伟大的抗战的产物，这就在全国，首先在敌后，奠定了民主的初基。这里我们应感谢日本帝国

主义，你打得好，烧得好，你的打和烧创造出了一个新中国。我们不会悲观，真应兴高彩烈呵！虽说这样新型的党政军民的创造不仅限于敌后地区，在全国范围内某种具体条件下，也存在过类似这样的进步光明现象，我希望在不远将来，类似的进步和光明亦可能在大后方发现。但我敢断定，只有敌后地区，只有在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地区，这样进步而光明的创造是更为彻底，更为深入，更有保证，不会是朝生暮死，昙花一现，而且正在向着伟大的前途迈进。根据这些理由我敢说中国不会亡，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被我们中国打倒。（大鼓掌）

我们对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满意看到它在基本上的光明的一面，昨天的座谈会也便是光明中的指标之一。就是昨天大家的争执，也是一种光明的表现。假若有人认为昨天的争执不好，甚至表示悲观，个人私议颇以为不妥。个人认为，会议上有什么讲什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盲从不附和，各人坚持各人的主张，愈讨论则愈能发现真理。真理发现，事情就办得通，则大家放弃己见，服从大多数。这是最好的事，有什么不好呢？我们抗日民主根据地能有这种作风，正是民主的认真实行，这是应该提倡、重视的现象。我敢说中国三十年来的领袖们，肆意独断专横，不准人民当面讲话，偶语者弃市，这样的错误办法是造成不断的残酷内战的原因之一，也是在客观上引敌入寇的原因之一。主持国事的领袖们，如不采用这种压制民主的办法，我断定日寇想打也打不进来。（鼓掌）今天盐阜区各界有这种民主精神，正表示我们进步，我们

不应悲观。我们更应大胆把争执引导到更合乎抗日民主的正确道路上去。

昨天会议中有人曾经批评政府的缺点，批评共产党下层同志的缺点，批评工救、农救的缺点。也有人指责士绅中不减租甚至威胁农民的不正派作法。大家对军队的缺点批评得少甚至不大提到，是不是军队就真是十全十美了呢？我以为不然。我自己以新四军军长的资格来引证一件事情。比如在座的射阳中学校长杨镜吾先生（此时陈军长请杨先生起立后又请杨先生坐下），这是我们盐阜区的教育家之一，学问品格均出人头地。可是去秋反扫荡时被人诬陷，我们一个部队不加考查，轻易逮捕了杨先生，使杨先生饱受囹圄的痛苦和冤抑。以后我们查明实情，恢复杨先生自由，并向杨先生道歉，杨先生也就谅解了军队的失察行为。这样的错事，我们的军队也是做过的。这样的缺点应欢迎人民的指责，不应自己辩护，惮于改过。我今天当着大会，正式向杨先生道歉！（鼓掌）我想，今后不仅道歉就算完事，而且军队今后要保证不能非法捕人和侵犯人权。（大鼓掌）不然的话，别人无辜受累，受累的痛苦，道歉是不能赔偿的呀！（大鼓掌）

我再想表明一下我们共产党员对别人批评的态度。一个共产党员，他不是同流合污、随波逐流之辈。他之可贵在于他有正确的信仰，有正确的主张，在于他能为其信仰主张终身奋斗不息，他对自己的言行都是负责的。因此他不轻易做事，轻易发言。他既然开始做了，他便不轻易变更。但他在做事过程中，他的负责精神不仅表现于积极努



力，还表现在最虚心请教的一方面。他随时注意他的最初主张是否于尔后的实践都能吻合。他很虚心在实践中去检验他的主张。遇有不妥贴的地方，他便能自动去修改，如果发现完全不对，他便有勇气翻然改图。他一切以革命利益、人民利益为依归，他决不以感想代政策，以意气妨公务。因此别人的批评，他只问对他的事业有没有帮助，凡善意的批评均不拒绝考虑，即使是恶意的批评甚至来自敌方的毁谤，他也得作极客观的考虑，取其可作参考的方面。尤其他敢于公开承认自己错误，敢于向人民剖述他的错误，以证明他纠正错误的决心。这就是共产党员极勇敢的大无畏的自我批评的精神，这正是人类相处关系上公而忘私的最高道德的表现之一。对自我批评所采的态度是否正确，正可以检验这个共产党员是否忠实于革命忠实于人民。文过饰非，恶善好恶，是共产党员最鄙视的。古语说：“道吾恶者是吾师，道吾善者是吾贼”，又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这几句话在一定条件下都是具体的真理，可借来说明共产党员对自我批评的态度。昨天会议上对缺点的指出，都是事实，各有关方面都应该接受。如果我还感觉不够的话，那就是讲好的方面嫌太多，讲坏的方面还嫌太少。以后要求大家多讲缺点，少讲好处。（鼓掌）我相信一定还有人心中有许多话并未完全讲出来。我建议不要太含蓄，要大胆行使自己的正当权利，更要大胆担负自己应尽的神圣义务。（鼓掌）那末，我们究竟有些什么缺点呢？我想从下列方面提一些建议：

第一，在于实现抗日民主的方面。中日战争中敌寇军

力强大，我非其敌，但敌寇是侵略者进行不义之战，为我全国人民所反对，故在政治上我较敌强大，敌确乎不能敌我。民主政治是发挥民族抗战力量的枢纽，将民主权利赋予全国人民，才能使抗战力量充分强大，去战胜敌寇，这是抗战必胜的根据。故坚持抗战与发扬民主有不可分离的关系。敌后抗战之能坚持，是由于发扬了某种程度的民主，这便是一个证明。故凡认真抗战的人，必不会反对民主，必会大胆去发扬民主。因此我党在敌后的抗战设施首重发扬民主，这是极为诚意的。不怕人民起来，只怕人民不起来，不怕人民要求民权，只怕人民尚有所顾虑，不敢起来要求民权。我们在抗战中反对某方的不民主行为，故我们首先以自己的民主设施去同他对比，我们自己不实行民主便无理由去反对别人的不民主，这已是全国上下周知的事实。我们在盐阜区实现民主的具体办法：在于设立参议会，在于着手改造各级政府的制度及其行政的作风，在于组织工、农、青年、妇女、儿童各种抗日救国团体，在于由下而上办理彻底的民选。一年来各方面工作均有成就。凡政府决定的法令均征询或采纳参议会的意见。参议会组织用政府聘定及各团体选派的办法，这个办法仅系过渡办法。但地方绅耆硕望之士均大部或全部被政府聘定，几无遗漏。凡已有组织的人民救国团体均选派代表，常常士绅代表占多数，并列在被重视的地位。尤其共产党在参议会上占极少数，政府对参议会的意见是极为尊重的。昨天会议后，有一位先生曾说傀儡参议会大可不必。我想这句话如是主张改进参议会工作，我认为用意不错。如说今天党

和政府方面居心傀儡别人，则不是知言。我们不愿意作人傀儡，自然我们也不愿傀儡别人。（鼓掌）人民既不愿当傀儡，则人民只有自己起来积极参加抗战，争取民主权利之实现，此外无他途可寻。（鼓掌）共产党在任何时候都站在帮助人民争取进步方面，大家从事实上便可以相信这句话。（鼓掌）今天参议会仅系政府的咨询机关，只是民主的一种初步表现，尚不是完全民意的合法代表，这自然不能完全满足抗战需要。我们共产党员首先要求在参议会进一步，求得中共中央对政权组织的三三制之彻底实施，我们这种要求比任何方面迫切。我想引证一事实：前年冬，兄弟到东台，韩紫石先生、黄逸峰先生推荐东台某君任东台县县长，我们与该人不谋面，但因信任韩、黄两先生，遂接受此推荐。不料内定后到发表时，该人即受某方特工威胁，避不见面。韩、黄两先生对此极为痛切，兄弟也引为遗憾。此种表现基于对新政治的前途无认识，因而没有共同奋斗的勇气。今天尚有一部分对民主政治徘徊观望，站在家天下的片面的法统观念上来看新问题，这正是如商君所谓：“民可与乐成，而不可与虑始”的落后的心理的表现。此种惰性不改变，中国政治制度的改革是无希望的。共产党二十年来就具有这个决心，为了真理光明，决心奋勇先登。今天民主的大纛，业已高扬，正是二十年来奋斗的成绩。今天在敌后来责备政府对民主政治无诚意是不合事实的。如果责备一部分人士心里虽早已同情民主政治，但尚不敢毅然决心来共同奋斗，则这种责备恐怕最合乎事实吧！（鼓掌）

我想坐而言不如起而行，我们既承认现行参议会的初步办法，不能满足人民和政府的需要，我们建议立即进一步做下列工作：

1. 普遍实施新乡制。从乡长开始进行民选，逐渐到区，直至县以上的民选。
2. 广泛组织各界民众，纠正一切对工救、农救的敌视行为。赞助他们组织起来，团结起来，使大多数人能立即享受选举与被选举的权利。
3. 盐阜区参议会筹备处立即成立，协助行政公署工作，逐渐做到完全由民选不用聘任及团体选派办法。
4. 在各级参议会及各级政府机关实施三三制，如果共产党员占了三分之一以上的名额，中共盐阜区党委立即训令党员退出超过的额数，以符合中共的宣言。但任何当选的人士均应积极负责行使职权，这必须是人人共同遵守的条件。
5. 立即办理选民登记，从乡区开始进行，以便能由下而上建立各级代表会议，直到各级政府委员之民选。我们主张上述办法目前有步骤开始，在今年秋季即能全部实施，问题在大家来共同努力。（鼓掌）

第二，在于积极组训工人、农民的方面。会议中不少人士指责工救、农救工作的毛病和缺点，如强迫借粮，对地主有非法行为，某些工人加工资后不努力生产，反而对生产懈怠，以及农救人员中免不了含有几个流品复杂的分子。同时工救、农救代表发言，也提到一部分人士有阻挠成立农救，威胁农民减租，派镰客威胁农救负责人，减租明减暗不减的现象，资方也有无故解雇工人、敌视工救等情形。我想这两方面的发言都是根据事实的，都有理由，都是值



得注意的。但如果片面的强调下去，则都会成为偏见，都会妨害抗战。如把双方面的话合起来看，加以全面照顾，双方加以纠正，则我们才会发现全面真理。不站在狭隘的局部利益及个人利益上，而站在整个抗战利益上，才真是全民的利益，也才真是善于去保护自己的利益。善于放弃眼前的利益也才能取得长远的抗战的利益。我们党政军方面，既要代表工农利益替他们改善生活，同样要代表士绅、商贾的利益保护他们不受非法侵犯。我们代表着双方的利益，不仅在能替双方在眼前问题上得到一些局部的解决，而且代表双方推动双方具有远大眼光去积极争取抗战建国的根本解放。因此坦白说，我们不仅在眼前给双方以实际利益，而且劝双方积极努力能为抗战事业作更大的牺牲，则这种牺牲正是取得将来的远大利益的基础。因此我们更坦白地说，在目前我们给了人民一些好处，办了一些好事，但同时也责成人民拿出了一些东西，牺牲了一些眼前的利益，然而这一切的一切正是为取得将来的更大利益的定金。同时我们要进一步说，绅商与工农比较，工农的地位更低下，生活更痛苦，其数量占人口十分之七八，为了整个抗战利益，对于工人、农民之发动，我们便不能不采取一些更有效办法，我们劝绅商各界应多照顾他们，这也是合乎真理的。这其间无任何秘密，我们可坦白说出来的。自来社会上有一种偏见，继承着古旧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旧观念，从而轻视劳动，贱视工农。不知道劳动是人类生活创造的泉源。有了几千年的劳动，也才有几千年的文化和社会历史。社会上一切科学知识和文明，俱是

几千年来劳动的积累。劳动积累愈多，知识积累也愈丰富。知识积累愈丰富，便愈益抽象化，理论化，而与具体劳动形成逐渐游离。因而有知识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化。于是重视知识轻视劳动的现象遂以发生，这是本末倒置造成社会制度不合理的根源之一。我们根据近代社会科学的发现，饮水思源，不仅要重视知识更要重视知识的基源，即重视劳动。应该把知识与劳动重新合而为一。反对轻视劳动的偏见，把劳动的估价正确提高到社会支柱应受重视的第一等地位。因此凡从事劳动的工人、农民既为社会生产的支柱，又为眼前抗战伟大动力，那末有什么理由轻视工人、农民呢？有什么理由去反对组训工人、农民呢？说到此处必有人大叫道：你们共产党又在提倡“赤化”提倡“阶级斗争”了。破坏抗战之罪已不打自招了。或者敌伪汪逆更要大叫：“看呀！新四军又在提倡共产了，将要共妻了”。（笑）我想对敌伪的叫嚣可不必理会，因为俗话说“狗嘴巴里掏不出象牙齿”，（全场笑）但对某些先生的误会，则必须解说一番。既然承认劳动生产是社会生存的基本条件，则从事劳动生产的工农应该在社会上受着重视，受着应有的待遇。既然伟大的抗战在前线后方少不了几千万工农的血汗支持，则真心爱社会爱国家真心主张抗战的人们，自然不会再有歧视工农，反对工农解放的道理。我们共产党人佩服孙中山先生，他的伟大的地方，在于敢于反对社会偏见，大胆提出工农政策。可惜许多自命为中山信徒的人们，倒反而把这一重要信条抛弃了！人们承袭几千年来轻视工农的错误观念，总想以统治者的地位把工农压在万劫不复的

境地，这才是道地的在对工农进行其最残酷的阶级斗争。这才是最标本的根据少数人的利益以反对人民中的大多数。这才是从根本上来破坏抗战事业，以称快于敌伪。昨天会议上王冀英先生说：“天生人，人平等。”这句话完全对。今天来反对组训工农完全违反天理、国法、人情，今天的工农正在觉醒，不是再可以压制的了。古旧的大衣，应该从人们身上脱去，现在是时候了！（鼓掌）

工人、农民占全民族最大多数，将近四万万左右，今天业已有一万万至二万万沦陷在敌伪统治区。组训工农，提高工农的政治觉悟，使工人、农民都能于生产劳动之外了解自己的地位，了解他们与各方面的关系，了解工农本身利益与民族利益的联系，了解工农本身利益与各阶层利益的联系。使工人、农民懂得如何解放自己，如何反对各种压迫，如何与其他方面合作。这样去发挥他们的抗战积极性，使几万万工人、农民都团结起来，正是中华民族新生的表现。这一伟大力量动用起来，抗战始有胜利可言。今天在全中国之大患，是工农的组训不足，是恶势力之破坏工农组训，这是于抗战不利，应该反对的。自然在我们组训工人、农民时，以及工农团体成立后因各种原因，自然会有不圆满的情形发生，我们绝不能因噎废食，更不能以个别的现象否认全体。这次会议，工农代表的发言除几位说理稍有不周密及词句之误会外，许多代表发言极为有理，极为得体。工人、农民今天业已站起来讲话，这正是中国不会亡，抗战的光明之处，我们应该满意才对！（鼓掌）自然我们应向工救、农救建议，他有一定的章程，有

一定的任务。我们主张他们应自己善于保卫自己，反对压迫，善于与其他方面合作共同抗战，凡得不着社会同情的事情，违反政府法令的事情，侵犯别人的事情，应该纠正反对。我想工救、农救方面断无固执的道理。会员的训练和教育，成份的扩大和选择，农民中的保守报复心理、狭隘观点均在应该纠正之列。工农抗日团体应该是工农自己管理自己的团体，不容许别人的无理干涉，这是民主政府赋与人民的民主权利不容侵犯。但同时工农抗日团体应同样尊重其他方面的正当利益，并接受其善意批评。在这些方面，我们盐阜区的工农抗日救国团体，尚有些缺点，尚有很多工作，应大大努力，我们谨此建议。（鼓掌）

我们高谈民主，应知民主的真谛。我认为民主的真义在于人与人之间关系上的力趋平等，在于人与人之间划清权利义务的界限。人人能尽义务，所以应享受权利。既享受权利，所以应尽义务。义务在先，权利在后，尊重自己同时尊重他人。古训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真正平等的解释。同时实行民主是具体的东西，受一定条件的限制。在目前抗战的条件之下，实行政治地位法律地位的人人平等，废除残余的封建陋规，残酷的封建剥削，这是应该的。但是，目前的政治经济条件尚未具备废除一切剥削的条件，因此经济地位的平等目前只能有些改善，根本改革尚是办不到的，这只能期诸将来。我们本此原则，所以在盐阜区，在政治上法律上承认各阶层民众的平等权利。既保障绅商的人权、财权、地权，同时也保障工人、农民的人权、财权和地权。民主是全民的，不遗漏任何方



面。如果侈谈民主，而不照顾绅商利益，这不是真民主。如果侈谈民主，反把大多数工农人民放在民主之外，如某些一党专政主义者之所为，则更是假民主，那更应反对的。今天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中共政策能彻底实施，其民主的彻底程度，虽然尚未能达到苏联式的民主程度，但已较英美各国的现行民主为更彻底，这是可以断言的。

第三，在建立抗战的正常社会秩序方面。前几年我军初进军敌后，地方秩序非常混乱，弄得人民不安。一年来社会秩序业已大定，敌伪不敢轻进，土匪伏莽次第收平。这是党政军民各方面努力的成绩。现在问题尚有不健全现象，在党政军民的关系上，都很好表现了团结合作的精神。目前问题在于主佃劳资关系，因退租借粮加工资方面起了新的纠纷，这一问题不立即解决，会动摇抗战根据地的社会秩序。我们的任务在于使他正常化，有一定制度规程，来一个各方尊重，万众信守。第一，我党及政府对主佃关系的调整原则是：一面保证地主减租减息，予农民以让步，顾全农民利益；一面保证农民在地主减租减息之后，应向地主交租交息，以顾全地主的利益。租息的处理照二五减租的原则，盐阜区四六分租三七分草的规定完全是合理的。主佃双方于此种法定的新关系下，主方应按有钱出钱，佃方应按有力出力的原则，共同从事提倡生产，以增进抗战实力。主方不无故退佃，才能保持其退佃权不受侵犯。佃方在减租后努力耕种，不对主方有非法行为，也才能保持其耕种承佃的权利。第二，我党及政府对劳资关系的调整原则是：一面保证工人享受加工资改良待遇的利益，一

面保证资方能有营业谋利的自由，同时劳资双方均应在新关系下努力生产，资方不无故解雇才能保持其解雇权，工人能遵守劳动纪律，才能保持其加工资，改善待遇的就业权。主佃双方、劳资双方在新关系确定后，应互相尊重，互相帮助。绅商方面应抛弃轻视工农的传统观念，凡无故退佃解雇等于对减租加工法令作根本的侧面反抗。工农方面不努力生产，不重视劳动纪律，同样等于放弃自己的合法权。政府均有权干涉取缔，双方纠纷应协议解决，政府处于仲裁地位，双方不得诉诸武力，一切直接行动均严禁。凡一切问题合乎天理、国法、人情者，始能博得社会同情及政府军队之支援。第三，借粮原无法律根据，借者不应强迫，但不借者即系为富不仁，应受社会的指责。借粮既已实现，则应设法逐次偿还，方于法理说得过去。此次借粮退租的不正常行为，由于地主不借粮不减租所引起，地主方面应多负责任。但退租借粮不能同等看待，我希望各方面能彻底执行减租加工之法令，则主佃、劳资双方的人权、财权、地权均获得合法保障。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是各方应有的态度。工农生活痛苦，我们应有同情，政府必须首先而且多多帮助他们，但地主、资方当此国难时期，生活亦大不如前，各方亦应顾及，政府亦已在考虑此一问题。比如有某些小地主生活真处境困苦，则与佃方可协商，请政府改订减租办法。游击区，边区均与中心区不同，则减租、加工标准亦宜活泼规定，自应比中心区四六分为少。要在双方互利原则下避免过与不及的毛病。绅商在减租、加工受了实际损失，工农宜于努力生产增加收成，予以有

形无形的贴补，这也于双方有利益的。第四，主佃、劳资新关系确定之后，一切应视为成例，比较带固定性，不宜朝令夕改，或片面废弃，而一切以互相扶助发展生产为依归，如此才有正常抗战秩序可言，我们于此寄托最大的期望。第五，目前法币币价狂跌，物价暴涨，地租、工资均可改为实物交付，均应按双方互利的原则，以协议方式，反对借此便利私图。第六，各阶层人士同情我党中央的土地政策，拥护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言论，这是我党的荣誉，我表示无限感谢。但我希望更能体会其真精神，而不推敲其词句，凡断章取义者，难免不便利其私图，同时更不要阳奉阴违，视为空洞具文。一切照实际去实施，总以达到团结抗战，照顾全局，识大体，明大义为根本目的。能这样，则我们党的主张便能正确实现，人民的话便是我党的话，我党的话便是人民的话，人民与我党造成共同一致，这个一致必变成伟大力量去战胜日寇。

第四，关于民运工作方面，首先应承认盐阜区根据地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及士绅、巨商今天都能享受抗日民主的实惠，都能自动的参加抗战工作，这正是民运工作的成效，首先是几百名青年同志能艰苦从事民间的宣传组织训练工作的结果。如果没有一批舍得埋头苦干作民运工作的青年们，仅有政府和军队，事情不会办得这样顺利。韩国钧先生曾当面向我赞佩我们的民运工作同志，他说：“你们新四军有这样一批青年，不耻恶衣菲食，朝斯夕斯去做下层工作，这是历来的政党和军队没有的特点”。我想韩先生的话完全对。确实的，许多青年加入新四军或

到抗日民主根据地，经过我党严格的训练，他们的人生观就有了正确的改变，能更坚定为国家民族努力。他们的生活也能更艰苦忍耐去作实际工作，没有报酬，没有升官发财思想，只有一个目的，为国家民族服务。这种精神是值得奖励的。我们不象希特勒及日本天皇驱使几百万青年向别的民族进行侵略而葬身异国，也不象某些达官贵人强迫青年受训练，把学校变成集中营，强迫党化青年人的思想，或者用什么毕业后月薪可得几十至几百元的招生广告来引诱青年上他的圈套。我们把救人类、救社会、救中国的真理听青年选择，教导青年如何为人作事，如何去作唤起民众、组织民众的工作，这种大公至正的革命精神，正确而丰富的革命理论；所以能获得青年，使青年群众不期然而然，万众景从。就是家庭的牵扯，反动的阻挠，也阻挡不了青年接近我党加入我党的潮流，这完全是事实而且不是偶然的。假如我党不用革命精神、革命理论去对待青年，而是用别的办法企图收买青年来作私人的工具，则断不会有这样的成功。因此这样的新式青年民运同志愈多愈好，中国能有二百万这样的青年照样去从事民运工作，抗战的胜利必可提前。可惜数量上还很不够。故我奉劝士绅家长，应大胆派遣子弟去参加抗日民主运动，让他们真正作一些有益的事情，这样增加其知识，培养其人格，启发其革命的政治觉悟，父兄之对于子弟，应选择这条光明道路。

但是我们民运工作同志，这一批青年们，有缺点没有呢？昨天会议上，各位先生都提到民运同志对当地情形了解不周到，处置事情太简单，做事不活泼，不懂得尊老敬



贤，做的事情并不是样样都能符合中共中央的原则，甚至有违反的行为。在领导工农救国团体时，有些过左毛病，不能照顾各方，学识浅，阅历不深，人情世故不甚了然，这些毛病都说得对。今天到会的或未到会的民运工作同志都应该虚心接受。我虽然指出民运工作同志的许多优点，并不是拿那些优点来掩饰民运同志的弱点和毛病。因此民运同志们，要懂得正因为你们本身有极大的优点，国家民族对你们的期望很大，你们的责任很大，因此对弱点和毛病要用功夫去加以纠正，不能把善意批评视为敌对，反而去固执自己的错误。今天的民运工作同志其中一部已是共产党员，另一部或正在准备加入共产党，我们党对自己党员的责备乃是更严格的。我们党既对社会、对革命负了责任，因此对自己党员同样负了责任，党没有党员便等于零。党员能执行党的政策照章办事，则革命可以顺利进行，反之，党员不能很好执行党的决定，那个党要失败的，那个革命也要失败的。因此我党决不护短，特别欢迎人家对自己党员的批评，特别要自己党员更大虚心去听取别人的批评。昨天各位先生对民运同志的批评是对的，我代表党和自己的党员来接受各位的意见。（鼓掌）我敢说这些批评还只是一般性的，如更进一步来批评，我们的党员除了他本身具有许多革命美德而外，其弱点甚多，各位的批评并包括不完，其中最基本的毛病在于愈到下层，我们的党员愈缺乏完整执行我党政策的修养。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及我党中央是一刻不放松在纠正这种弱点，而且一年比一年获得伟大的进步，这是可以告慰于全国人民的。我们

民运同志就要深刻警惕这一点，去加紧学习，能做到完整执行党的政策的地步。（鼓掌）

最后，我还得说我们民运同志近几年的牺牲是极为壮烈的。在与敌伪战斗中，在与敌伪纠缠中，在边区、在敌伪区这种英勇的牺牲时有所闻。陷敌不屈，临阵不退，业已使敌伪丧胆。从中国青年之英勇，便深知中国之人心不死，敌寇已不打而自行招认的。可是确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专门造谣诬蔑甚至阴谋暗害，如过去在苏北的李守维、张少华等派遣特工，专门暗杀民运同志，这种罪恶行为与日寇没有两样，则断乎为公论正义所不容，我党则必须与之作坚决的斗争。我党负有爱护自己的党员的责任，更负有为民族国家爱护这一大批优秀青年的责任，断不容无理侵犯的。

因此对民运同志，不管是党员或不是党员，我党是以父兄对子侄的心情去教育他们，爱护他们，同时也不姑息他们。站在神圣的抗战建国的革命关系上，我们这种爱护心情比家庭间天赋情爱，只有增加深度，而不会有更淡薄的情事。我以为各位先生一定同情这个说法，也一定能以亲切态度去对待我们的工作同志。（鼓掌）可不是吗？请看一下吧，我们的工作同志是些什么人呢？就盐阜区本地来说，在座的计议长雨亭先生，他的公子计超同志便于前二年带了一个比较大的部队加入了新四军，他也是一个关心或主持过民运工作的同志。盐城唐参议长碧澄先生，他的公子建华同志现在仍然在做民运工作。略略举出眼前的二个例子，恐怕在座各位的子侄辈、兄弟辈都大半在新四

军或政府中工作，恕我不及准备一一列举出来。我再扩大到全国范围来说，据我所知道的，过去蒋介石先生、于右任先生、冯玉祥先生、邵力子先生，他们的公子或小姐都曾经作过共产党员。民族先烈廖仲恺先生令郎廖承志同志现在仍是共产党员，负起很大的工作责任，他历来作工人运动，蜚声于海内外。比如居正院长觉生先生，他的小姐现在淮南作民运工作。梁启超先生第六个女公子现在苏中作民运工作。平津、港沪、宁汉其他知名之士，其后辈之加入本军本党者不胜枚举。我们党敢于负起这个责任来领导这批青年，培养他们成为国家栋梁社会支柱。时代是进步的，中国已非闭关时代，革命战争时代的进步比较和平时代，一年可以抵得十年。我们老前辈应鼓励后辈随时代前进，断不要以古旧观点去阻碍青年进步。我敢说那些企图以反动手段阻碍和摧残青年的先生们，实在太愚蠢，他们在摧残自己，历史的惩戒是逃不了的。反对摧残青年，加强青年的教育。青年同志努力学习，虚心请教，锻炼自己。社会前辈人士应帮助和鼓励青年前进，这是我们应该作的极大的抗战建国工作。

第五、关于呼吁团结加强团结问题。中国处在抗战改革时代，在抗战中使古旧的中国改变了面貌，存在着新旧思想的斗争，新旧制度的斗争，新旧人物的斗争。新的临产必须经过痛苦，那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炮火的摧残。旧的易箠，必须努力挣扎，那就是反动势力的没落和哀鸣。每个中国人都遇着这一个问题而且都要选择这一问题。凡对这一问题在思想上、政治上早有准备或有正确的指引的

人，他可以顺利的解决这一苦恼，否则他必为这新旧矛盾所绊倒、所牺牲，那是极可悲的。因此所谓团结问题不应是调和和抹煞这种矛盾的意义，而是以积极手段来彻底解决这一新旧矛盾和斗争的意义。有了正确的四六分租的原则，才可以解决抗战时代主佃关系的矛盾。有了正确增加工资、改良待遇的原则，才可以解决抗战时代劳资关系的矛盾。不用这一方法而用顽固派的镇压工农方法或其他过左办法，或不主张争执的敷衍方法，则这种矛盾不但不能解决，且要影响抗战。这仅是就地方上实行过的例子来说。我们再举一些历史上的例子来说明。廉颇、蔺相如曾经不团结，仅以门第关系，终于为了赵国抵御秦寇的国家利益，他们团结起来，后世称赞蔺之能让，及廉公之善于折节悔过。王荆公与司马温公之不团结，王荆公主张积极变法，温公则始终坚持其古圣先王之法未可轻议，终于宋室南迁，后世史家至少承认王安石拿出了办法，温公数度入相裨益者几何，我们即从学术思想的贡献上，不能不更同情王荆公。苏东坡与程颐、刘安世洛蜀朔三党之争，则由于苏喜诙谐，程习于端正，个性之不合，酿成三大地方争执，祸及大局，朝廷播迁，我们对任何方面皆不赞成。岳武穆与秦桧和战之争，最后造成悲剧，则我们应痛惜岳武穆之从中原撤兵，这种退让危及自己，且危及大局。近三十年，则有辛亥革命时代孙中山先生举革命政权托诸袁世凯，这种清高退让，并非孙中山先生所愿意的。由于当时民党之认识错误，大家不支持中山先生，乃不得已而出此。其结果造成革命流产，中山先生终于赉志以歿。这些例子说明，



我们应如何去了解团结与争执的问题。为了团结，内部必须懂得退让，而以不走到牺牲抗战为限度。为了团结，必须有争执，但争执也应在不破坏抗战为限度。为了抗战利益，有时应该顾全大局及委曲求全，如我党在西安事变前后之采取和平方针。为了抗战利益，应该坚持真理，面折庭争，如我党在以前揭发未出走之汪精卫，使国人认识其汉奸面目，故汪逆投降其影响并不扩大。因此团结是好的，但运用得不好，亦会造出舍己从人助桀为恶的错误。在抗战时代不应强调争执，但涉及抗战根本问题，则非力加争执不可，不争执则大局将无可挽救。懂得这些道理，则可以明白我党之对于团结和争执问题，皆以是否符合抗战利益为依归。我们以这个态度去团结友党友军，同时也希望别人以这个态度对付我们。辨别双方曲直，研究谁是谁非，根据抗战利益作正确判断，这是我们在伟大抗战改革时代，对内部矛盾应持的公正态度。

我讲到此地，已将昨天会议上提出的许多大的方面，都已贡献了拙见。我愿就目前的工作方向简单再讲几句。目前时局的特点是侵略国的攻势业已被阻止，同盟国的反攻逐渐在组成。今年就是双方的决战的一年。随着这一形势，远东及中国战场也要紧张起来。时局更加接近最后胜利，因而所表现的困难也更加增多，度过这些困难，才能取得新的伟大的胜利。在敌后的最大的困难，就外部说，便是敌寇的疯狂扫荡，要求我们军民下最大决心进行反扫荡恶战，反对其怀柔欺骗政策。就内部说，便是根据地的工作，尚待用大力作各种巩固和建设的工作。特别是增加生

产、培养民力、整训军队三大方面，这更要依靠党政军民诸方面更大努力来执行我党中央的精兵简政政策。我盼望盐阜区参议会能迅速产生，能协助政府担负起新的光荣的战斗任务。（大鼓掌）

（原载1942年6月6日《盐阜报》）

附：

## 盐阜区士绅座谈会工作经验\*

(一) 华中局扩大会后,盐阜区群众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开展,四十天内基本上完成了退租及借粮救济春荒的任务。农救会员增加十万名以上,工人工资已普遍增加至一倍以上。但同时产生严重过左行为,尖锐的对立形势,引起地主恐慌,已发生个别地主逃亡。

(二) 五月六日盐阜区行政公署藉追悼韩国钧之便,召集士绅座谈会,八县著名士绅均到会,热烈发言,要求我党及政府纠正农救、工救的过左行为。兹记述会议经过如下:

### 1. 士绅发言

庞友兰(七十老人,前清举人,现任阜东县参议长,文名甚著)首先发言谓:“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现敌、伪、韩、我四方面相比,以共军区域真能替人民谋幸福,此系事实,我讲真话,如果享了共军之福还对共军不满,是无良心,但为了更好办事,我又不得不讲。固然我来批评共军,等于叫化子劝皇帝穿‘黄棉袄’徒贻笑大方。(按:阜宁民间故事,叫化子冬天在外晒太阳取暖,谓之为

---

\* 本文曾以《盐阜区通讯》的形式刊于1942年5月25日华中局的党内刊物《真理》杂志第七期上。

穿‘黄棉袄’，便想把这一好办法向皇帝进贡，他忘记了皇帝皮袄多得很，并不需要，遂闹笑话。)但中共中央毛先生讲了，我便敢讲。毛泽东说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是中国革命的大敌，是无产阶级的大敌。许多人言必称苏联，只知昨天的事，不知今天的事，不详细研究实际情形。正是所谓根底浅、腹中空。现在的减租加工资特别‘左’，甚至侮辱资方、地主，比如东坎工救会在街捕一个乡愚，我从旁经过，乡愚向我说：‘庞老爷，救救我！’我老头子多事，随便问一问。工救代表即说：‘庞老爷，你们的时代已过去了，要跟我们走才能保险。’工救、农救宗派主义过甚，报复思想，自高自大，流品复杂，毫无知识。我们对减租减息、增加工资、组织工农，为中共及政府既定政策，于抗战有益，我们不应反对。我自己过去未减租，这是违法，政府命令退租，我即纠正错误，自动执行，我不减租，应受处罚，但我尽了本分，就不应给我以侮辱。毛泽东说，整顿三风以及改造学习，我看民运同志应多学习，共党下层同志能照中央毛泽东的话办事，一定得天下。因此，我对目前工作奉劝两句话：“宽宥既往，改造将来！”言毕，全场士绅百余鼓掌助威。

李济南（前阜宁国民党书记，抗战后家居，现任阜宁副参议长）发言谓：“不组织工农，抗战不能胜利，既要组织工农，初期不过左也组织不起来，工农久受压迫，初得解放，自然有不健全的现象。但目前已到纳之入正轨的时候。要照顾全民利益，否则破坏后方安定，不合于抗战利益，损失甚大。”



田厚斋（阜东参议长，前国民党教育局长）发言谓：“现行之四六分租办法，大家很不满意，但严格说来，这个办法并不能算是孙中山二五减租政策的彻底执行，尚未达到二五减租的高度。不过，眼前的事实，小地主已不能过活，政府应顾及全民利益，请考虑修订！”同时田又把地主与农民的各种负担一一对比，最后田结论说：“百亩之田，八口之家，按四六分租，不能过活，我非地主，所以敢言。”

盐城教育界王子山说，民运工作同志，不顾中共中央游击区减租标准应少于二五减租的指示，并将目的与手段混淆，不懂得目的不变，而手段则应灵活改变。

汪国华（淮安边区地主，前任韩德勤淮安县政府第三科科长，现家居。）发言，首先历述边区与敌伪斗争艰苦情形，次述工农减租、增加工资的勒逼情形，再次述减租、增加工资后，工农不务正业，到赌场放大注，自高自大，肆意侮辱地方人士。末谓：“我不反对解放工农，但反对替他们增加大注，我拥护民主政府，但请民主政府替我们解除夹攻的危险，现在的勒逼，已有一部分人归化敌伪，此事如何解决！”汪发言完毕，庞友兰即立起大叫痛哉言乎！全场士绅鼓掌助威。

## 2. 工农代表的发言

有几个工救、农救代表发言甚得体，大意谓：首先感谢党政的法令，次感谢士绅老爹爹的帮助，再讲过左行为的不对。同时也指出地主破坏农救的违法，不减租的违法，不借粮的违反人情；再讲目前夏收的法令之应彻底执行，

今后应提高生产，提高工救、农救本身教育问题之重要等。言毕博得同情。士绅即谓，此人是谁？赞曰：是个人材。但另有一个工救代表发言，则采取极尖锐之反驳态度谓：“我们过去并无错误，用不着别人宽容，你们的将来才应改造，请地主士绅先生们把思想意识改造一下！”又涟东一妇女代表发言谓：“刚才庞老先生说工救、农救人员复杂，说工农妇女穷，不守规矩，这句话很伤人心，也请地主士绅回家去查一查你们的太太小姐规不规矩，我怕也不一定干净！”发言后全场空气更不佳，庞友兰当夜即气愤要走，后经劝阻未退席。另一工农代表发言时，手拿一张纸，边看边说。地主私议说：“这是后台的扮演！”又工农代表脱离生产后，穿军衣，地主说这是假农民。

### 3. 工农代表批驳和尚发言，取得地主士绅的同情

盐城和尚代表了性禅师（系大学毕业生，拥有庙产）发言谓：政府既承认人民信教自由，允许宗教存在，即宗教徒应享受公民同等待遇，现征收公粮及减租，对和尚特别苛刻，要求改善。次即大讲佛法与共产主义相同，劝人民奉佛法皈依佛教。和尚言毕，一工救代表起来发言：“地主士绅因有家庭负担及子女教育费等，故减租、借粮应顾及士绅生活，但和尚出家人无老婆家小，只一个人，费用不大，所以应多担负一点。”全场士绅鼓掌赞助，庞友兰亦曰：“对，对，对。”

### 4. 参议会问题

计雨亭（前在孙传芳部任军官，现任阜宁参议长）发言谓：过去参政会并无成绩，徒耗公粮，可以彻销。另一

阜东大地主则在会议外直谓：傀儡参议会大可不必，干民主，我们要认真干。另一地主又谓：现在之民选，实际是农选，应加以纠正。

## 5. 党政军代表致答词

参议会六日开了一天，次日上午，即由党政军共推一位代表（即陈毅——编者注）作了详尽答复：（1）感谢一年来各界人民特别是士绅对党政军之信任和帮助。（2）以我党的自我批评精神接受到会人所提建议及一切善意的批评。（3）承认民运工作同志处理问题某些不正确的地方，可逐渐改正，特别把社会同情性质的借粮与有法令根据的退租混为一谈，采取同样手段去作，是不对的。（4）解释部分工救、农救会员有幼稚过左行为，到会个别工农代表对庞先生发言中有所误会。指出庞先生发言基本上是对的，同时也批评部分地主阻挠法令之执行及压迫工农是不正当的，这是违法的行为。（5）最后提出目前工作是正确地进行夏收，保证减租减息、交租交息，保证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和工人努力工作。同时借粮还粮一切顾全双方利益，建立抗战后方的健全秩序。小地主负担酌予减轻，游击区法令之适当改订，工救、农救应加紧对会员的教育，中共方面加紧自己下层工作同志的教育，坚持抗战，加强团结，提高生产，彻底实行三三制，发扬民主，改进参议会工作，是目前工作的方向。这种回答，使全场空气为之一变。庞友兰事后说：“这种谈话才使人五体投地”。最后推选了十余人，成立盐阜区参议会筹备处，即散会。

### （三）经验教训

1. 盐阜区在四月以来，进行借粮、退租，一直发展到某些区乡强迫借粮，形同吃大户，而退租从退两季租，直到退两季粪水，使自己在策略上发生混乱。个别大地主退出租额合法币达二万元，小地主至少三百元至八九百元，多至千元不等。又当一月后即夏收，军队粮食缺乏，自卫队借粮，工人加工资到二倍，加上不少地方不顾地主的面子，自然也发现部分地主派镰客威胁农民的事，这样造成了地主、资方的不安。这次他们远道来参加座谈会，积极发言，虽然不少地主仍保持地主统治者的意识，并断章取义，企图利用我党中央文件，片面曲解以阻碍群众运动，但一般发言均是善意的，证明地主士绅对我党政策的同情，对我党的期望甚大，表示了要依靠我们，只要求照法令办事，纠正过左行为，这种态度是对的，这是党中央政策的成功。但发现同志中还有人没有认清这一点，站在宗派主义的立场，认为此次会议是地主反攻，应予以迎头痛击。这种主张被驳斥未能实现。因此，这次会议是以争取士绅保证推动夏收为主，实际上挽救了退租、借粮运动中我方的某种孤立形势，而巩固了与士绅间的合作。

2. 华中根据地日趋巩固，在地主士绅眼中造成了我们的事实上的合法。一方面党中央政策的正确，不侵犯他们的基本利益，一方面工农运动日益发展，地主士绅懂得只有积极参加民主运动，才能保护自己，故改变过去观望态度，而进一步引用我党文件来与我们作合法斗争。这一方面是好现象，他们愿意讲理，则民主运动可期望深一步。从讲理过程中，更可以团结人民，造成我们政治上的



优势，便利与敌伪斗争。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自己讲的话或上面讲的话都不能做到，而自相矛盾，自己漏洞甚多，如言行不一致，上下不一致，则又会损失自己领导威信，造成自己孤立的危险。

3. 此次座谈会是统一战线各阶层联合的场面，也是阶级斗争极尖锐的场面。地主的叫苦和他们的高明的合法斗争的手段，都值得重视。工农代表有极大进步，但又表现幼稚，证明我党愈到下层愈不会领导这种又要联合又要斗争的极复杂的局面。今后类似这种性质的会议，多指定乡支部书记、区委、县委负责同志列席，做实际合法斗争的统一战线教育，在我党的策略教育上，有极大的帮助。

4. 全党同志要作实际调查研究工作，更加仔细研究中央文件，并且在实际斗争中去全盘地和灵活地运用毛泽东同志及中央的指示（有些同志对中央指示远不如士绅间之重视），更虚心地向人民学习。争取士绅与组织工农两方面应全面照顾，善于以统一战线方式去实现党的政策和政府法令，把工农群众的政治觉悟提高到能灵活运用统一战线政策的最高阶段。同时对地主、资方的生活利益要予以照顾，巩固他们对我党我军的同情和信任，对他们的反攻行为，违法行为，一面要有政治上的警觉性，一面还要以民主精神，以善意的态度去加以纠正，而这种纠正是为了达到争取和团结的目的的。

# 抗战前后天津地下党组织和 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的情况

姚 依 林

抗日战争期间，天津党组织的活动始终没有中断过。“七七”事变前，北方局、河北省委都在天津。“七七”事变后，大部分人撤离了，领导机关留下了少数人坚持。一九三七年五月，中央在延安召开苏区党代表会议，同时也召开了白区党代表会议。北方局的负责同志大部分到延安去参加会议，少奇、彭真、李铁夫和李大章、柯庆施等同志先后都走了。留下的有林枫，那时他是少奇的秘书，他爱人郭明秋也留下了。铁夫的爱人张秀岩也没有走。这是当时北方局和河北省委的情况。我在天津市委工作，对北方局和河北省委的情况不太了解，但大体上是这样的。

当时，天津市委书记是李铁夫，副书记刘澜涛，组织部长李启华，他们三人都走了。我是宣传部长，张秀岩是妇女部长，我俩没有走。但不久，中央通知：因铁夫同志到延安后身体不好，让张秀岩也去。大概在六月份，张秀岩也走了，剩下的已没有几个人。

“七七”事变后，许多同志离开了河北，由马辉之、吴德、林铁等重新组织了地下河北省委。当时决定把我留下来，

因为在天津有些社会关系，有开展工作的条件。我有一个叔父，叫姚国桢，是亲日派，与日本人有关系，和王揖唐也有关系。当时天津市委的负责人并未配齐，我是市委书记，李启华是组织部长，他因去延安参加党代表会议，于七月份才回到天津。

天津在“一二九”时期建立起来的基层党组织，大部分同志也走了，留下的党员不多，我负责往延安、临汾等地输送了不少干部。陈伯达也是这时离开天津的，他过去一直在北方局编《长城》杂志、《国防》杂志。不久，林枫和郭明秋也离开了天津。

如上所说，大体上是分几批先后离开了天津。第一批是少奇、彭真、铁夫等到延安去开会。第二批是林枫、陈伯达等。他们走时日本兵已经占领了天津，记得他们都是坐船转道走的。当时，我在天津市委和林枫没有多少联系。但他临走时，到我家告诉我，他要走了。我家住在耀华中学对过，黄家花园福顺里。我离开天津后，母亲还住在那儿，直到天津发大水（一九三九年）才离开。当时市委也没有个办公的地方，开会就在我家里。我家只有前后两间房子，整个楼下也就两间，有个楼梯，后面有个厨房，有个厕所。楼上住的是别人。我叔父住在法租界32号路，虽然不和我们住在一起，但别人也都知道我有这样一个叔父，住在楼上的人也知道。因为有这个关系，便有条件在我家里开会。家里还有一个跟我母亲多年的老保姆，掩护工作做得很好，从“七七”事变前到我后来离开天津，一直住在这里，从来没有出过问题。

“七七”事变后，天津的地下党组织大体上是这样几个部分：一个是河北省委，一个是天津市委。市委实际上只剩下我和李启华两个人。河北省委管的地方主要是冀东、北平、天津、唐山几个城市，那时冀东还没有开展游击战。此外，还有从北平到山海关这段铁路线。其他的地方都有了八路军。八路军到河北后，建立了冀南区党委，晋察冀区党委，后来到平西建立了平西区党委。所以平津周围都是八路军，河北省委管辖的范围就剩下冀东、平、津、唐和北平到山海关这一段铁路线了。

党员最多的是冀东，有几百人。冀东有两个地委：一个是南部地委，领导人是李运昌，一个是北部地委，领导人是王平陆。再就是平、津、唐三个市委，还有一个铁委（铁路工作委员会）。此外，还有一个直属中央的情报工作系统——华北联络局，有王世英、南汉宸、谢甫生等，也是以天津为中心活动的，由河北省委领导，马辉之管。

我们和冀中、冀南区党委经常有来往，因为原河北省委领导过这些地方，现在八路军虽然过来了，建立了新的区党委，与河北省委还有联系。

除了党组织以外，还有一个群众团体，叫做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原设在北平，“七七”事变后，搬到了天津。原来杨秀峰、张申府、刘清扬等都在该会工作，搬到天津后，他们都离开了，杨秀峰到了太行，张申府、刘清扬到南方（武汉）去了。剩下的有李楚离、董毓华（王仲华），改组成为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作为一个群众团体和一些上层人士，包括国民党人士，以及一些进步知识分子



联系。我们党和国民党也建立有联系，国民党的负责人叫王若僖，是天津电报局长，是C C系统的。同时，我们党华北联络局通过谢甫生和国民党一些上层人士，如广西李宗仁系统的刘绍襄有联系。

天津党组织的情况和活动，在“七七”事变前后大体上就是这个样子。至于到底有多少党员，现在让我具体讲也讲不清，当时也没有个名单，只能大体上讲讲。“七七”事变后，原来的党员留下来的已经很少了，有周彬、黄元镇、郝贻纯（黄、郝是由北平到天津的）。以周、黄、郝等为中心，又重建了天津的民先地方队部，发展了民先组织。原来女同学会的阎国珍也留了下来，以她为中心，保留了“七七”事变前的党的外围组织女同学会。民先队和女同学会后来又以原有的骨干分子为中心发展了一些党员。此外，李启华也领导了一些关系，主要是在工厂，如朱铮（朱淑宜）、任秀荣、田学昭等，他们都在纱厂工作。其中一些人后来也陆续离开了天津，到了根据地，如姜思毅、李青（他俩是扶轮中学的）到冀东去了，陈平舟到冀鲁边去了。有一些同志牺牲了，如赵观民、杨士英、阮务德等同志后来在冀东牺牲了。在天津本地牺牲的同志不多，在冀东游击战争中牺牲的却不少。

下面讲讲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

点线工作委员会这个名字是少奇同志起的。为什么叫点线工作委员会？

一九三七年底到一九三八年初，中央决定派宋（时轮）邓（华）支队，向冀东挺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

日根据地。一九三八年，林铁离开天津到平西，在省委和宋、邓部队之间建立了直接联系。后来林留在了晋察冀，并把我从天津市委调到河北省委，接替林铁的工作，担任宣传部长兼秘书长。林铁管的工作全部转给了我，一个是华北武装自卫委员会的党团，一个是党委宣传部，一个是报纸《火线》。这时我调了顾磊来给我当助手。这段时间我的主要精力是搞河北省委的工作，同时兼天津市委书记。李启华这时也去了冀鲁边，我把天津的工作逐步地交给了顾磊，不再和天津市新发展的同志发生关系。

一九三八年四月份，中央来电报叫马辉之到延安汇报工作。我们的电台负责人叫王士光（王光美的哥哥），清华大学学生，比我低一班。在清华时我们不认识，我在一九三六年就离开了清华。他来天津是经过组织上转来的关系，因他学过无线电，所以让他管电台。这部电台是他自己装配的。房子是我给租来的，是我们当时房子中最好的。他要一个助手，住机关，也是我给找的，叫王新，圣功女中的学生。我还给他找了一个“妈妈”，这个老太太是我们冀南一个牺牲了的同志的母亲，还带来了一个小儿子，现在不知道这位老太太还在不在，她的小儿子在什么地方。

电台的呼号是我们定的，密码是我编的。马辉之四月份到延安时把呼号和密码亲自带到了延安。五月份王士光告诉我，已经和延安叫通了。

当时天津有两个电台，一个是刘绍襄家里的，这是个国民党的电台。刘绍襄与我们华北联络局有关系，当时我们也用这部电台与延安通报。报务员是国民党戴笠派来的

人，经过谢甫生和他们建立了联系。这部电台一九三五年就和我们有关系，中央通知马辉之到延安汇报也是用的这部电台。

我们自己这部电台建立的比较晚。马辉之到延安后，我们开始与延安通报，马辉之绕道西安、武汉，到了长江局，我们与长江局也通了报。后来划归晋察冀管，我们与聂荣臻同志也通报。

马辉之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我们和延安通了报。中央确定几条：一条是冀东暴动，要与八路军接应，中央已派宋、邓部队挺进冀东，冀东暴动的时间要以八路军到达的时间定。再一条是河北省委马辉之和我全部转移到冀热辽根据地去，建立冀热辽区党委，受晋察冀分局领导，负责地方党政工作。第三条是成立城市点线工作委员会。点即北平、天津、唐山，线即北宁铁路北平到山海关这一段。第一，点线工作委员会归冀热辽区党委领导；第二，三个城市的组织不叫市委，叫城委，因为他们的工作范围就在城市里，周围都是游击区或根据地，所以叫城委。

马辉之在延安通过电台把主要的决定告诉了我，详细情况是他回来后才讲的。这时，已经是一九三八年七月，冀东暴动从七月上旬已经起来了。八路军由平西到冀东，路过昌平时在沙峪和日军打一个遭遇战，参谋长李钟奇负了伤，经过组织安排，由北平送到天津治疗养伤，住在马大夫医院。医院有个护士长叫鲁淑仪，她周围有几个护士，在那里掩护李钟奇。李肋骨当中被打进了一颗子弹，没有动手术，伤养好了，直到现在子弹也未取出来。七月中旬，

马辉之到冀东就是和李钟奇一块走的。

我们冀东的交通站设在古冶。交通的名字叫傅西河。古冶有个开滦煤矿的医院，有个大夫和我们关系非常密切，我们到古冶可以住在这个医院里，然后再由交通送到根据地去。在冀东伪自治政府我们有个情报人员，叫朱欣陶，是通过我叔父的关系介绍进去的。但我叔父并不知道这件事，是我母亲帮助活动的。我父亲早丧，母亲当中学教员，我依靠母亲生活。我们和叔父平日虽有来往，但从来不要他的钱，不依靠他生活，所以母亲在他眼里很有地位，也很受尊敬。朱欣陶就是通过我母亲的介绍，到冀东伪自治政府去的。我叔父是伪自治政府的高等顾问。

朱很有活动能力，作情报工作很有本领。一九三七年他到冀东伪自治政府后，一九三八年升任警务科长，每天给我们送情报。他把情报公开送到天津我叔父家里，每件情报抄两份，叔父根本不看，我堂弟姚克荫（中共党员，在燕大读书，一九三八年放暑假回天津家里住）把送情报的信件拆开，然后送给我。一九三八年秋天我到冀东，就是先由天津坐火车到唐山，朱欣陶到车站把我接到冀东伪自治政府，吃了饭，再由我们的交通到冀东伪自治政府将我接走的。李运昌同志和朱欣陶也有联系。朱欣陶还在，今年八十八岁了，已经瘫痪。

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就是这样决定成立的。

冀东暴动时，我们原来在天津建立的关系大部分都离开了。周彬因眼睛有病，一九三七年底到北平去治眼；郝贻纯、黄元镇到南方去了；李楚离、朱其文、董毓华、张



致祥等到了冀东；赵普宣也到了冀东，《火线》停止出刊。河北省委这时也撤销了。点线工作委员会建立后，换了一套人马，新的民先队大概是由郝贻谋、岳亭(张樾堂)等负责。我和他们已经没有联系，归顾磊联系。点线工作委员会由葛琛来主持工作。我是河北省委中最后离开天津的。马辉之七月从延安汇报后回天津，随即去了冀东；九月吴德又到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天津只剩下我一人主持工作，下边的党员大部分也出去了，葛琛回天津后，我把工作交代给他后也走了。周彬、顾磊的关系是我交给葛琛的，电台也是我交给的。和国民党王若僖的联系也交给了葛琛。我到达冀东，正是旧历八月十五，过中秋节。因为我到邓华的司令部时，正碰上赵普宣等吃月饼，他们说：老姚来了，吃月饼。我刚吃过饭没有吃。他们开玩笑说：你刚从城里来，不饿。

我到冀东是九月份，正是部队准备转移的时候。这时宋时轮已经带了两个团走了，邓华说要等中央指示才能走。他认为在冀东活动和坚持有困难，应把部队转移到平西整训，这一点宋时轮、邓华两人基本上是一致的，不一致的是宋时轮未等中央指示就带部队转移了，邓华想走而没有走，在等中央指示。邓、马和我三个人商量，到底怎么办？决定打电报请示中央。但邓华的电台用的干电池，B电用完了，只有A电，所以能收延安发来的电报，本身却发不出电报。我说：只有我回天津，利用王士光的电台，向中央发报了。第二天我回到天津，发完电报，待回到冀东时，邓华已经收到中央的回电，部队开始行动了。这是

一九三八年十月份的事。我在第二次回到天津时，除到电台发报外，见到了葛琛。

回冀东，邓华把中央的回电给我看了，大意是：在冀东实在不能坚持时，可退回平西。中央基本的意思是不同意撤退，但前方将领主张退，所以中央只好讲：实在不能坚持时才可以退。

当时整个宋、邓支队对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没有经验，因而没有信心。一九三七年八月洛川会议虽然决定了在敌后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根据地的任务，作战方针基本上是游击战，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但有些同志对平原地区能否坚持游击战，如何坚持游击战，缺乏信心，也没有经验。冀中在燕山山脉以南全部是平原，“青纱帐”一倒，老远都看得清清楚楚，部队失去了隐蔽的屏障，如何坚持下去？大家都没有经验。地下党的同志们不愿意撤离，但也讲不出个坚持的道理来，所以最后还是决定撤离。实际上，当时敌情并不严重，我们的部队在转移时，也并不是在很严重的敌情下打过去的，而是由于我们没有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的经验，缺乏信心，才退了回去。

部队撤离时，留下了陈群、包森、李运昌等同志的一些部队，叫做团，实际上一个团只有四、五百人，在八路军主力部队撤离后，他们终于坚持了下来。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到达平西，邓华、马辉之和我是一路走的。吴德当时在延安。在行军过程中，我们与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的联系也中断了。

到平西后，马辉之去晋察冀开会，吴德在延安尚未回来，区党委只剩下了平西一个地方，和点线工作委员会也没有联系上。一九三九年二月，吴德开完六届六中全会回来，肖克同志也来了。中央决定还是要到冀东去开辟根据地，组织了冀热察挺进军，肖克任司令员兼政委。肖克来后，确定了一个方针：巩固平西，发展平北（昌平、延庆等），坚持冀东。吴德回来后，决定让吴德回北平、天津，并到冀东去一次，一方面传达中央六中全会精神，同时也传达我们确定的这个方针。

吴德由平西出来，到昌平，还是找的朱欣陶。朱这时调到昌平当伪县长，我给朱写了信，让吴德去找他，由他设法把吴送到北平。我们在昌平山口处有个交通站，吴找到了朱欣陶，朱是怎样把他送进北平的？说起来好象是个笑话。当时县里有个日本顾问，朱借机请日本顾问吃饭，喝了点酒，朱对日本人说：今天是周末，你是不是进城玩一趟，开个汽车去。日本人当然愿意。朱说：我有个亲戚来昌平托我找事，我没办法找，麻烦你顺路把他带回北平去。朱还当着日本人面，对吴德讲了几句道歉的话，送了他二十块钱。吴德就是这样让日本人开车送到北平的。“文革”中“造反派”问我，我讲了这个情况，他们不信。

吴德到北平后，和葛琛、周彬又重新接上了关系。

一九三九年四、五月份，区党委把葛琛调了回来，什么原因记不得了。把赵普宣派去接替葛的工作，因赵长期在《火线》刻蜡版，在外边很少活动，没有暴露过。这件事是马辉之、张明远和我三个人商量决定的。张明远是来接

替我的工作，因为彭真要把我调到晋察冀当秘书长。我是七月七日走的，那天正开“七七”纪念大会。这个时期，点线工作委员会和我们经常有联系，从北平、天津送了很多人到根据地去，可能天津的朱峥、岳亭、许萍、黄哲（张明远的爱人）、李文秀等都是这个时期来的，过去我们都不认识。北平的黄云、赵元珠等也是这时来的。

当时在区党委开了个训练班，许多由冀东过来和天津出来的同志们都参加了学习，和他们都见过面，但对他们在平津的具体情况不大了解。

一九三九年七月我离开平西以前，点线工作委员会都归冀热察区党委领导。我到晋察冀后，中央决定成立晋察冀城工委员会，刘仁是组织部副部长，领导城工委员会工作，刘慎之任城工委书记。点线工作委员会的关系就全部转给了刘仁。这大概是一九三九年底至一九四〇年初的事。一九四一年周彬到了晋察冀，一九四二年我们结的婚。至于点线工作委员会什么时候撤销的，我就不清楚了，周彬到根据地时还未撤销。可能是赵普宣被捕后，决定撤销点线工作委员会的。

关于赵普宣在点线工作委员会这一段的工作情况，我不清楚。他大概是在一九三九年三、四月份离开平西到平、津敌占区的。我七月份调离了区党委，七月份以前他没有回来汇报过。以后他回根据地汇报过几次工作？我不知道，因为我再也没管城市工作。只记得一九四一年春夏之间，我到平西去检查工作，遇见过他一次，告诉我他是回来汇报工作的。我没有同他谈城市工作情况，因为我不管城市



工作。

赵普宣被捕的情况我也不清楚。记得一九四一年八月间，刘仁在晋察冀分局会议上汇报过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被破坏，主要负责人赵普宣被捕。一九四一年底，周彬到根据地时对我说：赵曾到她家里去找她，告诉她赵已将她的名字向敌人讲了，她如能跑掉，要在三天内跑掉，否则他也没有办法。赵走后，周彬当天跑到天津。一九四三年赵普宣到晋察冀分局组织部接受审查时，找过我一次，说他一九四一年曾通知周彬跑掉，并说他是从敌占区逃出来的，先逃到冀东，又由冀东到晋察冀。

（石火、张竹涛整理）

# 我在抗战时期的经历<sup>\*</sup>

胡 愈 之

## “七七”事变之前

一九三五年，党中央和红军正在长征途中，上海党组织由于“左”倾错误的领导，几乎全部遭到破坏。三月，在上海的田汉、阳翰生、丁玲等在住地被捕，我的直接领导宣侠父，当时也去参加他们的集会，幸得楼下一个保姆示意告警，才免遭难。这样宣侠父继续留在上海活动已很危险，所以决定去香港。他临去把我的关系交给了严希纯。严希纯当时公开的职业是在徐家汇办一个小印刷厂（解放后他在中央统战部工作，已去世）。宣侠父还对我说，万一不能在上海坚持，可以去香港找他。

五月，《新生周刊》因登载《闲话皇帝》一文，日本帝国主义借机挑衅，声称此文“侮辱天皇，妨碍邦交”，要求国民党政府查办。这篇文章事先已经国民党政府审查通过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提出抗议，国民党政府就害怕了。他们找杜重远，想要回盖有审查图章的清样，以便把责任完全推到杜重远身上。我们经过商议，把这份清样放在银行保

<sup>\*</sup> 本文节自胡愈之同志《我的回忆》一稿，文中大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险库里，不予交出。这样国民党政府只好与杜重远商量，要杜到法院时只说文章未经审查通过，法院将按违反审查法而处罚款，以免引起政府间更大纠纷。但到法院开庭这一天，日本帝国主义分子认为罚款的判决太轻，继续闹事抗议，国民党最后改为判处杜重远十四个月徒刑，并勒令《新生周刊》停刊。这就是著名的“新生事件”。《新生周刊》出版一年多，在一九三五年七月就被扼杀了。

杜重远判刑后，关押在漕河泾的模范监狱。由于国民党自觉理亏，因而不能不对杜予以优待，加上当时上海警备司令是杜的同乡，所以特地为杜在监狱后面空地上造了一幢小房，有专人做饭，家人侍候，对外也有电话联系。实际只是为了遮掩日本人的耳目，在里面隐居而已。杜重远被判刑关押，引起东北军人士的关注，许多东北军的上层人物，专程来上海探望。这时张学良将军和东北军人士，对蒋介石不让东北军抗日而叫去进攻红军的罪恶阴谋已有所认识，都希望能找到新的道路，实现抗日，打回东北老家去。所以，东北军人士来看望杜重远，正是杜重远向他们做工作的极好机会，以促使东北军能反蒋抗日。当时，我每个星期日都要到杜重远那里去，把外面的消息带给他，他也叫我帮他一起做东北军人士的工作，往往在那里停留一整天。杜重远总是事先约好一些东北军的人来，我们一起与之交谈，向他们指出日本的侵略野心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本质，宣传共产党一贯反蒋抗日的主张，鼓励东北军站到反蒋抗日的一边来。谈一次不行就谈二次三次，在狱中谈了，我又和他们到外面谈，通过耐心说服，工作还

是很有成效，争取了来访的一些东北军知名人物。如高崇民，曾是张学良的秘书，他从北京专程来上海看望杜重远。我和他先在监狱里谈，后又在外边饭馆里谈，先后作了三次长谈。高崇民当时是主张三民主义的，我对他说，现在三民主义是搞不通的，只有把日本打出去才有希望，最后高崇民被我说服了，同意和共产党联合反蒋抗日。他也指出，东北军反蒋抗日还有许多问题要解决，最大的问题是西安有杨虎城，不和杨合作是不行的。他答应去西安说服张学良和杨虎城。后来他到西安工作很成功（因为张学良在南京开会时已去上海秘密会见过杜重远，杜已经给他指出了东北军、西北军和共产党共同联合抗战的道路），张学良不用说服就赞成，张还把高崇民送到杨虎城那里住下，做好了杨虎城的工作，这样就为张、杨和党谈判联合抗日奠定了基础。应该说，以后“西安事变”的发生，与我们这一时期对张学良和东北军人士的说服争取工作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与争取东北军反蒋抗日的同时，我还积极开展了组织救国会的话动。一九三五年后，日本侵略者已经越过长城，侵入华北，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新生事件”进一步表明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者怕得要命，竭尽妥协媚外之能事。在这样的形势下，全国人民深为祖国的命运而担忧，迫切希望能实现全民族的联合抗战。文化界的爱国人士，对于形势发展更为敏感，他们已逐渐地认识到：为了挽救祖国危亡，只有团结一致，奋起自救，同国民党反动卖国政策作斗争，才能实现民族的解放。我也深深地感到，群



众有着极为高涨的抗日救国热情，应该把大家组织起来，这才能够形成力量，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发展。只是这时党中央还在长征途中，白区的党组织又遭到严重破坏，抗日救国失去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但自己是个党员，应该自觉地起来，积极组织群众，推动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新生事件”后，邹韬奋已提前回国，这时的韬奋已是一个坚定的爱国民主战士，他很快地又出版了《大众生活》杂志，使它成为新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旗帜。这时我与沈钧儒也已十分接近，沈老德高望重，在文化界很有影响。我和沈老、韬奋等人，在一九三五年下半年开始，经常邀约一些文化界人士在一起聚餐，共同讨论形势和抗日救国的道路，酝酿首先在文化界发起成立一个抗日救国团体。后来“一二九”运动兴起，上海妇女界首先成立妇女界救国会，上海文化界成立了文化界救国会。以后教育界、职业界等救国会相继成立。到一九三六年“一二八”四周年，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也成立了。救国会组织已在全国发展起来。但是，就在救国会组织开始成立时，我已离开了上海。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我的联系人严希纯被捕了。那一天我给他打电话，他家楼下的女房东接电话说，楼上正在抓共产党。我赶快把电话搁下。好在那时联系都不用真实姓名，严希纯并不知道我的真实姓名和在哪里工作。但紧接着又发生了生活书店毕云程被捕的事。毕云程不是共产党员，原来是民族资本家穆藕初的高级职员，他的被捕令人惊奇，很快他就由穆藕初保释出来。毕云程回来谈了被捕后的情况，国民党特务在审讯他的时候说：“我们知道你

不是共产党，我们要抓的不是你，是要找一个矮个子的人，将来抓到了再找你来对证。”从特务描述的情况看，他们要抓的矮个子的人很象是我。联系到严希纯的被捕，他虽不知道我的具体姓名住址，但是知道一点我与生活书店有关系。我不能不怀疑严希纯是否被捕叛变，如果真是这样，我的处境就比较危险，邹韬奋等也劝我暂时离开上海（后来事实证明我的怀疑没有根据，严希纯在狱中表现很好，我也没有暴露）。

同时，我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办，这就是我们对张学良和东北军的争取工作已有成效，张学良已决心抗日，应该尽快地把这情况向党中央报告。严希纯被捕，我与党组织的联系断了，而且我也知道，这时上海的党已遭严重破坏，也已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这样唯一的办法只有到香港去，到那里去找宣侠父。

香港本来就是五方杂处的地方，各种人物都在那里存身。特别当时香港殖民统治者的英国，正忙于欧洲应付对德国的争斗，对亚洲无暇照顾，加上当时的蒋介石政府，与德国法西斯的联系比较密切，这样就促使英国殖民统治者在香港对共产党和革命力量的压迫有所放松，对各种反蒋势力在香港的活动也不加干涉。所以当时的香港环境，还算比较自由，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陈济棠等等实力派都有代表在香港，互相串连，酝酿反蒋，很是活跃。十二月十日左右，我匆匆地来到了香港。

我在香港找到了宣侠父，那时他已担任党的华南工委书记。我向他谈了我们对张学良和东北军工作的情况，宣

侠父也觉得这事情很重大，应尽快报告给中央。但是，这时香港与党中央也失去联系，只是通过法国巴黎的《救国时报》能与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团联系。所以宣侠父决定让我经法国去苏联，直接向驻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团汇报情况。

不久，就得到了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答复，同意我立即前往，同时还转来了苏联邀请鲁迅先生前去疗养的信息，要我把鲁迅先生带着一起去。这样，一九三六年一月，我又秘密回到上海，约鲁迅先生到一个咖啡馆里，向他转达了苏联的邀请，但被鲁迅先生谢绝了。我就当即返回香港，做去苏联的准备工作。当时金城同志就在香港帮助宣侠父工作，我的出国具体准备工作都是由他协助安排的。我以华侨商人的身份弄到了护照，先坐船到法国，在巴黎办《救国时报》的吴玉章同志接待了我，帮我办好去苏联的手续，二月我顺利地到达了莫斯科。

在莫斯科车站接我的是潘汉年，这是我意想不到的。潘汉年一九二七年在上海办创造社出版部和《幻洲》杂志时我们就已认识，我原以为在莫斯科遇不到熟人呢！后来我才知道，潘汉年是在遵义会议后辗转来到苏联的。在苏联还遇到两个熟人，一个是生活书店的艾寒松，他是《闲话皇帝》的作者，“新生事件”发生后，他流亡出国，这时到了苏联；另一个是杨之华，瞿秋白同志牺牲后，是我转告她出国来苏联的。

我向当时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团长的王明，详细地汇报了国内的情况，特别是关于张学良思想转变的情况和

东北军的动态。本来在我穿的衬衫上，有一份详细的书面报告，不知什么原因，到莫斯科后恰显影不出来，这样我又不得不花很多时间，重新写了书面报告。以后潘汉年又向我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精神，他参加了一九三五年七月召开的这次大会。他对我说：在这次大会上确定了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同时也要求凡遭受法西斯侵略威胁的国家，国内都应联合各党派各阶级群众，建立民族统一战线。这在中国，也就是要实现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也就在这时，我才看到了由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起草，以党中央名义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康生也找我谈了一次话，问了我入党的经过，叫我填写了一个登记表。康生那时在管组织工作，他看了我的履历还恭维地说：你还是练习生出身！意思是说我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大概在十一月前后，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已取得了联系，张学良也与陕北党中央有了直接来往，国民党政府这时已与苏联恢复了外交关系，并通过其驻苏使馆的邓文仪与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有所接触，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在酝酿和行动了。所以到了四月，王明找我说：你的任务已经完成，张学良和东北军的事情党中央已经知道，你可以不用管了。你回去把潘汉年带回香港（因为潘汉年不懂外语），以后你的工作就由潘汉年直接领导。这样一九三六年四月间，我和潘汉年又经法国坐船回香港。

我们到法国巴黎，就接到了邹韬奋从香港发来的电报。



原来我离开上海后，就爆发了“一二九”运动，邹韬奋办的《大众生活》周刊，全力支持了这一运动，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涨，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了，不久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也成立了。邹韬奋的爱国行动却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慌，他们先是派特务头子刘健群、张道藩来和邹韬奋谈话，并以死来恫吓；后又由杜月笙出面来约邹韬奋去南京和蒋介石面谈，要邹韬奋到蒋介石身边去工作，企图以高官厚禄来笼络他。在这种情况下，为避免意外，邹韬奋又一次流亡，于一九三六年三月来到香港，他决定在香港创办一张报纸。当时两广的国民党实力派正在策划反蒋，所以对邹韬奋办报表示愿意在经济上给予支持，但报纸要为两广反蒋作宣传。邹韬奋给我打电报，是要我赶快回香港帮他筹办报纸。我和潘汉年商量，潘汉年认为报纸不能再搞反蒋宣传，要我打电报给邹韬奋，报纸先不要出，等我回到香港再“择吉开张”。五月初，我们到了香港，我向邹韬奋介绍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方针，告诉他我们报纸的宣传也应由反蒋抗日向联蒋抗日转变。这样我们办的《生活日报》就没有接受两广实力派的经济资助，报纸在六月七日创刊，也不提两广的反蒋运动，不久两广的反蒋活动也因被蒋介石分化收买而告失败。这是我从共产国际回来，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促进国共合作的最初行动。

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一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上海召开，成立了全国性的救国会组织。但参加这次大会的代表，有一些是地下党员，还有一些是国民党反蒋实力派

的代表（如两广、十九路军和冯玉祥等的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真正中间派的代表很少，所以会议的宣言、口号都比较“左”，对蒋介石国民党不能起争取团结的作用。根据这个情况，潘汉年特地找了在香港的邹韬奋和陶行知，做了说服工作，由我帮助起草了一个告全国同胞书。这个文件基本上和《八一宣言》的调子相近，是站在中间派的立场写的，主张国民党要停止内战，共产党要废除苏维埃和工农红军，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这个文件由邹韬奋、陶行知签名后，再由邹韬奋亲自去上海要沈钧儒、章乃器签名，因为他们四个人都不是国民党员，也不是共产党员，章乃器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邹韬奋到上海后，沈钧儒同意签名，但章乃器却嫌文件太右了，坚决主张修改，甚至连题目也改为《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修改后的文件，虽然还保留了和《八一宣言》相同的一些论点，但失去了中间派要求的特色，因此对群众影响不大，国民党地区报纸很少登载，只是《生活日报》登了，整个作用和意义就不大了。

潘汉年回来，是受共产国际委托到国内和国民党谈判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当时他没有向我透露，只对我说：“以后你只管救国会的事，别的不要管，有什么问题来找我，没有问题你就自己去干吧！”所以在香港和上海，我和他见面并不多，他主要忙于找国民党的一些重要人物或特务头子谈话和接触，当时他接触比较多的是国民党的组织部副部长张冲。有时他找国民党人士谈话时也把我邀去，往往是在饭馆和高级咖啡馆里，并故意对国民党人说我是

救国会的，对共产党有意见。他是有意用这种方法把我公开出去，使国民党知道我是救国会，不是共产党。

在香港除进行上述一些活动外，主要是协助邹韬奋办起了《生活日报》。但这份报纸寿命很短，因为香港地处一隅，发行数量有限，经费便渐渐不支，只出了五十五期，于七月底就结束了。这件事掩护了我去香港和去苏联的秘密，大家都认为我这半年多不在上海，是去香港筹办出版《生活日报》的。

大概是六、七月间，我在香港接到了冯雪峰的来电，他从陕北来到上海，要找我了解情况，这样我回到上海一趟。冯雪峰是四月底就到上海的，他从陕北出来时，党中央领导同志告诉他，可以先去找鲁迅和我，以摸清上海党员的情况，把上海党组织恢复起来。我和冯雪峰见面后，向他详细介绍了上海的情况，并据我所了解的，介绍了一些可靠的党员，如夏衍等。我还告诉他，潘汉年已经在香港，后来潘与冯见了面，潘正是根据冯雪峰提供的交通路线去陕北找党中央的。冯雪峰也是根据我提供的情况，联系了留在上海分散活动的一些党员，成立了上海党的临时工作委员会，开始重建了上海党的组织。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个问题：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中，对冯雪峰进行了批判，其中揭发的一条罪状是，冯雪峰从陕北到上海，不先去找党员，而是先去找鲁迅和胡愈之这两个党外的人士。当时我和冯雪峰都不好作解释说明，冯雪峰只好忍受着委屈。现在冯雪峰同志已经去世，我有责任把这事情说清楚。我想中央所以叫冯雪峰先来找我，这是因为中央知道我是

特别党员，一直在上海活动，没有暴露。而对其他留在上海的党员，因与中央久失联络，是否有变化，中央不大清楚，所以要冯雪峰先找我了解情况，然后才决定是否联络这些同志。

我回上海后，仍在潘汉年领导下，以救国会的身份从事抗日救国运动。潘汉年不久去了陕北，回来后作为党中央的正式代表，从事国共合作的谈判。这一些，潘汉年当时没给我讲过，我是不知道的。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清晨，我接到冯雪峰的电话，他告诉我鲁迅先生逝世的消息。这犹如晴天霹雳，当时我都惊呆了。鲁迅先生是我最尊敬的师长，他对我也十分关怀和信任，虽然为了先生的安全，我很少去先生家里，但通过周建人和其他同志，我对先生的情况是了解的，先生有什么事也总是通知我的。我从香港回上海后，就听说先生病了，我认为还象过去一样，治疗一段时间就会好的，没想到竟至不起。冯雪峰还告诉我，鲁迅先生的丧事，决定由救国会出面来办，要我和救国会联系和组织。这样，我把这个沉痛的消息又告诉沈钧儒和救国会其他领导人。我和救国会的一些领导人共同商讨决定：鲁迅先生的葬仪以上海救国会联合会名义主办，并应通过鲁迅先生的葬礼，发动一次民众的政治性示威，把抗日救国运动推向新的高潮。由于大家的努力，使先生的葬礼进行得十分隆重。先是把先生的遗体安放在万国殡仪馆，让各界民众瞻仰遗容和吊唁三天。二十二日下午二时起灵，把送葬的仪式变成了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本来在租界里是不准游行示威



的，这次是送葬，租界当局也不好阻止了。六七千人的送葬队伍，浩浩荡荡，大家唱挽歌、呼口号，声势很大，反映了群众对鲁迅的爱戴，也表示了人民的觉醒和意向。蔡元培、宋庆龄都参加了葬礼，并在葬礼上讲了话，沈钧儒在葬礼的最后宣读了悼词。鲁迅先生的葬仪团结了左、中、右各界人士和广大民众，体现了鲁迅先生不分派别，一致对外，联合抗日的精神，向消极抗日的国民党反动派和气势嚣张的日本侵略者显示了团结抗日、一致救亡的威力。

鲁迅葬礼所显示的汹涌澎湃的抗日救亡运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慌，他们再也按捺不住对救国会的仇视，终于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晨悍然逮捕了救国会的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等七人，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救国会“七君子”事件。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特别是救国会成员的极大愤慨，掀起了声援和营救“七君子”运动。

救国会是一个群众性的爱国团体，并没有严密的组织，也没有专门的办公机构和办事人员，一切活动主要靠全体会员的爱国热情和自觉行动。被捕的“七君子”是救国会的主要领袖和领导核心，现在他们被捕了，我担负起了声援营救的组织工作。救国会没有办公机构，生活书店成了救国会的联络机关，各地来的函电都寄到生活书店，接洽事情也找到生活书店，这都得由我来处理。我并没有在救国会担任职务，这时却成为了声援营救运动的组织者指挥者。在这场援救运动中，冯雪峰和上海临时党组织，也给予了积极的领导和配合。当时我们一面组织律师，准备为“七

君子”辩护；一面通过报纸等舆论工具，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揭露和抗议，也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

国民党蒋介石一意孤行，在压迫群众性抗日救国运动，逮捕救国会领袖的同时，他又亲自去到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进攻陕北打共产党。张、杨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采取断然措施，把蒋介石扣留起来。“西安事变”发生，使国民党内部一片混乱，也危及在狱中的“七君子”的安全。但由于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决策，迫使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条件，使“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也为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

对于解决“西安事变”的态度，救国会内部是不完全统一的，有的人主张杀蒋。当时南京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亲日派何应钦已想趁机去掉蒋介石，由他们取代蒋介石统治。亲日派上台，只能扩大内战，加紧对爱国力量的压迫，“七君子”的安全也更难保障。所以，我们在救国会对“西安事变”的宣言中，坚持救国会的一贯立场，强调团结，明确提出释放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为了营救“七君子”，我们内外配合，进行各方面的努力和斗争。在监狱内部，正如沈钧儒提出的“六个人是一个人”，坚持抗日救国的原则立场，以一致的主张和行动进行斗争。我们用一切办法把消息送到狱内，使他们正确了解外面的形势，确定斗争对策。特别是“西安事变”后的一段时间里，国民党反动派突然加强了控制，不准到监狱探望，也不准他们看报，我就把国际国内的形势及斗争的设想写成信，贴身放在韬奋、公朴、乃器的几个小孩身上，

由孩子带进监狱（当时由于看守所所长的同情和通融，允许小孩进去探望）。我们还设法把单独关押在女监的史良，也和男监互通信息，这样“七个人是一个人”了。在监狱外面，我们发动了广泛的援救运动，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等发表宣言要求释放“七君子”；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事变”的通电中也要求释放被捕的爱国领袖；广西的实力派李宗仁、白崇禧也发电营救；各地文化界、学生等更是纷纷致电国民党政府，要求释放七位爱国领袖，北平学生还以罢课和组织请愿队到南京提出释放要求。国外杜威、爱因斯坦等著名和平民主人士也来电声援，欧美华侨也来电营救。我在新闻界有很多朋友，我们把所有可以利用的报刊等舆论工具都动员起来，大量报导“七君子”在狱中的斗争和国内外各方面人士的援救情况。在全国一片“爱国无罪”、释放救国会的领袖的强烈抗议声中，国民党反动派政府十分为难。人已经抓起来了，简单释放他们，反动派不甘心，关下去判刑，全国人民不答应，所以只能不放不审，一直拖着，后来拖不下去了，一九三七年四月国民党政府才勉强提出起诉，起诉书提出的所谓“罪行”是拼凑起来的，根本站不住脚，因而引起广大群众更大的不满和抗议。到了六月才开庭审判，“七君子”在法庭上义正辞严的申辩，使检查官们十分尴尬。在第一次审判的当天晚上，我根据现场采访的记者汇报的情况，赶写了一篇《爱国无罪听审记》的报道，第二天在上海几个报纸以差不多整版篇幅登载出来，揭露了反动政府所谓审判的真实情况，引起了轰动，更增加了对国民党的舆论压力。过了一些日子，

即六月二十五日，国民党法庭进行第二次审讯。这次国民党又想玩弄花招，企图使审判草率结案，给“七君子”加上一点罪名，然后送反省院悔过再予释放。我们发现了反动派的花招，“七君子”以申请法官回避的办法，打乱了法庭草率结案的企图。我们在外面，也在这一天发起了爱国入狱运动，我们请宋庆龄、何香凝牵头，诸青来、彭文应、潘大逵、王统照、张天翼、张宗麟、陈波儿、沈兹九和我等共十六人，向苏州高等法院送了一个呈文，提出“七君子”爱国有罪，我们愿与他们一起领罪。第二天我们又向新闻界发表书面谈话，发布了《救国入狱运动宣言》。这一来引起了社会上的震动，全国各界纷纷响应，都签名要求爱国入狱。七月五日，宋庆龄、潘大逵、彭文应、沈兹九、陈波儿、张天翼、胡子婴、汪馥炎、张定夫、张宗麟和我等十几个人一起来到苏州见高等法院院长，自请入狱。我们的责问，使得法院院长狼狈不堪。爱国入狱运动进一步揭露了国民党不抗日又迫害爱国者的罪行，进一步争取了国内外舆论对“七君子”和救国会的同情。这就迫使国民党法院更不敢冒然对“七君子”判罪，终于在七月底国民党政府被迫无罪释放了“七君子”，这场斗争以我们的胜利而告结束。

## 上海—武汉—桂林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进攻，上海各界群众，纷纷要求国民党



政府坚决抗日，但国民党政府仍在犹豫动摇之中；“八一三”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国民党政府这才宣布对日全面抗战开始。

为了迎接抗战，更好地开展救国会的活动，我积极联络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爱国人士，以聚餐会的形式组织起来，以发挥他们在抗日救国中的作用。这些大都是中间派的代表人物，有文化界、新闻界、工商界、银行界、宗教界、妇女界的，也还有在海关、在租界工部局工作的，主要人物有刘湛恩、韦恂、郑振铎、王芸生、萨空了、梁士纯、陈已生、孙瑞璜、丁贵堂、徐新六、胡玉琪、吴耀宗、沈华兰、陈鹤琴、严景耀、王国秀等。大家约定每星期一晚上一起座谈一次，所以也叫“星一聚餐会”。最初座谈，大家推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主持，后来刘湛恩被刺杀，才由我来主持。负责聚会具体工作的是张宗麟（他是陶行知组织的国难教育社的，在救国会里他一直是我最有力的助手，后来他去延安，建国后曾任教育部司长，已去世）。王任叔后来也参加这个聚餐会，他是潘汉年、冯雪峰让来协助我做救国会工作的。聚餐会主要是在一起讨论形势，研究如何开展救亡工作。

抗战开始，在我党的积极努力和全国人民强烈要求下，国民党蒋介石被迫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团结抗日的具体建议，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但是，国民党一开始就实行了一条片面抗战的路线，企图极力限制党和人民力量的发展。为了限制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他们以统一救亡运动为借口，首先在上海组织了各界抗战后

援会，规定“所有合法团体皆应加入本会一致行动，不得再有任何其它救国性质的团体和单位行动。”同时，国民党为了篡夺上海人民自己组织起来的文化界救国会的领导权，他们又搞起了一个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并在报上登出通告，准备在七月二十八日召开成立大会，要求文化界人士前去参加。本来上海文化界爱国人士，已经组织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文化界救国会实际也是救国联合会的核心组织，现在很明显，国民党要以文化界救亡协会来代替文化界救国会，从而控制文化界的抗日救亡运动。当时“七君子”尚未释放，我们经过研究，认为为了团结抗战，为了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化界救国会成员还是要参加进去，在内部争取合法的抗日救亡活动的权利。

七月二十八日，上海文化界五百多人参加了大会，会议宣布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会议推举了理事，这个理事名单是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事先拟好了的，虽然也包括了宋庆龄、何香凝、茅盾等左派著名人士，但不少是国民党右派文人。常务理事会更是由国民党所控制，由国民党CC派骨干潘公展当了主席。在具体工作机构的人员安排上也是这样，如宣传部就是由国民党反动文人周寒梅当了部长。我被推为协会的常务理事，还当了宣传部的副部长。可是这位宣传部长却是专门反对我的，这个人后来也去了南洋，为国民党办报，继续与我作对。

为了冲破国民党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限制，根据党的意见，我们采取组织文化界各专业救亡团体的办法，以团体会员名义加入文化界救亡协会和各界抗敌后援会，同时又

保持各团体的独立自主性，来发展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于是相继成立了戏剧界、游艺界、漫画界、编辑人等各种救亡协会，党和左派人士在这些协会中都占居领导地位，开展了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在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宣传部里，在周寒梅的把持下是做不成什么事的。为了放开手脚开展一些宣传工作，我们提议成立一个国际宣传委员会，专门负责对外宣传，由我负责，上海各报的负责人和主编都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任务是向国外宣传中国抗战的情况，争取国际上对我国抗战的真实情况的了解和对我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我们还提议出版宣传抗日救亡的报刊，于是办起了《救亡日报》，由郭沫若等任编委，夏衍具体负责，《救亡日报》不属宣传部管。另外还有张志让等编的《中华公论》，邹韬奋主编的《抵抗三日刊》等。这样对内对外的所有宣传阵地都为我们所掌握，周寒梅根本无法控制，他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只能不管了。宣传部的事情也就由我包办了起来。

从“八一三”上海抗战开始到上海陷落这一段时间里，我主要从事国际宣传委员会的工作。我们用国际宣传委员会的名义，把上海新闻界团结起来，各报的进步记者在各地的采访，我们把它汇集起来，还从正在筹设的上海八路军办事处要来党中央和八路军挺进敌后的消息，这样就有了广泛的新闻来源，又组织了一个小班子把这些新闻编写成稿，并译成外文打印出来，就可对外发布了。救亡协会有钱，我们在国际饭店楼上包一个会议厅，每天在那里向外国记者发布一次新闻。一般都是先由国民党淞沪前线指

挥部派来的参谋人员介绍当天战况，但这种介绍往往十分枯燥刻板，甚至报喜不报忧，歪曲战争实况，根本引不起外国记者的兴趣和国际上的注意。国民党军方发言后，我们就发给每位外国记者一份新闻稿。这份新闻稿的内容，都是我们联系的记者从实地采访来的，真实而又生动，不仅有前方战争情况的报道，还有后方全中国人民同仇敌愾，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消息；不仅有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情况报道，更还有共产党八路军挺进敌后，开辟敌后战场，取得平型关等战斗重大胜利的消息。所以这份新闻稿很受外国记者的欢迎，他们大量采用，发往国外。这样，我们突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向国际上宣传了中国抗战发展的真相，特别是使国际上了解到了共产党八路军在实现抗战中的重大作用。国际宣传委员会的工作班子，后来成立了国际新闻社。上海陷落后，国际新闻社迁到香港，他们人数不多，主要是张明养、王纪元、郑森禹、恽逸群等五、六个人，始终坚持了这块对外新闻宣传阵地，后来还和范长江办的国际新闻社统为一体，一直坚持到太平洋战争爆发。

十月十九日是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日。还在七月中旬，我们就成立了以宋庆龄、蔡元培为首的纪念委员会，准备出版鲁迅全集。在纪念日的这一天，我们举行了报告会和座谈会。就在这个纪念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同志（他是和国民党谈判途经上海的）。他在会上做了报告，传达了毛主席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介绍了八路军在华北战场所取得的辉煌胜利，号召坚决打倒日本帝国主



义和汉奸卖国贼。周恩来同志的讲话给了当时在上海坚持斗争的爱国救亡人士以极大的鼓舞，为大家指明了走向胜利的方向。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上海陷落。英、法租界当局宣布中立，这样租界完全成了日寇四面包围下的孤岛。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在上海的救亡团体和各界爱国人士纷纷撤离上海去香港或武汉等地，原来出版的许多抗日救亡报刊都被迫停刊，继续发行的一些报刊也不能不改变调子，原来搞得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文化宣传工作，一时冷落下来。我没有立即撤离，继续在上海坚持。形势变了，我们留在上海的人在一起作了研究，决定重新开始。公开的抗日活动不能搞，就深入到群众中去，组织对难民、工人、市民的宣传教育；还出版了《团结》、《上海人报》、《集纳》、《译报》等报刊，以隐晦曲折的方法来报道抗战的消息，宣传和教育群众。后来我们还以“社会科学讲习所”的名义，来训练抗日救亡团体的骨干，我负责办了第一期，王任叔办了第二期。经过培训的学员，有些被输送到上海周围的游击队和新四军去，增加了抗日战斗力量。

就在这个时候，埃德加·斯诺交给我一本由伦敦戈兰茨公司刚刚出版的《西行漫记》（该书原名《红星照耀中国》）。我看后觉得很好，这是第一个西方新闻记者，冲破严密的新闻封锁，冒了生命危险，进入陕甘宁边区，进行实地采访而搜集到的第一手资料。我还询问了当时在上海的原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刘少文，他向我介绍了斯诺去陕北的情况。我决定设法尽快地把这本书介绍给我国人

民。这时书店、出版社都搬到内地去了，但印刷厂搬不走，闲起来了，工人也失了业，生活很困难。商务印书馆的印刷厂，印刷能力很强，技术也很好，工人我都认识，他们来找我，问我有没有书给他们排印。我说有书要排印，但是现在拿不出钱。他们说，钱慢一步不要紧，先排印出来，书卖了就有钱了。于是我立即邀人一起进行翻译。用什么名义出版呢？就临时想了“复社”这个名字，其实它不是什么出版社。“复社”就设在我的家里，当时参加“复社”一起翻译和工作的就是王任叔、梅益等几个人，还有我两个弟弟仲持和学恕。排印费可以暂欠，买纸张的钱怎么办？当时参加星一聚餐会的人凑了一点，同时我们又采取暗中预约推销的办法，定价一元钱一本，先收钱买纸，印出来就给书。就是这样，只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书就出版了。第一次印一千本，很快就卖光了。开始大家不知道书的内容，当知道是写共产党、写红军、写延安的书，买的人就更多了，仅半年就印了五、六版，卖到八、九万本，还运到香港、南洋去卖，轰动了当地华侨。随后我们又翻译出版了《续西行漫记》，同样受到国内人民和华侨的欢迎。

有了出版《西行漫记》的经验，就想到也可以用群众的力量来出版《鲁迅全集》。早在“七七”事变前，关于出版《鲁迅全集》的事，曾和商务印书馆谈过，因一些问题不好解决而拖了下来。接着就是战争爆发，上海陷落。当时上海形势很紧张，日军随时可能占领租界，鲁迅先生的大量文稿，经许广平的辛勤收集和初步整理，全留在上海，要是被日本人弄去就麻烦了。搬到国民党地区也不行，鲁迅

的书是被国民党禁止出版发行的。所以许广平十分着急，找大家商量。大家认为，把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完整地保存下来的最好办法就是出版《鲁迅全集》，“纸张寿于金石”嘛！在上海，出版力量较强，纸张价格也较便宜，依靠群众，组织群众，迅速把《鲁迅全集》编印出来是有可能的。没有出版资金，我们决定也采用预约推销的办法来筹款。五、六百万字的鲁迅著作，相当于《西行漫记》二十本，就得卖二十元钱一部，时处战争，广大读者都没有钱，能一下用二十元钱买一部书的人能有多少？于是又想出一个办法，决定把书搞成普及本和精装纪念本两种，把普及本的价格降下来，八元钱一部，这连工本费都不够；另一种精装纪念本，不仅装订讲究，而且每部都有一个专门书箱，外刻有“鲁迅全集，蔡元培题”的字样，每部售价一百元，实际成本二、三十元，以盈补亏，整个出版发行就可以不赔钱了。想出办法后，我就到处奔走联系，组织了百数十位学者文人和工友，共同来为全集的编排印校出力。为了争取扩大发行，用“复社”的名义出版不行了，就改用“鲁迅纪念委员会”的名义，实际上只是用会长蔡元培和副会长宋庆龄的名义。我征得刘少文同志的同意，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下旬离上海到了香港，把出版《鲁迅全集》的计划向蔡、宋两位报告，得到他们的赞同和支持，蔡元培当即挥笔写了“鲁迅全集”四个字。蔡元培是国民党的元老，声望很高，他题签的书，国民党也就不能对它怎么样了。接着我就赶印了预约书券和广告，开始推销。一百元一部书，只有富人才买得起，而一般有钱的商人是不会对《鲁迅全

集》感兴趣的，到底能推销多少？心里也很没有底。当时富人都已集中在香港、广州、武汉等地，所以我就先从香港开始推销。推销的办法是开茶话会，把那些进步的资本家，各界开明人士，乃至国民党要人请来参加，清茶一杯，主要向他们介绍有关《鲁迅全集》的情况，请他们签名购买预约书券。路过广州时我也这样做。到武汉后，情况更好些，有周恩来同志在那里，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也积极帮助我推销，很快经我的手就推销出了一百多部，当时如孙科、邵力子等人，都是一下就订购十部。此外，在美国有陶行知，南洋方面有王纪元，华南地区有巴金、茅盾，也都积极推销了不少部，就连上海本地预购的也是出乎预料的多。通过上述途径，我们在很短时间内就筹集到了三、四万元出版资金，各地把书款很快寄到上海，上海马上买纸开印。这样，从二月到六月，仅历时四个月，就将一套全集六百余万字，多达二十卷的丰厚文学瑰宝，送到了广大读者手中，这在我国出版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通过《鲁迅全集》的出版发行工作，广泛团结了各界抗日救亡人士和群众，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使鲁迅精神得以发扬光大。我在此项活动中既表达了我对鲁迅先生的纪念之深情，也尽了我在抗日救亡工作中的一份责任。

我到武汉后，就没有再回上海，周恩来、郭沫若把我留下了。他们要我到军委会政治部去工作，担任第三厅的第五处处长。军委会政治部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后，由国共双方人员共同参加工作的第一个机构。陈诚当政治部部长，周恩来，黄琪翔当副部长，郭沫若担任主管宣传的第三厅



厅长，第三厅的人事安排是由周恩来同志与各方面协商确定的，集中了全国文化界的许多知名人士，五处是以救国会人员组成。我不能推托，只好接受了这个职务。

我负责的第五处是三厅下面主管宣传动员工作，也就是搞文字宣传工作的。国民党的官是不好做的。当时国民党只是为了装门面，才让共产党和其他爱国人士参加到这个政治部来工作的，根本不是想叫你真正来发挥作用为抗战出力。他们千方百计地限制我们，我们得不断地斗争和争取，才能做一点有利于抗战的事。当时就有人说我们是“当抗战官，吃磨擦饭”，我真不愿干这样的工作。我曾向周恩来同志提出辞职到延安去，他没有同意，还为此找我作了一次通宵达旦的长谈。他要我好好学习《论持久战》，指出只有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我们尽力做好宣传工作，提高群众的认识和觉悟，就可以抵消反动派的一部分影响，使他们搞颠倒黑白和投降阴谋难以得逞，就能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要排除万难去做好工作，同时在向国民党进行统一战线工作中，又要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不作无原则的让步。周恩来同志要我坚持岗哨，做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这一时期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和教育下工作，使我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认识有了很大提高。

但是，尽管我们努力争取，也还是做不了多少工作的。首先，我们的宣传教育工作的范围是限制在对军队内部，对民众的宣传是管不着的；其次，即使是军队内部，我们对下属政治部机构也无权指挥；此外在经费上、具体工作

安排上还有种种限制，这样当然是难把工作做好的。我到三厅后，除了参加组织“七七”抗战周年纪念活动，到部队进行慰问活动外，扎扎实实的宣传工作没有做什么。我们编写了一些供战士用的宣传材料，但这些精神食粮在送往部队途中，往往被国民党扣留了。不过在三厅，我们也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就是对外的新闻宣传工作。当时武汉是抗战中心，从天津、上海撤出来的文化人都集中到了武汉，其中有些人是原来当过记者办过报刊的，也有很多青年学生，他们愿意投身于抗日的新闻事业，他们找到八路军办事处，找到三厅，于是党组织成立了青年记者学会。我们又以政治部三厅的名义，派他们到部队去担任战地记者。这些记者到各地去后发挥了很大作用，寄回来许多战地的真实消息。当时国民党中央有个国际宣传处，专门负责发布对外的新闻。这个处的负责人是曾虚白和董显光，曾虚白过去常向《世界知识》投稿，我们早就熟悉，关系也还不错。他们那个国际宣传处，没有什么力量，发不出多少消息，这样他们和三厅联系，由我们编写战地新闻，每周一次和国际宣传处一起向外国记者发布，报道了中国抗战的一些真实情况，这和我在上海国际宣传委员会的做法差不多，也很受外国记者的欢迎。后来曾虚白、董显光想自己组织力量，于是就拉范长江，要范长江脱离《大公报》，到他们那里去。范长江找我和周恩来同志商量，周恩来同志认为可以去。我们叫范长江这样和曾虚白交涉：我一个人去没有用，要去我们就成立一个国际新闻社，用一批人，这样才能保证新闻的供应。后来曾虚白同意了。这

样我们着手组织国际新闻社，算是一个由新闻工作者用合作社形式创办的通讯社，但它又是得到国际宣传处认可的，取得了采访和发布新闻的合法地位，国际宣传处每月还供给几百元稿费。国际新闻社因武汉失陷而一直到桂林才正式成立。

在三厅工作时还有这样一件事：八月十五日这一天是国际青年节，我在《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表示对苏联等国际援助我国抗战的感谢，也鼓励我国青年努力向上，英勇抗战。但就是这样一篇文章，蒋介石看了后，在上面用红蓝铅笔划了许多杠杠，批得乱七八糟，陈布雷写信把这份划过的剪报送来了，信上还写着说：蒋介石看了很不满意，以后不要再有这样色彩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过了几天，还把郭沫若叫去当面申斥。可见国民党的限制是十分严厉的。后来，国民党凶恶面目越来越暴露，在八月底，陈诚甚至公然把武汉三个有名青年团体（青年救国团、民族先锋队、蚁社）勒令解散了。

在武汉这段时间里，我们也受到王明右倾错误的影响。当时王明只讲联合，不讲斗争，要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这也影响我们在一些事情上不敢冲破国民党的限制，争取更多做一点工作。关于救国会的，有两件事：一件是救国会的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等这时都在武汉，他们在一起开会讨论，开始恢复救国会的活动。但救国会原来只是一个松散的人民群众团体，在新形势下这样的组织是否存在，或是组织成政党形式，我把这个问题向王明、博古谈了多次，都不得要领。实际上王明是不敢冲破国民党的禁令，怕救

国会变成政党会引起国民党的不满。另一件是杜重远的工作安排。当时杜重远没有正式工作，思想上很苦闷，他是可以到国民党里去做事的，国民党也拉他，他可以在那里做有利于人民抗战的事，但这要得到我们党的谅解，可是我找王明，他却迟迟不敢决定。后来杜重远只好去新疆，在那里牺牲了，这是十分可惜的。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已在日寇包围之中，国民党军政机关已都纷纷撤离。就在这时，朱德同志到了武汉。我在周恩来同志住处第一次见到了他，他和我亲切地谈话，还为我题词，说我是国际问题专家，给我以很多的勉励。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夜，我和郭沫若最后撤离武汉。随后武汉就陷于敌手了。我们从武汉坐船到沙市，再坐车到长沙，这已经是十月三十日了。到长沙不久我就听说军委会政治部要精减整编，三厅各个处都将撤销。这时，从武汉撤下来的军委会政治部也是一片混乱，实在没有什么工作可做。我在三厅已五个多月，觉得很难再这样干下去，现在要整编，我正好趁机提出辞职。这次得到周恩来同志的同意，但他不让我去延安，而要我去桂林，到那里做好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的统一战线工作，同时把桂林的抗日文化工作搞起来。这样，我在十二月十日左右离长沙去桂林，长沙大火的消息是在路上听到的。

自从武汉失陷后，国民党的统治中心转移到了重庆。当时重庆的环境很恶劣，汪精卫一伙亲日派早就到了那里，汉奸、特务都在那里集中，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武汉后，加强了对国民党的政治诱降，蒋介石开始向消极抗战、



积极反共方向转化。在这种气氛下，在重庆要开展抗日文化活动十分困难。相反，这时广西的情况却比较好，广西的实力派和蒋介石有矛盾，李宗仁、白崇禧在政治上左右摇摆，在抗日态度上表现还比较坚决，广西是他们的地盘，国民党的特务也不大敢在广西胡作非为，所以，广西一时就成了西南后方政治气氛比较新鲜活跃的地区。也因此，周恩来同志要我到那里开辟抗日文化阵地，他还把我介绍给白崇禧，要我去做他的秘书。

我来到桂林，当时桂系主要人物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等搞了一个广西建设研究会，这表面是一个学术研究团体，实际是桂系联系各方面政治势力，标榜进步的一个政治组织，也算是李、白、黄的一个智囊集体和咨询机构。该会的具体工作是由担任常务理事的著名开明人士李任仁、陈劭先两人主持。李任仁和陈劭先都与救国会有过联系，在他们安排下我被聘为广西建设研究会的委员，还当了该会的文化部副主任，这样我与广西上层人物建立了关系。但我没有当白崇禧的秘书，因为他把想找我当秘书的事告诉了蒋介石，蒋介石坚决反对，这样白崇禧也就作罢了。

我到桂林的同时，国际新闻社也正式在桂林建立，接着从武汉、广州撤离下来的大批文化人也都来到桂林。先是《救亡日报》迁来桂林，不久就在桂林复刊；原来由三厅组织起来的一些文艺界人士和团体，也来到桂林立足和演出；随后生活书店等出版机构也纷纷来桂林设立分店和门市。我也把救国会名义办的一个刊物——《国民公论》迁到

桂林继续出版。这样本来是“文化沙漠”的桂林，抗日文化运动却迅速发展起来，很快成了国民党统治下大后方的唯一抗日文化中心。为了发展广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桂林的抗日文化宣传工作，周恩来同志曾三次来桂林部署工作，并与白崇禧商妥，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在桂林设立了以李克农同志为首的八路军办事处，这样大大加强了党对广西地区工作的领导。

一九三九年一月，我为与沈钧儒等救国会领导人商讨开展桂林文化工作问题，也应邹韬奋邀约商讨生活书店工作，到了重庆。沈老等决定，以救国会名义，与广西建设研究会合作兴办文化事业。生活书店迁到重庆后，环境十分艰险，在国民党的压迫下业务活动很难开展。我和韬奋等共同商讨了生活书店今后工作的方针，决定生活书店大力发展分店，把抗日文化种子洒到全国各地去。各地分店既与总店相联系，又独立经营和发展，这样既可扩大生活书店的业务和影响，也可避免国民党一下就把生活书店扼杀。在经营方针上，我提出了促进大众文化，供应抗战需要，发展服务精神的原则。我们还调整健全了生活书店总管理处的机构，成立编审委员会，我担任了编审委员会的主席，这是我第一次公开在生活书店任职。二月我离重庆赴香港，主要处理香港国际新闻社事情。香港国际新闻社是在上海国际宣传委员会基础上成立的，没有经费，我到武汉后从三厅设法拨了一点钱维持着。现在以范长江为首的国际新闻社已在桂林建立，我们决定把这两个国际新闻社统一起来，香港国新社主要向国外和华侨报刊供稿，桂林国新社主要

为国内报刊供稿，人员统一交流使用。这样，使“国际新闻社”在党直接领导下，和《新华日报》成了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相辅相成的两个主要的革命新闻宣传机关。“国际新闻社”除桂林、香港两社外，后来还在重庆设了分社。我在香港短时间里就办完了事情，即经越南返桂林。当时因广州陷落，所以从香港和南洋等地输送物资到内地，都得经过越南，它成了抗战中与国外联系的主要海、陆通道。我途经越南时，对越南情况进行了考察，也对国外侨胞捐献输送抗日物资的情况进行了解和采访，后来还写了一本《南行散记》的小册子，在桂林出版。这样，我回到桂林已是四月了。

在桂林，我是以“救国会”的身份进行公开活动的，主要是同文化界知名人士和广西上层人士保持密切联系。我们搞了一个聚餐会，每周一次，经常参加的有张志让、杨东莼、千家驹、陈劭先、李任仁、张铁生、姜君辰、陈此生等。大家一边吃饭，一边讨论抗战形势，交换做好抗日文化宣传工作的意见。

这时，党派杨东莼以“救国会”身份，协助广西当局办起了“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他们参照延安抗大的方针办校，开辟了一个革命的教育阵地。

我也积极和李任仁等磋商，决定救国会和广西建设研究会共同合作，创办一个文化出版机构——文化供应社。沈钧儒为此还到桂林一次，提供了一点资金，作为救国会的投资。经过一番筹备，文化供应社在一九三九年十月正式成立，陈劭先为社长，我代表救国会任董事和编辑部主任。“供应社”艰苦创业，后来有很大发展，编印了上百种书稿，

大都是社会科学、知识性读物和文学作品，还出版了不少青少年读物和通俗读物，在大众化、通俗化方面作了不少努力，从而为抗战救国提供了大量精神食粮。

在国际新闻社，我挂了特约撰稿人的名义，继续协助范长江做好工作。范长江和我协作得很好，在共同斗争中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对党的忠诚和斗争中的勇敢机智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一九三九年下半年他入了党，入党后他也知道了我是党员，两人关系更为密切。范长江公开身份也是“救国会”。“国新社”的成员大都是年轻人，是青年记者学会的会员，他们工作热情很高，学习也很努力。我们请来了黄药眠，他刚从苏联学习回来，马列主义理论修养比较好，因此请他来给青年记者们讲马克思主义的新闻学，培养和提高青年记者的思想和业务水平。青年记者们轮流着，一些人出去到各地采访和实践，一些人回到“国新社”来进行学习。这里既是新闻社，也是训练班，大家都称黄药眠为大师。就是这样，“国新社”还为党培养出了不少新闻工作的人才。

此外，我还经常参加广西建设研究会的讨论会，为研究会的刊物写稿；也经常为广西建设干部学校等单位讲课作报告；还和张志让、张铁生、千家驹几个人轮流负责编辑《国民公论》。

一九三九年九月，我党和各党派民主人士提出了召开国民大会，实行宪政的要求，延安还成立了各界宪政促进会。我们积极联络广西各界人士，于一九四〇年上半年，成立了广西各界宪政协进会，我担任理事会的理事，开展



了在抗战中争民主的运动。

这一时期，由于党在六届六中全会纠正了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毛主席关于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策略方针指导下，使我们在桂林的活动方向明确，抗日救亡工作做得有声有色。“救国会”的组织也发挥了很大作用，我们以“救国会”的身份活动，易与广西各方面人士接触。我们紧密团结了广西各界民主人士，发展了广西的进步势力；努力争取中间势力，包括对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等，通过各种渠道来影响和争取他们，使他们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这样一来，顽固势力也就孤立了，国民党蒋介石的特务分子在广西不能横行。正因为这样，桂林一时成了西南大后方的一块抗日文化的绿洲。

## 在 南 洋

但是，这种好景并没有维持多久。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诱降和英美的劝降之下，国民党反动派终于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四〇年初，发动了抗战以来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虽然在党的正确斗争策略指导下，这次反共高潮被击退了，但是国民党妥协投降的危险仍严重地存在着。蒋介石继续实行其防共、限共、溶共政策，以此作为对日投降的准备，在国民党统治区，对抗日民主运动的压迫愈益加强。仅以生活书店来说，从一九三九年开始到一九四〇年的上半年，就有十六处分店被查封或被迫停业。广西的形势也开始逐渐逆转，桂系主要头目之一白崇禧，这时

越来越向蒋介石靠近。针对形势的变化，一九四〇年五月，党中央发出了《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党内指示。指示正确地分析了形势，提出了我们的斗争方针，强调全党要“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并且具体指示：在国民党统治区“凡有被国民党捕杀危险的公开或半公开的干部，应转移地区隐蔽起来，或调至军队中工作”（见《毛泽东选集》三卷七四九页）。大概就在一九四〇年的六、七月间，李克农同志找我去看了党中央的这个文件，并要我首先离开桂林。他说隐蔽起来的办法有三条：一是改名换姓易地而居；二是到八路军、新四军去；三是到香港和国外。他认为我是个出头露面的人，谁都认识，第一条道行不通，第二条道要冲破国民党的封锁也不易，只有第三条道，先去香港比较合适。不久李克农就给我弄到一张去香港的飞机票，正好这时我二弟仲持有病，我就以处理家事暂去香港的借口离开了桂林。这样，我是按党的指示，第一个撤离桂林的人。皖南事变前后，桂林党的干部和进步人士才大批撤离。

到香港后，我在廖承志领导下工作。但我没有公开的工作职务，只是在香港的国际新闻社帮忙。过不多久，大概是十月，廖承志找我说：南洋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这次回国慰劳并视察，亲自去了延安，通过实际观察，陈先生加深了对我党的了解，他的思想有很大变化。他在新加坡办了一张《南洋商报》，向周恩来同志提出，要我们推荐一个人帮他办报，周恩来同志答应了，并叫与我联系，

我想你去还比较合适，就推荐了你。他又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了可以加强对南洋侨胞的抗日宣传教育，扩大党在侨胞中的影响，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这样，我又接受了去新加坡开展工作的新任务。

我是在十一月离香港去新加坡的。那时的新加坡还是和马来亚联在一起，处在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下。新加坡的情况十分复杂，由于英国正忙于在欧洲对付德国，没有更多力量来照顾它的亚洲殖民地，所以尽力与亚洲的日本谋求妥协。为此，对于华侨的抗日爱国行动，他们也加以限制。国民党在新加坡设有领事馆，他们在华侨中有较大的势力和影响，国民党还办有许多报纸，我们要在南洋开辟阵地，必然要和国民党作艰苦的斗争。此外，华侨内部帮派很多，团结抗日的工作也是很不好做的。

我为能进入新加坡，花费了一番脑筋。因为我知道，国民党和英殖民统治者相互勾结，会极力阻止我入境的，如果我正式去办护照手续，肯定不会被批准。不过当时也还有另一个办法，就是和普通闯南洋的同胞一样，坐上三等舱直接过去，但到新加坡后就会先被集中在一个小岛上一、二个星期，进行所谓的身体检查，这样我也很可能被检查发现，找借口拒绝我入境（后来乔冠华、郑森禹去就是被发现而原船送回的）。于是我用了一个巧计，用胡学愚的名字，坐上去新加坡的三等舱，在途中偷偷地送一笔钱给船上的英国医生，由他给我开了一张体检合格证明，这样到新加坡后我就免掉了扣押体检这一关，顺利地入了境。这时，陈家庚先生尚未回到新加坡，但《南洋商报》

已给我安排好了一切，十二月二日，《南洋商报》登载了聘我任该报编辑主任的消息。这使英殖民当局大为吃惊，他们查阅近期入境人员名单，都没有胡愈之的名字，于是华民政务司就立即传询我，企图问我一个偷越入境的罪名。我早做好了准备，印好了胡学愚，号愈之的名片，一去就送上名片，我说：报社催我到职，所以来不及办护照，坐三等舱赶来了，但我体检合格，是合法入境的，入境时我就是用我胡学愚的名字，因为愈之是我的别号，中国人的习惯在正式场合都是用名不用号的，这样殖民当局也就无话可说了。

经过一个月的调查了解，我熟悉了新加坡华侨社会的基本情况。一九四一年一月一日，我正式接任《南洋商报》的编辑工作。我在南洋仍是以无党无派人士的面目出现，办报的目的也是明确的，就是要按党的指示，开辟海外宣传阵地，使《南洋商报》成为团结华侨，一致抗日救亡，实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有力工具。当时《南洋商报》正面临如何扩大影响，打开销路的问题，也就是要使报纸赢得更多读者。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拥护、支持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和他所领导的南侨总会，拥护抗战救国。这与我来南洋办报的目的是一致的。所以我作为主编，在撰写社论和选编稿件中始终以抗日救国运动为中心，突出强调民族团结，南洋华侨团结，以及南洋华侨在抗战救国中的作用，配合陈嘉庚先生领导的南侨总会的工作。我与“国新社”保持密切的联系，也与香港和内地文化界的同志保持密切联系，及时地把国内抗战的最新消息和



发生的重大事件予以准确的报道。我在撰写社论中，对动荡激变中的国际国内形势，力求条分缕析，客观公允，言之成理，令人信服。“皖南事变”发生，我刚接办报纸，国内由于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事件真相的报道受到种种限制。我在《南洋商报》上立即如实地报道了这一事件，并连续发表几篇社论，评论了这一事件，当时轰动了南洋华侨社会，产生巨大反响，激起了广大爱国华侨对国民党反动派分裂倒退行为的愤慨。同时《南洋商报》作为一份华侨报刊，也需要考虑到对于马来亚人民反对英殖民主义斗争的态度，报刊表示了对马来亚人民反殖民斗争的同情，但同时也考虑到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需要，而对马来亚人民的反英斗争采取不介入的态度，把矛头始终指向日本帝国主义，避免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左”的行动，争取英殖民当局对华侨爱国抗日抱中立态度。正是通过上述的努力和正确的宣传方针，使《南洋商报》能够代表南洋华侨的心声，成为南洋侨胞的喉舌。这样，《南洋商报》销路大增，一时跃居各报之首，从而也为促进南洋侨胞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为了在南洋侨胞中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除了办好报纸外，还积极参加了广泛的社会活动。根据廖承志的介绍，到新加坡后我首先找了张楚琨。张楚琨在《南洋商报》任编辑，是陈嘉庚先生的助手，他是一个左派，组织了一个华侨青年抗日团体——民族先锋队。张楚琨不仅向我介绍了新加坡的情况，还通过他的介绍使我结识了南洋文化界的不少朋友。郁达夫这时已早我两年来新加坡，他

在《星洲日报》编副刊，也代理过该报的主编。《星洲日报》是南洋另一个著名侨领胡文虎办的。《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因属不同华侨帮派，代表各自的经济利益，政治态度、倾向都有所不同。但郁达夫是我熟悉的朋友，我和他尽管政治观点不完全相同，还是保持了友谊和交往。

陈嘉庚先生是一九四〇年的除夕才回到新加坡的，他见我已就职《南洋商报》，非常高兴。他很信任我，对我在报上发表的文章和办报的宣传方针表示赞赏。我每个星期都和张楚琨到他那里去一次，主要是报告他一些新闻，同他谈谈国际国内形势及动向。我十分钦佩陈嘉庚先生的为人和爱国热忱。我们都愿为抗日救国竭尽全力，所以尽管语言不通（他讲福建话，我讲的是上虞腔，两人谁也听不懂谁的，全靠张楚琨当翻译），心灵却是相通的，相处得很好。陈嘉庚先生在华侨中有很高的威望，是爱国的华侨领袖。我通过他的关系，也结识了华侨中各方面的爱国人士。南洋华侨社会分了很多帮派，这些帮派基本是以籍贯来分的。华侨中广东、福建人最多，有广东帮、福建帮，他们中又分海南帮、潮州帮等等；其它地方去的华侨少，统称为三江帮或上海帮。华侨帮派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也有其经济原因，但尽管如此，华侨多数还是十分爱国的。抗战爆发后，陈嘉庚先生就发起成立了“南侨筹赈总会”（因为英殖民主义者禁止华侨抗日，所以只能以慈善机构名义出现），为抗战筹集物资和人员，作了很多贡献。广大爱国侨胞也冲破禁令，用各种形式开展了抗日救国运动。所以在南洋华侨中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发展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还是很有基础的。事实上我们在华侨中发动筹赈救亡工作，华侨各阶层都能通力合作，可以说是一呼百应，工作是很有成效的。

一九四一年六月后，沈兹九、王任叔等相继来到新加坡，加强了党在文化界的力量，对我有很大帮助。九月，我和沈兹九结婚，此后我们一直生活在一起，共同为党的事业而工作。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法西斯在太平洋上对美英同时发动突然袭击，太平洋战争爆发。就在这一天的半夜里，新加坡遭到了日机的轰炸，同时日军也在马来亚的哥打巴鲁登陆。到了这个时候，英殖民当局才取消了抗日的禁令。在日寇的进攻面前，作为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中心的新加坡，很快就掀起了抗敌保卫星马的热潮。我首先邀集了一些文化界的朋友，商讨如何对广大群众进行精神动员，大家决定成立星州（新加坡简称）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我们把新闻界、教育界、书业界、文学界、音乐界、美术界的爱国人士都动员起来，由郁达夫任团长，我任副团长，张楚琨任组织部长，王任叔任宣传部长，庄奎章任训练部长。战时工作团立即办起了二件事：一是成立了一个青年战工干部训练班，准备训练一批青年干部去担任民众武装的政训工作；另一件是组织宣传队，用演讲、戏剧、歌咏等形式到群众中进行抗敌宣传。

接着全新加坡各界华侨，成立了以陈嘉庚先生为首的“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陈嘉庚当主席，我任执行委员兼宣传主任。在这个抗敌动员总会下面辖有劳工服务团、

保卫团、民众武装部。南洋华侨的抗日情绪十分高涨，我们在短时间内就组织了三千多人的华侨抗日义勇军，青年战工干部训练班的学员都当了义勇军的政训人员。这一下我们文化界的人也都投入到实际的抗日斗争中去了。郁达夫曾经说过，“我不是一个战士，只是一个作家”，现在他也热情洋溢地工作着，他也成了战士。

但是，战局发展很快，英殖民当局根本没有在南洋抗日的决心，在日寇进攻下，英军节节败退，英国的两艘主力舰也在马来亚海面被炸沉，日寇已从陆上步步向新加坡逼近。英军把柔佛通新加坡的长堤炸断，把丝里打军港的防御设施自动炸毁，把大批弹药投入海中，准备放弃新加坡。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殖民统治者也没有忘了对殖民地人民的歧视，华侨抗日义勇军成立，他们迟迟不发给武器，后来才给了一些十九世纪的旧枪支，把他们送到前线当炮灰。尽管华侨群众抗日热情高涨，也无法扭转战局，仅仅打了五十多天，马来亚大部陷落，新加坡已成了孤岛，整个保卫战只进行了二个月零一星期，英国殖民者就宣告投降了。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新加坡的形势已十分危急，英殖民当局已决心投降，他们根本不顾华侨抗战动员总会的抗日人士的安危，连撤退的船只都不给提供。国民党的领事馆更是对我们进行刁难，不发给我们回国护照，为此我还和国民党领事大吵了一场。当时陈嘉庚先生说：“新加坡总督准备当俘虏，我们可不能！”他决定先去印尼爪哇，于二月三日离开了新加坡。我召集文化界的抗敌工作人员商



量，决定先撤往荷属苏门答腊的乡村中去，那里知道我们的人不多，易于隐蔽。沈兹九和妇女儿童先一天走了，二月四日早晨，我们最后一批抗敌文化人，坐上了一艘只有几公尺长的摩托舢板，开始了流亡的航程。

小小的舢板里一共坐了二十八个人，有郁达夫、李铁民、邵宗汉、王纪元、汪金丁、张楚琨，还有王任叔、高云览等几对夫妇。船已破旧，跑得很慢，还不时因发生故障停下来修理，上有敌机，下有水雷，随时都有死亡的危险。本来渡过马六海峡半天时间就够了，但我们却飘流了两天，六日才到了印尼苏门答腊外面的小岛石叻班让。

石叻班让是一个仅有数千人口的小岛，短短几天里已聚集了新加坡逃来的二百多个难民，大多数是文化界的抗敌人士。这里离新加坡很近，大家从英军放弃新加坡的经验中知道，日寇很快也会到这里来，荷兰殖民者同样也不会进行抵抗的。难民中的一些华侨领导人在这里有亲戚朋友，准备就在这里和附近岛上疏散隐蔽。我们这些文化人情况就不同了，都来南洋不久，又是外江人（华侨把广东、福建以外的人统称外江人），不容易生根，所以这里不是我们安身之地。我们考虑还是先去爪哇，再从那里设法回国。谁知我和郁达夫等跑到另一较大的望加丽岛，去找设在该岛的荷兰殖民政府机关办理登记手续时，又发生了问题。荷兰殖民者在自身难保情况下，还是没忘掉对华侨抗敌人士的压制。他们看了我们的护照，就是不批准我们去爪哇，这样我们无法行动了。

二月十五日，新加坡陷落。荷兰殖民者未待日寇进

攻，却已闻风而逃。我们的行动虽不再受到限制，但已没有去爪哇的船只了。幸亏有一位热心的金门籍华侨陈仲培把我们几个带到望加丽对面苏门答腊一个叫保东的小村里，就在他家住下避风。我们都改了姓名，我叫张尚福，妻子沈兹九成了赵氏，郁达夫、邵宗汉成了我的两个妻舅，叫赵德清、赵德生，王纪元成了伙计，叫汪国才。我们没有事情，学习印尼语成了我们的主要课程，只是没有书，后来好不容易借到了一本词典，我就把它抄下来大家学习。但这里也并不安全，三月九日，荷兰殖民者也向日军投降了，日寇来了，把逃到色拉班让的新加坡侨领刘武丹等几个人都抓了回去。我们从望加丽来保东，有许多人知道，日寇也可能跟踪而来。这样只能继续流亡，先是几个人分散，郁达夫、王纪元去另一荒僻小岛彭鹤岭，我和邵宗汉到房主人的木材加工厂去，那里都是原始森林，必要时可进入森林躲避。后来又觉这样非长久之计，决定到苏门答腊大岛上去。郁达夫他们先走，接着我们也到了苏门答腊的入口北干峇鲁。听说郁达夫他们已到苏门答腊西部的巴雅公务，我们也去了那里，决定在那里住下来。

巴雅公务是一个农村里的小市镇，是个比较富庶的地方。这里的华侨不多，大都在这里已侨居两代以上了，都讲印尼话，市镇里有两条街道，华侨都在这里做生意。这时我化名金子仙，剃了光头，留了胡子，通过这里一个华侨药房老板曾玉印，我在市镇近郊买了一所茅庐屋。主人曾连发是个受过中等教育的爱国青年，他总觉得我这个人有点面熟，后来他想起来是在报上见过我的照片，他找到

过去报纸上的照片一对，就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了，从此他更加关心和照顾我们。华侨同胞这种热情，实在使我们感动。经过差不多三个月的流浪，总算是定居下来了。

不久，从新加坡来的文化界一些人又都聚集到巴雅公务来了。郁达夫先我们到达这里，但他在从北干峇鲁去巴雅公务的路上遇到了日本兵，日本兵问路，态度很蛮横，车上的旅客不懂日语，十分惊恐，郁达夫用日语回答了问题，为大家解了围，这一下暴露了他懂日语。到巴雅公务，他化名赵廉，自称古董商人，住在海天旅馆。巴雅公务的侨长听说他会日语，当日本军官来时就请他去翻译，这一下日本人也知道巴雅公务有一个日语很好的赵先生。日本侵略者在离巴雅公务三十三公里的武吉丁宜设立了军政监，那里的宪兵部就硬把郁达夫拉去当翻译。郁达夫也在巴雅公务租了一幢荷兰人住过的别墅住了下来。他在宪兵部当翻译，利用他的地位为华侨和印尼人做了许多好事，救了不少人，也掩护了我们。他当了半年多翻译，一九四三年春才借口有病辞掉了翻译职务。下半年他和华侨姑娘何丽有结了婚。在巴雅公务，郁达夫装作富商，和日本人应酬着，一直到日本投降时被害。

当时我们这些隐居下来的难民，不能不长期打算找个谋生之道了。正好张楚琨的亲戚支援了我们四百盾，当地侨商又给我们凑一点，我们商量决定办一个酒厂，由郁达夫出面申请执照。他当老板，厂名就叫赵豫记，厂址就在我住屋对面的几间茅屋里。张楚琨当了经理和酿造师，我管帐，沈兹九、邵宗汉也干一点装酒的轻活，吴柳斯、汪

金丁、林醒黄、杨骚、高云览等都来了，还雇了一些印尼工人。开始没有技术和经验，酒的成本很高，后来才慢慢有了起色。为了维持生活，我们又制造肥皂。当时方君壮也到巴雅公务来了，他懂化学，用椰子油和草木灰的水做成了肥皂，销路很好。靠了酒厂和肥皂厂，解决了我们这帮流亡者的生活问题。

生活比较安定了，为和共同流亡的文化界朋友有计划地联络，我提议组织了一个叫“同仁社”的秘密组织。在巴雅公务的人不多，就是沈兹九、汪金丁、邵宗汉、王任叔、吴柳斯、张企程、高云览、张楚琨和我这些人。每星期聚谈一次，有个人的生活报告，读书研究的心得体会，更重要的是对当时形势的讨论分析，后来又进行对印尼问题的研究讨论，大家都学习印尼文。我们还把这些研究心得复写下来，订成小册子，隔二、三月，就派人出去与隐蔽在其它地方的难友联系，给他们看这些小册子，交换对时局的意见。这样，在整个流亡期间，我们始终保持着文化界抗战难友间的联系，并都注意在精神上充实自己，在可能的情况下为人民做点事情。当时我看到华侨都学会了印尼话，但对印尼语言文字的研究却很少有人去做，所以我对印尼文字作了研究，编写了两部书稿——《汉译印度尼西亚语辞典》和《印度尼西亚语语法研究》。可惜前者后来丢失了，后者五十年代初在国内出版。我还经常与房主人的孩子和附近的华侨少年接触，给他们讲故事，介绍一些祖国的历史和文化，这又促使我写了一部小说——《少年航空兵》。这是一部少年科学幻想小说，说的不是现实的事，



但却反映了我对于未来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认识，以及中国与南洋各被压迫民族相互联合、相互支援，争取民族解放，实现社会主义的愿望。此外，我还写了《论战局》、《各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印尼问题与华侨经济》等文章，主要是在难友中传阅。在临近胜利时我还写了《告侨胞书》、《告印尼兄弟书》，内容是号召中印人民团结一致，互尊互帮，为反法西斯主义，建立人民共和国而共同奋斗。准备一旦盟军反攻登陆时把它们发表，号召人民起来行动。后来形势变化，都未发表。

流亡中该做什么？这个问题在我们中间也有过争论。王任叔比较激进，他认为我们行动太消极，就离开巴雅公务去了苏门答腊东部，在棉兰等地组织华侨开展抗日活动。他搞了一个“苏门答腊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还出版了地下抗日刊物《前进周报》，和印尼共产党搞在一起。一个外来的逃难者，对印尼情况很不了解，当时印尼共产党是很复杂的，内部很不统一。王任叔的活动很快为坏人所出卖，组织破坏，他自己幸免于难，逃到了最偏僻的乡村，靠刀耕火种以自活。日本投降后，王任叔继续留在印尼，还是和印尼共产党搞在一起。

我们在巴雅公务住了一年多，新的危险又发生了。郁达夫的身份暴露了，日本人已经知道他是中国著名作家，他已被监视。郁达夫叫我们尽快地离开，我们只好再次流亡。我们偷偷地离开巴雅公务，到了苏东的棉兰。到哪里安身呢？正好遇到原新加坡侨领刘武丹。他从新加坡逃到色拉班让，在那里被日本人抓了回去，毒打了四十天，肺

病复发，日寇把他放了，他又改名换姓偷跑到苏东高原马达山养病，他认为我们去马达山比较好。马达山是苏东高原最高峰，是荷兰人开辟的一个避暑养病的地方，山上有医院和名医，因为是避暑养病之地，所以一向是五方杂处，各式各样的人都来这里养病居住，谁也不会去留意我们这样的陌生人到来。于是，我们就在马达山租了一座曾是荷兰人住过的高脚木屋住了下来。为了维持生活，我们又做肥皂，也继续保持着和朋友们的通信联系，终于坚持度过了流亡生活的最后两年。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但在偏僻的马达山里，得不到准确消息，只是见日文报纸停了，直到八月二十二日才听说当地日本统治者宣布讲和了。八月二十三日，我们急忙赶到棉兰。自由了，朋友们互相庆贺着。可是日本人还统治着，外面什么消息也得不到。我们还是积极行动起来，广泛联络当地华侨群众，很快组织了团结华侨的侨团；同时，我们还到处设法弄到了一台收音机，有了消息来源，朋友们共同努力，办起了一张《民主日报》。

就在这时，传来了一个不祥的消息。郁达夫在八月二十九日失踪了！这时失踪，当然是凶多吉少。后来我去巴雅公务作了专门调查，把事情弄清楚了，是日本宪兵因郁达夫曾在他们宪兵部当过翻译，知道很多日本宪兵的罪行，怕他在胜利后揭发，所以杀人灭口，偷偷地把郁达夫杀害了。我把调查的情况，写信寄给了当时的联军司令部，也寄给了香港的作家协会，但都没有回音。直到最近，

日本有一个搞文学的人来信说，杀害郁达夫的那个宪兵还活着。当时逃亡到苏门答腊近百名新加坡华侨、文化界难友，在三年半多一点的时间里，都吃了不少苦，有的还被捕坐过牢，但牺牲的却只有郁达夫一人。郁达夫之死，是我国文化界的一大损失。

在整个八年抗战期间，还包括抗战爆发前的两年，在这个长时间里，我的主要任务是做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我一直是以救国会的身份进行活动，从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为实现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了一些工作，后来又为坚持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抗战的胜利而进行斗争。在这个时期里，我总是按照党的指示努力去工作的，基本上正确地贯彻了党的路线政策，在争取张学良东北军抗战、团结上海文化界和其他各界人士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桂林开展抗日文化宣传工作，以及团结南洋华侨共同抗战救国等方面，都取得了一些成效，扩大了党的影响。在后来三年多的流亡生活中，虽然失去了与党的直接联系，但还是坚持了抗战立场，团结了共同流亡的文化界难友和华侨，度过了艰难的岁月，使我在思想上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 一次重要罢工的回顾

周 林

一九三六年爆发了上海日本纱厂反日同盟大罢工。毛主席把这一反日大罢工，作为中国革命新时期第一阶段内的一个重大事变，给予了肯定。但是，由于过去没有开展纪念活动，也没有宣传，人们对这次罢工的重大作用和历史地位就不甚了解。现在，我就这次罢工中的几个问题作些回顾。

(一)这次罢工是在党的领导下，发生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六日至月底，历时二十余天。当时是国难当头，日本帝国主义妄图把中国沦为它的殖民地而疯狂侵略中国，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搞独裁、打内战的反动政策，使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在党的领导下，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京爆发了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于是，在全国范围内的学生界、文化界、舆论界相继开展了救亡运动。

一九三六年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宋庆龄的领导下，由爱国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沙千里、史良、李公朴、王造时等人（即七君子）组织的抗日救国联合会和上海各界救国会、陶行知领导的国难教育社等，互相配合、



彼此呼应，把抗日救亡运动搞得轰轰烈烈。特别是上海日本纱厂工人四万多人的反日大罢工的爆发，成为上海各界救国会的强大支柱，影响全国。在上海日本纱厂反日大罢工的影响下，青岛日本纱厂工人也举行了反日罢工。工人阶级的反日救国斗争，推动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这是继“一二九运动”之后，对日寇的第二次沉重打击。一九三七年一月八日出版的日本帝国政府外务省情报部五十三号《国际事情》上载的《上海、青岛纺织业罢工》文件表明，他们对此十分惊慌。

（二）上海日本纱厂工人在日本侵略下受压迫最深，过的是非人生活，与奴隶没有区别。他们要求增加工资，反对打骂，对日本侵略者恨之入骨，抗日救亡的积极性很高。

在此次大罢工之前，即一九三六年二月至五月，我们日本纱厂工作委员会在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的领导下，曾借梅世钧事件发动过大康纱厂的“二七罢工”和裕丰纱厂工人的静坐罢工等。但由于提出的口号过左、要求过高和行动上盲动，而被镇压下去了。

我们的工作几经挫折，甚至到了山穷水尽、无路可走的境地。幸好，六月我从教联雍文涛同志那里弄到一份少奇同志的《白区职工运动工作提纲》。我们纱委经过学习，大家茅塞顿开。过去我们在工作中不从实际出发，“左”倾冒险，吃尽苦头，结果是失败，使我们丧失群众而孤立。《提纲》指出：“党目前在中心城市与产业中心的工作任务，还是争取群众，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积蓄工人阶级的

雄厚力量”，“因此，必须彻底肃清实际工作中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我们完全接受了《提纲》的观点，并结合各自的经历，回顾了过去所跌的跤子，找出了失败的根源。《提纲》把我们从“左”派幼稚病中解放出来，给我们指明了工人运动的方向和领导斗争的策略与艺术，奠定了这次大罢工胜利的思想基础。

当时日本纱厂工委书记是韩念龙同志；张维桢同志分工管沪西，他通过朱永康、王泽民、宗云、陈晓风等同志，做丰田纱厂和小沙渡一带各日本纱厂的群众发动工作；我分工管沪东，通过胡瑞冥、席守荣、钟民、宗瑛、小林以及张阿根、张金妹、刘仁弟等同志，做同兴、上海、大康等各纱厂的工作；公大、裕丰等纱厂由陈之一分管；郭光洲为上海市工联参加纱委的代表。我们以工人夜校和平民学校为阵地，与上海各界救国会、文委及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等通力合作，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各日本纱厂有了较深厚的组织基础，反日斗争日渐高涨，罢工不断发生。

十月中旬，各日本纱厂罢工斗争发展到了一触即发之势，迫切要求我们制订一个罢工斗争纲领。经研究，我们向日本厂方提出五条要求，作为罢工斗争纲领：一、增加工资百分之十；二、吃饭停车一小时；三、不许开除工人；四、不许拷打工人；五、反对星期天多做钟点。成立了罢工指挥部，由张维桢同志负责。同时，还把“从实际出发、因势利导、夺取胜利、适可而止”，作为罢工的总方针。为了团结民族资产阶级，集中力量打击日本资本家，决定此次不在中国纱厂举行罢工。还研究了发动罢工的计

划、措施及分工等。应当指出：这次提出的罢工斗争纲领，是从广大工人的切身利益出发的；考虑到反日罢工行动本身就是政治斗争，所以在纲领中就没有再提别的政治口号。这说明我们领导罢工的艺术比以前大大提高了。

（三）我们面前的敌人是极其野蛮和极其凶恶的，要战胜他们，没有正确的方针、路线和策略是不成的。

罢工宣言和五条斗争纲领在各日本纱厂工人中传开后，得到广大工人的拥护。十一月六日凌晨，同兴二厂在宗瑛、席守荣和小林等的带领下首先开始罢工；七日，上海二、三纱厂罢工；八日，上海四厂、上海五厂和东华等厂罢工；十一月十日，大康纱厂在张阿根、张金妹等带领下也参加了罢工。接着，公大、裕丰各厂，在陈之一、陆凤至等领导下也相继罢工。于是，沪东区各日本纱厂的大罢工按计划要求实现。

十一月十一日，我们召开大会，准备成立罢工委员会。但大会受阻。为避免与敌人的镇压硬碰，我们临时决定停止召开大会，秘密通知工人参加上海国民党工会的队伍，去市政府请愿，以合法的方式向社会局提出工人的五项要求。接着，我们又同日本厂方的破坏进行了斗争。日本人开始以让工人派代表同厂方谈判为幌子，企图诱骗工人领袖出头露面，以便逮捕镇压。我们识破了他们的阴谋，予以置之不理。于是他们又采取另一种欺骗手段，即口头上答应增加百分之五的工资，诱骗一批生活困难的工人复工。此时，又有些积极分子贴出传单，提出反对复工、反对工贼破坏罢工等口号。当时，我们感到情况十分紧急，因为

敌人的欺骗对生活困难的工人有相当大的引诱力，这部分工人要去复工，就有动摇罢工阵脚和分裂罢工队伍的危险。对此，我们采取了应急对策：为了巩固工人队伍的团结争取达到罢工的目的，没有一般地反对工人复工，而是派去一些积极分子一道去复工，做工人的工作，揭露敌人的阴谋。果然不出所料，敌人所谓增加工资，实际是骗人的空话。在实践中工人认清了敌人的阴谋，不再要求复工了；那些已复工的工人，在沪西罢工时，又再参加罢工。

张维桢同志在沪东罢工后，按计划组织丰田纱厂的罢工。同时还通过内外棉一、二厂的宗云及其组织的一批小姊妹在沪西其它各厂组织罢工。丰田一、二厂的罢工原定于十一月十七日开始，由于朱永康等工人被捕，我们便决定提前两小时罢工。日本人调来海军陆战队，用机枪封锁住一厂大门。工人们毫不畏惧，急中生智，把厂内日本人全部包围起来，高喊誓与这些日本人同归于尽，迫使日本海军陆战队撤退。一厂罢工后，厂方把一千五百工人赶出厂门。于是一厂工人上房、越墙冲进二厂，同二厂工人一道，用砖头、石块猛袭公共租界和公安局派来镇压二厂罢工的五辆载满巡捕、警察的警车。工人把厂方日本人包围起来，同他们斗了一夜，敌人被迫把他们抓去的工人全部放出。日本人把这叫做“丰田纱厂事件”，说这是“超出了罢工范围的暴行”。其实，这是有决定意义的一战，日本人用全副武装的陆战队，外国租界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用大批的巡警、巡捕及印度人巡察马队、白俄义勇队等来镇压，却遭到他们意想不到的失败。丰田纱厂的罢工带动了沪西



各日本纱厂的大罢工，进而促使全上海日本纱厂反日同盟大罢工的实现。

这次同盟大罢工，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府非常惊慌。他们加紧镇压，妄图扑灭这场反日怒火。日本海军陆战队开进各日本纱厂驻扎；沪东、沪西到处是外国巡捕和国民党警察、马队巡逻，岗哨密布。特别是国民党反动政府在日本驻上海总领事若杉和日本纺织业联合会总裁船津的压力下，竟于十一月二十三日，以所谓“煽动罢工、危害民国”的罪名逮捕救国会领袖“七君子”。这样，工人更加群情激愤，罢工浪潮更加高涨。

日本资本家在大罢工的沉重打击下，损失惨重。正如船津哀叹的，此次工潮“使日本纱业前途几将动摇”。日本外务省的上述文件也表明，他们很怕此次罢工事态再扩大，唯恐一九二五年“五卅反日运动”再现。因此，他们一面敦促国民党反动政府进行武力镇压，一面又求助上海闻人杜月笙出面调停。此时，日本厂方已处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国民党上海总工会理事长朱学范也愿出面斡旋。我们纱委经过研究认为：日本厂方资本家有顶不住这次罢工打击的可能，只要罢工斗争策略对头，工人团结一致，同盟罢工有获得胜利的希望。因此，我们没有拒绝杜月笙的调停，并请朱学范先生参加，争取实现向日本厂方提出的五项要求。于是，我们一面借此机会，请朱学范先生把朱永康保释出来，并请他在丰田纱厂给朱永康以合法地位；一面给罢工群众宣传统一战线的重要，使工人明确我们斗争的战略与策略。

经过杜月笙的调停和朱学范的工作，十一月二十五日达成七条协议。即：一、工资增加百分之五；二、废除月赏工资制，改为奖励制，成绩优良者酌量升级加薪；三、不得无故开除工人；四、不得打骂工人；五、每日工作十二小时，礼拜日工作十四小时，增加的工时另给工资；六、吃饭停车三十分钟；七、各厂工人一律于二十六日复工。七条协议基本实现了工人的五条要求，至此，这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反日大罢工，胜利结束。

（四）这次罢工胜利的历史意义和经验，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白区职工运动工作提纲》拨正了上海工运的方向，给白色恐怖下的工人运动指明了斗争的战略、策略和领导斗争的方法与艺术，也给这次大罢工奠定了胜利的思想基础。自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以后，这次大罢工的胜利，是上海过去十年以来难得的一次罢工胜利。

第二、这次罢工的胜利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与贯彻的结果。罢工始终坚持了从实际出发、把工人运动与抗日救亡运动相结合、把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相结合、把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相结合的方针。如果不是与各界救亡团体和社会各抗日阶层（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合作特别是在反日的前提下与国民党工会中爱国进步人士朱学范先生合作，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要取得罢工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朱先生在取得这次罢工胜利的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贡献是不小的。在承认罢工五项要求的前提下，同意杜月笙的调停等，都是这次罢工的新经验。这是在第二

次国内革命战争新形势下，白区职工运动的重大突破和创举。

第三、这次反日罢工胜利的历史意义是深远的。它发生在“一二九运动”之后和“西安事变”之前。在这国难当头之际，蒋介石不抵抗、搞独裁、打内战，使自己陷入全国人民唾骂、声讨的窘困境地。这次反日大罢工，显示了工人阶级和各抗日救亡团体的救国决心和力量。蒋介石屈服于日本政府的压力，逮捕了救国会领袖“七君子”，但他没有想到，就在逮捕“七君子”之后二十天，他自己竟成了“西安事变”中的囚徒。这充分说明，人民的救国之心不可辱，抗日之势不可挡。

# 抗日战争中的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

小林青\*

抗日战争时期，在八路军、新四军中活跃着一支特殊的国际主义队伍，那就是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它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下的产物。它的产生，是中国反法西斯战争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和俘虏政策的影响和教育下，我们许多被俘的日本士兵通过学习和教育，不仅知道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的战争是不正义的侵略战争，而且明白了为要永远消灭这样的战争，为要使中日两国人民从日本法西斯的蹂躏下解放出来，为要使中日两国人民永远友好下去，就非踏着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道路前进不可。

在抗战初期，八路军总司令部以朱德、彭德怀的名义发布了优待俘虏六项命令：一、不杀敌军俘虏，优待俘虏。二、不取俘虏财物，唯军用品应没收之。三、医治敌军伤兵。四、在可能条件下，将俘虏放回，并给路费。五、愿在我部队服

---

\* 原是在华日人反战同盟胶东支部负责人，现为天津市政协委员。



务者，给予适当工作。六、不干涉俘虏的宗教信仰。这六项命令提出了抗日战争时期党的俘虏政策的基本精神。

毛泽东同志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指出：“我们仍然把俘虏的日本士兵和某些被迫作战的下级干部给以宽大待遇，不加侮辱，不施责骂，向他们说明两国人民利益的一致，释放他们回去，有些不愿意回去的，可在八路军服务，将来抗日战场上如果出现国际纵队他们即可加入这个军队，手执武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一九三八年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又指出：“对于日本士兵，不是侮辱其自尊心，而是了解和顺导他们的这种自尊心，从宽待俘虏的方法，引导他们了解日本统治者之反人民的侵略主义。”

日本民族由于受历史传统所形成的狂妄的民族自尊心和武士道精神的影响，日军士兵大都骄傲蛮横，刚愎不逊，爱面子。而八路军总司令部的命令和毛泽东同志的论述中都强调了对日俘不加侮辱，尊重人格，这正确的对日俘虏的政策，发挥了巨大威力，争取了日军一部分士兵，唤起他们的觉醒。

一九四〇年四月六日，中央书记处发出的《中央关于瓦解敌军工作的指示》指出：“凡俘虏愿意回去者除给以教育招待令其回队外，应注意选择少数进步分子给以较长期的训练。”

在这个文件中，强调了争取俘虏为我军服务的问题，这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又一重大发展和完善。它对于尽一切可能争取一切可争取的力量，壮大革命统一战线，孤立、瓦解敌军，削弱敌军战斗力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战胜敌人，一要靠强有力的武力打击，大量消灭其有生力量。二要靠有效的瓦解敌军的工作，削弱、摧毁其战斗力和战斗意志。所以八路军不但在政治上、生活上优待俘虏，更重要的是从情感上感化俘虏，消除敌对情绪。日军士兵往往把生命与人格看得同等重要，甚至被俘后宁愿速死，也不愿人格上受到侮辱。当时，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各种物资非常困难，但对于被俘的日本士兵的供给仍大大优于八路军一般士兵。同时在政治上，不仅尊重他们的人格，尊重信仰。而且把他们当作阶级弟兄对待，给他们学习、娱乐等各种自由，甚至还给已经觉醒的日军士兵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种优待从感情上溶化了日本士兵的敌对情绪。

## 在华日人觉醒联盟

在八路军中的日本士兵通过教育和学习后，不仅知道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的战争是不正义的侵略战争，而且明白了为要永远消灭这样的战争，就非和中国人民并肩战斗不可。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七日，在山西省辽县（左权）麻田村八路军总部，由杉本一夫等日本士兵创建了“在华日人觉醒联盟”本部（一九四二年改为反战同盟太行支部）。

觉醒联盟是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支持和帮助下建立的。这是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成立最早的日人反战团体。它的成立和出现，标志着日本人民的觉醒，说明生活在八

路军中的日本士兵是主持正义的日本人民之一部分。同时也证明中国共产党始终如一所坚持的中日两国民族平等、共同反对侵略战争的立场是英明正确的。

觉醒联盟的宗旨：呼吁广大日本人民和日本士兵觉醒，起来反对不正义的侵略战争；反对日本侵略中国，揭露日本法西斯破坏和平与侵略中国的本质和罪恶；学习马列主义，学习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宝贵革命经验，研究日本革命问题；号召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觉醒联盟成立后，积极地向日军开展政治宣传攻势，揭露侵略战争的本质，宣传八路军优待俘虏等政策。因为日本军阀极力制造狭隘的排外主义与民族隔膜，利用民族间语言不通等因素，对八路军进行歪曲、颠倒的宣传，把八路军污蔑为“穷凶极恶，残狠无比的野蛮人，对被俘的日军官兵即一刀两断，如此永世也不能投人胎了。”造成日军对被俘的恐惧心理，以至在战场上宁愿战死，也不愿投降。日军士兵这种由于被欺骗、被蒙蔽而造成的思想意识和长期形成的武士道精神，自然给八路军在军事上战胜日军，政治上瓦解日军，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因素。因此，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必须摧毁日军藉以支持战斗意志的精神支柱。精神支柱一旦垮了，日军便会不战自溃。这首先要从消除日军士兵对于中华民族的盲目对立情绪入手。觉醒联盟中的原日本士兵积极进行了这项宣传工作，起到了八路军所起不到的特殊作用。

觉醒联盟刚成立时，全体盟员的政治水平都不高，也

没有什么工作经验。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帮助下，逐渐开展了对日军的宣传、瓦解工作，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每次出去宣传，八路军或地方部队都派人护送，这就保障了盟员的安全。盟员们对此深为感动，在战场上都更加积极地向日军进行宣传。如在康家坳战斗中，杉本一夫用日语向日军士兵高呼反战口号，竟使日本士兵停止射击。对此，日军军官大惊失色，指挥混乱。

日本侵略军对觉醒联盟瓦解日本士气的活动，非常恐慌，妄图用卑鄙手段阻挠其宣传活动。如日军第三十六师团曾经派出一名叫齐藤的士兵“自动投降”八路军。齐藤带着一瓶毒药，是要毒死觉醒联盟的同志们。但是他来到八路军后，被八路军和觉醒联盟的正义行为所感化，自动供出了他的“使命”，交出了毒药而转变过来了。

觉醒联盟成立以后，组织机构发展很快，陆续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了支部。

一九四〇年六月廿三日，在八路军一二九师，由松井英男等同志建立了觉醒联盟第一支部（一九四二年改为反战同盟太岳支部）。

一九四一年八月七日，在八路军冀南军区，由秋山良照等同志建立了觉醒联盟冀南支部（一九四二年改为反战同盟冀南支部）。

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五日，在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由水野靖夫等同志建立了觉醒联盟冀鲁豫支部（一九四二年改为反战同盟冀鲁豫支部）。

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九日，在八路军一一五师，由本桥



朝治等同志建立了觉醒联盟山东支部（一九四二年八月与反战同盟山东支部合并）。

##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

一九四〇年七月七日，正值抗日战争爆发三周年时，在延安的日本士兵森健、高山进等同志在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军工作部的直接帮助和支持下，创建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

他们在这之前得知日本进步作家鹿地亘和妻子池田幸子化装成演员从上海到达重庆，组织建立在华日人反战同盟。他们觉得有必要联合在一起搞反战运动，于是就给在重庆的鹿地亘发去信件联系，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的阻挠，始终没有联系上（鹿地亘领导的重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支持，一直没有得到很大的发展）。

没有和重庆方面联系上，他们决心自己起来组织反战同盟。当然冈野进同志也作了许多工作。冈野进是一九四〇年三月从莫斯科经新疆秘密来到延安的。由于冈野进来延安时，身份是不公开的，几乎谁也不知道他的身份和真名实姓。他使用的中国名字叫林哲，直到一九四三年共产国际解散时，他才以日本共产党代表的公开身份露面。那时才知道他就是日本共产党书记野坂参三。

反战同盟延安支部主要是搞宣传工作，利用各种方法向日军广大士兵开展反对侵略战争的宣传，编写、印刷了

百余种宣传品，还发行以宣传反战为主要内容的日文月刊《士兵之友》。这个刊物对日本士兵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教育和争取了许多日本士兵，使他们从日本帝国主义的欺骗宣传中觉醒过来。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又增设了无线电广播，每周两次，以在日军中的广大士兵为对象。广播的内容主要有：解说时事战况，介绍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的情况，用大量事实阐明战争的性质等等。对分化日军，动摇日军士兵的军心，具有极大的影响。

## 日本工农学校

一九四〇年十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在延安创办“日本工农学校”。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五日，在延安八路军大礼堂，正式举行了开学典礼。朱德总司令、傅钟、冯文彬等同志出席了开学典礼。朱总司令作了讲话。此后，学校的教学便走向正规，各种规章制度也日趋完善。

日本工农学校是一所教育、改造日本士兵的学校。办学的教育宗旨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贯彻党的俘虏政策精神，通过在政治上物质上的优待和思想上的教育转化工作，使学员的立场、世界观得到根本改变。培养对日军进行宣传、瓦解工作的干部，培养反对日本法西斯战争和为中日民族解放而奋斗的战士。

学员大部分来源于八路军、新四军在战场上俘虏的日本士兵和下级军官，也有少数受八路军、新四军的政治宣

传影响而自动投诚过来的日本士兵。他们大部分是被压迫被奴役的劳动人民，文化程度都不很高。

日本工农学校校长是冈野进，副校长是总政治部的赵安博同志（一九四三年四月后，由李初梨同志兼任）。

日本工农学校开设的课程有：社会发展史，马列主义，政治常识，政治经济学，哲学，中国问题，日本问题，联共（布）党史，时事问题，中国语言等。这些课程分别由冈野进和精通日语的赵安博、王学文、李初梨、何思敬等同志任教。在教学中，学校注意联系日本国内的具体事物和战争中的事实，启发学员的阶级觉悟，使他们明确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的性质与自身的利益，在此基础上，进行革命理论的教育，转化思想，加深对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理解，争取他们为反法西斯战争而奋斗。

日本工农学校，这个在世界战争史上也绝无仅有的战俘学校，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共培养和教育了数百名日本士兵，使他们从蒙昧中得到了真正的觉醒，走上革命的道路。一九四一年十月廿六日，在延安召开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上，日本工农学校就有三十五名学员在会上集体宣誓参加了八路军。

由于日军俘虏的不断增多，日本工农学校也不断发展。一九四三年七月，在八路军一二〇师设立了日本工农学校晋西北分校。一九四四年十月在八路军山东军区设立了日本工农学校山东分校。同年在新四军中设立了日本工农学校华中分校。后来日本工农学校山东总分校又创办了鲁中、鲁南、渤海分校。

日本工农学校毕业的学员，大部分回到各抗日根据地的抗日前线，推动和发展了各抗日根据地的反战工作以及对日军的政治宣传攻势。反战同盟支部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敌后抗日根据地。

## 蓬勃发展的反战同盟

一九四一年二月廿三日，在八路军冀中军区，由田中、东忠等同志建立了反战同盟冀中支部。

一九四一年五月四日，在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由宫川哲治等同志建立了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

一九四一年七月廿一日，在八路军山东纵队，由大西正等同志建立了反战同盟山东支部（一九四二年八月与觉醒联盟山东支部合并）。

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五日，在新四军第一师（苏中军区）由香河正男、滨中政志等同志建立了反战同盟苏中支部。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五日，在新四军第三师（苏北军区），由古贺初美等同志建立了反战同盟苏北支部。

一九四二年九月，在八路军胶东军区，由渡边三郎、小林清等同志建立了反战同盟胶东支部。

一九四二年九月，在八路军一二〇师，成立了反战同盟晋西北支部。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八日，在八路军清河军区，由田村、铃木等同志建立了反战同盟清河支部（后随军区一起改为反战同盟渤海支部）。



一九四二年十月，在新四军第四师（淮北军区），由后藤勇等同志建立了反战同盟淮北支部。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在八路军滨海军区成立了反战同盟滨海支部。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在新四军第二师（淮南军区），由高峰红志、加藤肇等同志建立了反战同盟淮南支部。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八日，在八路军鲁南军区，由小岛、田中等同志建立了反战同盟鲁南支部。

一九四五年五月四日，在八路军冀东军区成立了在华日人解放联盟冀东支部。

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和反战运动的蓬勃发展，一九四二年六月廿三日，在延安的日本同志创立了“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在反战同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先锋队组织。同盟成立后，就在各抗日根据地发展了支部。《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立，对反战运动中的日本士兵和中国抗日军民影响很大，延安的《解放日报》在一九四二年六月廿五日还发表了社论。

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五日到八月三十日在延安召开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和华北日人反战团体大会。

日本士兵代表大会，聚集了在华北与八路军作战的十九个日军部队的士兵。他们代表日军中所有的兵种，而且包括从二等兵起到少尉为止的军级。这些代表从日本士兵的立场出发，商讨了日本士兵目前最迫切的要求。大会一致通过了章程、宣言和《日本士兵要求书》。《日本士兵要

求书》共有二百二十八条，反映了日本士兵切身的利益和权利，如：向日本军部抗议，不服从非人道的命令，让士兵吃饱饭，不许打耳光等项内容。

这次大会是七十年来日本军队从未有过的事情。《日本士兵要求书》也在日军中引起强大反应，其影响和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另一个大会是华北日人反战团体大会，是由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八个反战单位联合召开的。大会统一了华北日本反战力量，成立了反战同盟统一机构——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为了华北反战团体名称之统一，把觉醒联盟改为反战同盟。选举彬本一夫为华北联合会会长，森健、松井敏夫为副会长。

这次大会，统一了华北日本反战组织，从此使反战运动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通过大会，进一步地具体地了解了日军的情况，这对今后向日军进行宣传、瓦解的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大会还揭露了日本法西斯的黑暗与残暴，向全世界进行正义的呼吁。

为了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五日到二月十五日，在延安召开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扩大执委会，延安本部和各地支部的代表出席了会议。

由于国际反法西斯力量有了很大发展，日本国内的形势起了很大变化。所以反战同盟的奋斗目标不仅局限于反对不正义的侵略战争，而且要争取中国和日本人民的民族解放，推翻日本法西斯政权。于是大会通过将反战同盟改组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这是反战同盟一次重大的历史转变。

一九四四年上半年，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反战同盟各支部均改名为解放联盟支部。到一九四五年七月，日人解放联盟共有华北、华中两个地方协会，晋冀鲁豫、冀鲁豫、山东三个地区协会和十八个支部，一千多名盟员。

这次大会总结了反战运动的经验，指出无论是扩大反战联盟组织，还是开展反战工作都有显著的成绩。这些成绩是经过许多中国、日本同志共同奋斗流血牺牲所换来的。数年来，在战场上进行反战工作而牺牲的日本同志，有姓有名就有二十五人。由于这些有英勇献身精神的同志们的工作和作战，反战同盟在日军中影响越来越大，以致使日军认为在八路军、新四军中有日本部队。

反战同盟虽然在数量上比八路军、新四军少得多，但是在瓦解日军、战胜日军上却是一支必不可少的重要力量。它熟悉日军的内部情况，了解日军士兵的思想、语言、风俗习惯。他们利用日军中的同乡、朋友等关系，通过向日军据点喊话、通信、通电话、送慰问袋等方法，直接和日军士兵接近，收到很大效果。使日军士兵产生的思乡厌战情绪日益加剧；逃亡、自杀和自动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的事件不断增加；士兵反抗长官，不听命令的事件也不断发生，致使日军战斗力不断减退。日军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反战同盟的宣传、瓦解工作无疑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如反战同盟冀鲁豫支部与清丰县日军一个大队的士兵经常通信、宣传八路军俘虏政策，揭露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的本质和罪恶。这个大队与八路军作战时，有些士兵大胆抛去武器，逃到八路军中来（《日本战友

在这样斗争着》)。

反战同盟不但在瓦解日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它的正义行动也极大地鼓舞了中国抗日军民斗争的勇气和争取最后胜利的信心。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日人解放联盟在延安发出通电，号召日军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并命令各地支部盟员到前线，协助八路军、新四军接收日军武装。但是日军接到国民党军总司令部的命令后，拒不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解放联盟在争取日军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问题上，作了很多的努力和工作，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八月三十日，在延安举行盛大的欢送日人解放联盟归国大会。叶剑英总参谋长出席了大会，并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一九四五年底，解放联盟各地支部到达东北。在冈野进的带领下，途经朝鲜，陆续回到日本。至此，反战同盟完成了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争取中日民族解放的历史使命。

反战同盟在抗日战争中，和中国人民一起齐心协力、浴血奋战，焕发出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并为之流血牺牲，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为中国人民雄伟壮丽的抗日战争史诗谱写了光荣的一页。为保卫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



# 李维汉同志对统一战线 工作的卓越贡献

王刚 李青 余鉴则

李维汉同志是我们党的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党在统一战线工作和民族工作方面的著名理论家，他为我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献出了毕生的精力。他对统一战线工作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我们过去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多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在他的具体领导下，帮助他整理建国以来统战工作的回忆录，长期受到他的亲切教诲。现在他逝世已近两年了，为缅怀他对统一战线工作的卓越贡献，特撰写此文，以志纪念。

## —

一九四八年五月，我党中央在《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个号召立即得到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国内少数民族代表人物和广大国外华侨的热烈拥护和响应。在此之后，中央即开始筹备召开新政协（即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李维汉同志参加了这项筹备工作，主要担负了两个方面的任务。一个方面，是接待进入解放区的各方面的党外人士，向他们介绍国内外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同他们协商关于筹备召开新政协的方针政策问题。一九四八年底，一批著名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先后从香港和国民党统治区进入解放区，到达当时中央统战部所在地李家庄。李维汉同志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同他们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交谈。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二日，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彭泽民等五十五位进入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共同以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的身份，发表了《我们对时局的意见》，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一九四九年三月，中央机关进入北平后，李维汉同志又亲自逐个访晤了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谭平山、周建人、马叙伦、蔡廷锴、吴耀宗等二十多位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经过反复协商和交换意见，对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取得了共同的认识：一定要将革命进行到底，不能半途而废；要搞新民主主义，不搞旧民主主义，反对中间路线；新政协要由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组成，拒绝一切反动派及反动分子参加。这样，就为新政协的召开作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另一方面，由李维汉同志负责，经过协商，提出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各单位的代表名单。这是一项极其复杂和细致的工作。他为此花费了大量精力，倾注了全部心血。

他夜以继日地广泛接触各方面党外人士，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多方面地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并同许多要求参加新政协的党派、团体和个人分别谈话，向他们耐心地进行说明解释和教育。经过三个多月的反复协商、酝酿，终于形成了一份包括我们党和各民主党派、地区、军队、人民团体等五个方面人士在内的六百六十二名政协代表名单。这个名单，坚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原则，严格分清了敌我，拒绝了一切反动党派和反动分子，包罗了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和国外华侨的代表人物，具有极大的代表性和广泛性，体现了全国人民在爱国主义基础上的空前大团结。这份政协代表名单受到毛泽东同志的称赞，他风趣地说，这是一部包罗万象的天书。

## 二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我们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执政党。从此，我国开始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时期。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也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个新的历史阶段的开始，统一战线工作面临着一系列的方针政策问题，亟待明确解决。同时，党内一部分同志，在统战工作上暴露了相当严重的关门主义和清一色思想，也有待于及时进行教育和克服。为适应这种新的形势和任务的需要，李维汉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于一九五〇年三月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

统战工作会议。他根据我党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在会上作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与新任务》的报告，阐明了我国统一战线的巨大变化，明确地指出了新中国成立后统战工作的基本任务、方针和各项政策。他指出，“现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已经开始转到一个新的时期，从为争取人民革命与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时期，转到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巩固国防力量，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及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恢复和发展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文化，为进入社会主义准备条件的时期。”新中国成立以后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总任务，就是“要在实现共同纲领、巩固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密切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广大华侨，各界民主人士及其他爱国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人，为着稳步地实现新时期的历史任务而奋斗。”<sup>①</sup>报告中针对党内一部分同志存在的“左”的思想情绪，说明了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各民主党派的必要，阐明了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级人民政府机关和人民政协中统战工作的基本方针政策。这个报告经过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讨论同意和党中央的审阅批准，成为建国初期统战工作的一个根本性的指导文件。这个文件的贯彻执行，对于建国初期各项统战工作的顺利发展，对于使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

---

<sup>①</sup> 《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第4页。



争和各项社会改革的运动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 三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合作，是我们党把马列主义关于统一战线的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一个创造，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一个特点和优点。李维汉同志对于我国多党派合作的巩固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在建国初期，协助周恩来同志坚决贯彻执行党对各民主党派的总方针，即“帮助他们团结、进步和发展，并力求在人民革命运动和国家建设事业中，彼此竭诚合作，大家作出成绩来”<sup>①</sup>，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为巩固发展各党派合作做了大量工作。

（一）一九四九年底到一九五〇年初，支持帮助各民主党派分别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或者中央会议），回顾民主革命时期走过的道路，总结历史经验，明确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方针任务。各民主党派经过上述会议的讨论，都作出了决议，宣布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以人民政协的《共同纲领》作为他们的政治纲领，改选了领导机构，确定对各自的组织进行清理、整顿，在此基础上发展成员。这些会议为巩固和发展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打下了基础。

（二）在党内外深刻阐明了我国民主党派的特点和性质。他指出，各民主党派“主要对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

---

<sup>①</sup> 《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第31页。

产阶级和它们的知识分子，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和代表性；但都是阶级联盟的性质，不是单一阶级的政党。”<sup>①</sup>他反对把民主党派变成非党布尔什维克即工人阶级单一阶级政党的思想，也反对把民主党派变成资产阶级单一阶级政党的思想，使民主党派保持和发展了以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它们的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包括一定数量的革命知识分子和极少数共产党人在内的阶级联盟的特点。这对于民主党派广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和加强党同民主党派的合作，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他全面论述了民主党派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存在的必要性和作用，指出了五个方面的重要原因。第一，他们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它们的知识分子。在建国初期，这些阶级、阶层都继续存在，并且同工人阶级保持统一战线的关系，需要民主党派继续联系他们和代表他们。第二，有合作的历史。民主革命时期，各民主党派同我们党在长期合作中走过来了。新中国成立后，各民主党派宣布接受共产党领导，愿意为实现《共同纲领》而努力，我们党更应该同他们继续合作。第三，有作用。各民主党派在团结和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它们的知识分子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第四，有人才。他们中有许多知识分子，有各个方面的人才，不少人是新中国进行经济、文化建设事业

---

<sup>①</sup> 《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第10页。

所不可缺少的专家。第五，他们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影响。因此，继续坚持党同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是完全必要的和有利的。

（四）提出了我们党同民主党派关系的基本原则。“既要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以共同纲领为准则，团结它们共同奋斗，帮助它们提高到为彻底实现共同纲领而奋斗的水平，同时又必须在组织上适当地尊重他们的独立性，善于根据他们的具体情况，推动和帮助他们逐步前进。我们的态度是热情地帮助他们，惟愿它们团结和进步，我们的方法是诚恳地协商、建议和说理，必要时进行适当批评，而不是从组织上去控制它们”<sup>①</sup>。

（五）坚决遵照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支持和推动各民主党派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和统一战线中重大问题的协商、讨论，参加土改、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等各项社会改革运动和国家建设的实践，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并使它们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受到锻炼和改造。

（六）积极帮助各民主党派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时事政策，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发展民主党派同我们党一致的一面，缩小和削弱同我们党有矛盾的一面，使团结合作不断得到加强。

所有这些，为巩固和发展我国的多党派合作，阐明了基本原则，指出了方向和道路，具有长期的指导意义。

---

<sup>①</sup> 《统一战线问题和民族问题》第11页。

## 四

“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sup>①</sup>李维汉同志对夺取这个伟大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九五三年，全国完成土地改革之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逐渐上升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采取新的方式和步骤，废除资本主义所有制，实现社会主义国有化，正确解决这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成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实现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李维汉同志创造性地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为党中央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和政策，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

一九五三年五月，李维汉同志通过调查研究，深入考察了建国后头三年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验，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报送了《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提出国家资本主义是我们利用和限制工业资本主义的主要形式，是我们将资本主义工业纳入国家计划轨道的主要形式，是我们改造资本主义工业使它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也是我们同资产阶级进行统战工作的主要环节。抓住这个主要形式和主要环节，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有利于对整个资产阶级的改造。这个调查报告受到党

---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172页。



中央、毛泽东同志的高度重视和赞许。六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召开两次扩大会议进行讨论，肯定了这个报告。就在六月十五日的政治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同志进一步阐明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确定了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改造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方针。这样，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和平改造和赎买的方针，作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就在全党的指导思想明确地肯定下来了。

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他提出并且坚持贯彻了企业改造和人的改造相结合的双重改造的思想。李维汉同志多次指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留给我们两笔财富，一个是企业，一个是掌握了企业经营管理经验和现代技术的资本家。对这两笔财富，我们都要充分地加以利用。一九五四年初，在他主持制定的一个文件中就提出了消灭阶级、改造个人和把企业改造同人的改造相结合的意见，确定在积极而又稳步地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要普遍深入地向工商界进行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国家资本主义方针的宣传教育。一九五五年下半年，李维汉同志从苏联治疗耳癌回国后，立即进行了紧张的调查研究，承担了繁重的领导工作。当年十一月，他在中央召开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会议上发言，坚决支持陈云同志提出的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六点规划；并且又一次系统地阐明改造资本主义企业和改造资产阶级分子是互相影响而又不可分离的双重改造；指出实现和平变革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关键，在于改造资产阶级分子。他主张在

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时，对资产阶级分子网开一面，给予出路，逐步改造，向他们实行赎买，把他们包下来，给予宽大待遇。他认为，在我国强大的人民民主专政条件下，由于党的正确政策和统一战线工作，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是能够接受改造，并将继续进步的。我国阶级斗争决不是沿着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复杂的公式发展下去。他指出，那种认为对资产阶级的办法就是以斗争为主，斗争、斗争、再斗争，而且越斗越厉害的看法，是不符合我国阶级斗争发展实际的。

一九五六年初，我国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改造出现了高潮。李维汉同志及时地提出，在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和平改造的情况下，对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资料和财产的处理要贯彻“从宽、从了”的方针；对资产阶级分子的工作安排要贯彻量才使用，适当照顾的原则；对企业中公私双方人员，要认真帮助搞好合作共事关系，使私方人员真正有职、有权、有责，充分发挥他们的技术才能为社会主义服务。并且制定了相应的文件，由党中央、国务院颁发，有力地指导了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使之健康发展。在这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深刻社会变革中，李维汉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纠正缺点，以极大的革命热情，紧张工作，参加指导，发挥了重要作用。

## 五

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阶段。在新的形势下，党中央和毛

泽东同志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本方针，提出要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以李维汉同志为首的中央统战部遵照党中央的路线和指示精神，研究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提出了统战工作的新方针，制定和实行了一系列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政策和措施。

他在一九五六年初，及时地分析了统一战线形势的变化，提出了今后七年的统战工作方针。他指出，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向工人阶级缴械投降了。他们中间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进步分子日益增多，有从少数发展成为多数的趋势。知识分子从政治立场和社会地位上说，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份。各民主党派已经基本上成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团体。大多数少数民族已经先后走上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他强调，为了适应这种新的形势，今后七年统战工作的方针，应当把教育工作当作中心任务，用反复教育的方法，帮助人们进行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逐步做到同他们已经改变了和正在改变着的社会地位相适应。为贯彻这一方针，在李维汉同志的倡导下，在北京举办了社会主义学院，作为党外人士的“高级党校”。在各地也普遍举办了政治学校，有计划地、大批地组织资产阶级分子和党外人士进行系统的政治理论学习。这对于帮助他们初步掌握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巩固发展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和加强人民民主统一战

线，都发挥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李维汉同志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他在一九五六年六月召开的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作了题为《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发言，提出要正确处理党同党外人士特别是同资产阶级分子的合作共事关系，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要严格尊重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在宪法赋予的权利和义务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上的平等地位，这是发挥民主党派作用的关键。他在同年九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会上的发言，深刻总结了党的统战工作的经验，强调要发扬统战工作中的民主传统，并把这种民主传统集中归结为四个方面，即政治协商，共同工作，互相监督和自我教育。他强调指出，发扬这些民主传统，对于调动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有极大的意义。

为了在统一战线内部调整关系，加强团结，充分调动党外人士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李维汉同志发起和组织了对统战政策执行情况的检查。从一九五六年三月以后，先在中央统战部和全国政协党组的内部发动检查，接着又发动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视察和检查统战工作，要求统战部门广泛听取他们的意见和批评。五月以后，把这项检查推向全国，要求各地统战部采取内外结合的办法，普遍开展检查。经过半年检查，揭露了统战工作中不少问题。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又把党外人士在检查中提出的意见和批评进行综合整理，组织党内外同志进行讨论。同年十月，李维汉同志在全国统战部长会议上就改善党同民主党派关



系问题，作了多次讲话。其基本精神就是要充分认识民主党派进步与变化，放手支持他们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他的这些讲话，在统战部长会议后，整理成为《关于民主党派工作几个问题的指示》（草案），发到各地统战部征求意见和试行，准备报送中央会议讨论批准。后来由于反右派斗争的开展，这个文件草案被搁置下来。

李维汉同志坚决贯彻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强调用民主的方法，唱对台戏的方法，正确处理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他在一九五七年四月全国统战部长会议上，作了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对于统一战线内部的几种主要的矛盾，如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等作了深刻的分析，提出了正确处理统一战线内部矛盾的意见。他提出，第一，要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从六亿人口出发，实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战略方针。统一战线工作也就是一种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工作。第二，要加强政治工作，加强思想改造工作，提倡学习马列主义。第三，要唱对台戏。他说：“对台戏，就是贯彻毛主席所说的‘放’的方针。‘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讲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等等。”执政党“必须不回避斗争，有听取批评、不怕批评的气量。必须采取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达到新的团结的方法，而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法。必须采取分析和说理的态度，虚怀若谷，是其是，非其非，与任何人平等，以理服人，

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蛮不讲理，以势压人；并且要准备求同存异，求大同存小异，同中有异，允许别人存异。”

## 六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期间及其以后，我们党在指导思想思想上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的错误。李维汉同志在统战工作的指导上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失误。但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和其他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后果日益明显地表露出来以后，李维汉同志就开始觉察并着手纠正统战工作中的“左”的错误。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以后，党内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运动，在这个重要的时刻，李维汉同志坚决拥护和执行党中央不在党外开展反右倾运动的指示，使统一战线避免了一场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冲击。在三年暂时困难时期，他针对党外人士中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所造成的人心惶惶的状况，提出采取和风细雨的“神仙会”的方法，帮助民建和全国工商联，接着又帮助各民主党派召开中央会议。在会议中坚持倡导实行“三自”（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三不”（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主动发扬人民民主，使到会的党外人士能够解除疑虑，敞开思想，畅所欲言。会议开得生动活泼，调动了党外人士的积极性。以后，又将“神仙会”的方法推广到各地，推广到工商界、知识界和民主党派的全体成员，从而在统一战线中调整并缓和了党同工商界、知识界和民主党派的紧张关系，增强了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使党外人士在物质生活条件十分困难的形势下，经受了考

验，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并且积极为克服暂时困难贡献力量。这是李维汉同志的一个重要贡献。一九六二年上半年，李维汉同志根据周恩来同志在广州会议讲话的精神，提出了在统一战线内部实行“发扬民主，调整关系，安排使用，贯彻政策”的方针，并且亲自主持草拟了《关于统一战线的形势和任务》的书面意见，对统一战线内部关系的根本变化作了更为完整的精辟分析。他在四月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坚持反“左”，批评了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在统一战线工作上出现的一些不得人心的事，提出要按照中央的指示，在党外人士中进行甄别平反。对于在交心运动中受了处分或者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主张一律平反。对于在“拔白旗”、“反右倾”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斗争或者戴了帽子的，主张都给予平反。他还提出了对于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甄别平反的意见。在向中央汇报这次统战会议情况时，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高度评价了这几年的统战工作，指出统战工作是得到益处的，是三大法宝之一，要重申统战工作的长期性。

## 七

一九六二年下半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想在党内重新占了上风。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在中央统战部开展了对统战工作中所谓“投降主义”、“修正主义”的批判，李维汉同志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和不公正的待遇，并在一九六四年被撤掉了统战部长的职务。

十年浩劫期间，他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身陷囹圄，遭到种种磨难。但是李维汉同志对党、对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事业始终忠贞不渝，毫不动摇。他坚定地实践了自己的誓言：不管有多大风浪，一要党，二要革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批准为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摘掉“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帽子，为李维汉同志平了反。中央指出，中央统战部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四年对李维汉同志的批判，“在理论上和政治上是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在组织上是违背毛主席关于党内斗争的方针和方法的教导的”。李维汉同志对我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卓越贡献，重新得到党中央的高度评价，并为人民所公认。

## 八

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开始进入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任务的新时期。这时，李维汉同志已经八十高龄了。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他在新时期仍在孜孜不倦地学习，忘我地努力工作，为巩固发展我国的爱国统一战线而操劳。他认真地回顾和总结建国以来统一战线工作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撰写回忆录。他再次提出了为一九五七年错划为右派的人们改正和平反的意见，并得到党中央的采纳，使这个发生在五十年代中期的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错误，终于得到妥善处理 and 解决，从而提高了党的威信，赢得了人心。他提出了统一战线是一门科学的著名论断，把统一战线理论的研究和宣传推进到一个新



阶段。这对于巩固发展新时期的统一战线，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

现在，李维汉同志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的高贵的革命品质，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严格的科学态度，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工作作风，严于解剖自己的自我批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纪念，也将永远激励我们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为党的事业而努力奋斗，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 抗战期间中共平、津、唐点线 工作委员会组织发展概况

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冀东是华北地区的前哨，是连结东北和华北的咽喉地带。平、津、唐又是华北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日本侵略者在占领我国东北后，立即把魔爪伸向冀东和平、津、唐，企图把这一地区作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基地和跳板。

“七·七”事变后，日寇侵占整个华北，党中央和北方局注意到了冀东在敌后抗战中的重要地位，决定在这一地区着手组织抗日义勇军，发动游击战争，坚持武装斗争。一九三七年九月刘少奇给河北省委负责同志的信中指示：河北省党组织的中心任务是配合八路军，广泛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党的工作重点要放在农村，城市工作要短小精干，由公开、半公开的活动转入秘密工作，埋头苦干，积蓄力量，动员干部和群众去农村，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准备发动冀东游击战争，配合八路军建立燕山山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成立的。其主要任务是在河北省委迁往冀东根据地和大批党员撤退

到农村后，根据党中央关于城市工作要“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在平、津、唐三地坚持秘密工作，领导和发展党的组织，利用各种渠道了解敌情，向根据地输送人员和物资，配合八路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现将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领导机构及其在三市的组织的建立与发展情况分别简述如下：

### 一、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领导机构的建立和演变。

一九三五年冬，党中央决定派刘少奇到华北工作。一九三六年春刘少奇到天津担任北方局书记，对于纠正长期以来在华北党内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和盲动主义倾向，起了决定作用。自此，华北党的工作有了根本性的转变，重新建立和发展了组织，把公开斗争和秘密斗争结合起来，广泛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有力地支持和配合了抗日武装斗争。

一九三七年五月，党在延安召开了白区工作会议。会后，中央决定由李运昌任河北省委书记，马辉之任组织部长，李大章任宣传部长，林铁任军事部长。“七·七”事变后，党的工作中心立即转向农村，准备发动冀东武装暴动。

一九三七年十月，李运昌调往冀东，任冀热边特委书记，李大章调北方局任秘书长，河北省委书记由马辉之继任，吴德任组织部长，姚依林任宣传部长兼天津市委书记，林铁仍任军事部长。省委的工作仍以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准备冀东暴动为重点

一九三八年四月，刘少奇急电河北省委，命马辉之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马于五月下旬到延安，向洛甫（张闻天）、刘少奇等中央领导汇报了冀东抗日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刘少奇除对冀东武装起义作出具体部署外，还指示成立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由吴德担任领导。在建制上归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冀东抗日武装起义后，河北省委撤销，马辉之、姚依林均回根据地。城市工作由点线委员会负责领导，党的组织要短小精干，主要是坚持秘密工作，利用多种方式了解敌情，向根据地输送人员和物资，聚积力量，配合将来的反攻，收复失地。

马辉之在回津途中，到武汉向博古传达了中央关于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归长江局领导的决定。博古指示平、津、唐可与武汉、香港建立电台联系，并由马将电台呼号、密码带至香港和廖承志取得联系，研究确定电台通讯具体办法。七月中旬马辉之回到天津，吴德已离津，省委研究决定点线工作委员会改由葛琛负责。八月，葛琛到津。九月，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葛琛（原名俞荪、俞荃、化名刘景庭、葛玉衡）任书记，赵耕田（又名赵健义）任委员，顾磊（又名顾德、么德斋、李子元，现名严子涛）任干事。葛除领导点线工作委员会之外，还兼管特科工作。

点线委员会下辖三个城市工作委员会（简称城委）和铁路线党组织。葛琛分管北平和唐山，赵耕田分管天津和铁路。顾磊管天津和铁路线党组织的具体工作。机关设在天津英租界内。住机关掩护人有王新（现名王爱人）、刘耕



石和他爱人（也是党员），设有秘密电台，负责人为王士光（又名王光杰，化名吴厚和），直接受葛琛领导。开会和研究工作经常是在张士霞（朱子其爱人）家里。

一九三九年一月，中共中央决定平、津、唐点线委员会由长江局改为晋察冀中央分局（北方分局）领导。当时由于分局机构尚未健全，聂荣臻司令员指令冀热察区党委书记马辉之暂时代管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和城市工作。之后，区党委除通过电台与点线委员会在天津的电台联系外，还建立了四条秘密交通线：第一条是田家台—妙峰山—北平；第二条是镇边城—北平；第三条是北平—松林店—张坊—平西；第四条是北平—三家店—平西。

一九三九年三月，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委员赵耕田调冀东根据地任地委书记（一九四二年牺牲）。一九三九年四、五月间，冀热察区党委决定把葛琛调回根据地，改派赵普宣（原名庄本泽，化名刘俊，现名赵非）到天津接任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书记。因赵普宣曾长期在天津作过《火线》出版工作，熟悉天津情况和白区秘密工作，同时在白区接触过的人不多，没有暴露过，便于隐蔽。姚依林向赵普宣传达了区党委的决定，并用电台通知了葛琛。同年五月，赵普宣到天津接任点线工作委员会书记，顾磊任委员。葛琛离津前将电台、所管工作和一部份组织关系向赵普宣作了交接；所管特科关系则暂时停止，后来直接交给了区党委。赵普宣和顾磊接头后，向顾传达了区党委的决定精神，两人重新分了工。赵管北平、唐山和电台，并负责同上级联系；顾管天津和铁路。点线工作

委员会机关设在天津英租界四十一号路，住机关掩护人是王瑞芳（又名崔建华）和她母亲；同年八月间，机关又迁至法租界老西开教堂后信昌里十号。为防止暴露，赵普宣单独住在英租界六十二号路伊甸园（现和平区沙市道四十五号三楼），将此处作为备用点和通信地点，同时，赵在北平也设有通信地点和住所。

一九三九年秋，由于日伪势力渗进租界，环境愈加残酷，国民党设在英法租界内的秘密电台迭遭破坏。因此，冀热察区党委电令点线工作委员会设在英租界六十二号路伊甸园的电台停止使用。

一九四〇年四、五月之间，赵普宣奉命回平西根据地，向区党委报告、请示工作。为了加强对点线委员会的领导，区党委决定建立政治交通，定期由交通向赵普宣传达上级党委有关文件及工作指示，赵也通过交通向区党委报告和请示重要工作。会晤日期由双方约定，一般为两三个月一次。

一九四〇年夏，晋察冀中央分局的机构建立和健全后，马辉之将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和城市特科工作分别移交于分局组织部副部长刘仁和社会部长许建国领导。

一九四一年四、五月之间，赵普宣第二次回平西根据地，会见了区党委书记马辉之和姚依林（当时已调北方分局，到平西检查工作）。马辉之介绍他到平山晋察冀中央分局向刘仁汇报工作。刘仁给他讲了当时抗日战争的斗争形势和任务，并同他分析研究了平、津、唐城市工作及干部情况。赵普宣于五月回到天津，除向平、津、唐城委书

记分别传达了政治斗争形势外，并根据刘仁、马辉之和姚依林等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对工作和干部作了新的部署和安排，计划将北平城委书记周彬和唐山城委书记王继祯调离现职，派往晋察冀中央分局和平西根据地工作。

六月间，党在北平的工作发生两起意外事件：一是北平几名民先队员在前往平西根据地途中被敌人扣留，下落不明；另一起是北平特科工作人员王定南被敌人逮捕。此事影响了北平城委书记周彬的安全。因此，赵普宣于七月初通知周彬回晋察冀根据地去，并同她商定了接替北平城委工作的人选。在此之前，赵普宣已把唐山城委书记王继祯找来通知他调平西根据地工作，让他回唐山挑选接替城委工作的人选，并约定七月二十七日在天津见面，再做最后决定。不料七月二十五日，王继祯（公开职业是站务员）在唐山车站被日本宪兵逮捕，供出上级领导人赵普宣（当时化名朱俊）和两个与赵通信的地址。赵在约定日期未见到王继祯，就给他去信，约定改于八月三日在北平车站见面。此信落于日本宪兵队手中，遂挟持王继祯到北平，在见面时当场逮捕了赵普宣，并解回天津宪兵总部。赵在审讯中向敌人供出他是北平、唐山两市地下党负责人，领导周彬（未说真实姓名和住址）和王继祯，并写了自首书，答应为敌人工作。当时敌人急于破坏天津地下党，逼赵提供天津负责人的线索。他欺骗敌人说：天津的党组织不属他领导，但他认识天津地下党的负责人，可以慢慢寻找。以此要求让他外出侦察。敌人想暂时把北平的地下党领导人稳住，等天津有了线索，再一网打尽。但又怕北平

领导人长期见不到赵普宣，产生怀疑逃走。因此，九月初敌人让赵普宣去见北平领导人。赵乘此机会告诉周彬他已被捕，让她立刻转移。赵普宣跟随敌特返津后，又乘机逃脱，回到平西根据地。他在离开天津之前，亲自到黄家花园福顺里五十号，当面通知了顾迅速转移。

顾磊在赵到他家的第三天，从天津转移到北平，继续跟北平站党组织联系。后来，他考虑天津无人负责，又回到天津，住进法租界，继续坚持领导天津和铁路线党组织的工作。一九四二年二月，北方分局派黄云去天津通知顾磊回根据地。顾于三月初回到晋察冀中央分局，向城工部刘仁和刘慎之汇报了工作。分局决定顾磊留根据地工作，不再回天津，他即将所管天津和铁路线党组织的关系全部交给了刘慎之。至此，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工作全部停止。自一九三八年九月至一九四二年二月，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在敌占华北三大城市共坚持了三年零五个月。

## 二、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下属三个城市工作委员会和铁路线党组织发展概况：

（一）北平城委。一九三八年春到是年冬，北平城委书记为娄平，委员是王家杰、岑铁衡，交通王裕城。原由北平市委领导（李常青），后转归点线工作委员会领导（葛琛）。

一九三八年春天，北平党和民先队的撤退工作已告一段落，组织经过整顿也大致恢复和健全起来，当时城委系统约有党员八十人，民先队员九十人，合计一百四十余人。



后来输送了部分人到根据地，又发展了一些，仍不少于一百五六十人。城委之下未设区委，三名委员分工直接领导发展组织（支部）和党员。

娄平直接领导的组织（支部）和党员有：师大附中党支部（有党员三人）和王裕城（交通）、孙以亮（民先支部书记兼大队长）、赵元珠、廉维（女）、周彬（女，原名张培华）等。还通过周英间接领导了仁立地毯厂女工支部（有党员七人）和陶守文（幼师女党员）、袁秀先（幼师女党员）。此外，还与根据地上级党委交通白理智联系。

王家杰领导白纸坊印刷厂支部（党员四、五人，支书姓王）和其它一部分党员。

岑铁衡领导电车公司支部（党员三人，支书姓蒋）和陈泽（世界日报职员）等。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北平党组织和民先队遭受敌人部分破坏，被捕党员和民先队员约十五人左右。城委发觉有人被捕后，立即采取紧急措施，让可能牵连到的人立即离开北平或离开家，以“斩断火道”，王家杰（他和他领导的党员都受不到牵连）和周彬（因新来北平，牵连不上）留下。城委其他人先后撤至天津，并向葛琛作了汇报。葛琛决定让娄平、岑铁衡等人去冀东根据地，由周彬接任北平城委书记，恢复、整顿和发展地下党组织。周彬于一九三八年冬到一九三九年春，先后将娄平、周英、赵元珠交给她的一些党的关系接上。一九三九年暑期前后，又发展姚克荫（燕大学生、民先队员）、周平、黄云等人入党，在燕京大学建立了党支部，姚克荫任支部书记。周彬经过艰苦

细致的工作，到一九四〇年，北平地下党组织才逐步恢复起来。周彬直接领导赵元珠、黄云、张学礼（中国大学学生）、姚克荫等四人。这四人又分别领导一部分基层党的组织（支部）和党员，以及民先队员，他们之间没有横的关系。一九四〇年秋，郝贻谋（一九三八年入党，是天津民先大队负责人）考入燕京大学，由周彬直接领导。不久，姚克荫接管城委交通，郝贻谋接任燕京大学党支部书记。由于北平城委严格执行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白区秘密工作方针，党组织的活动大都是单线联系，只在学校彼此互相认识的党员中才建党支部。因此，尽管当时日寇统治严密，环境极其残酷，城市革命处于低潮，但北平地下党的组织还是有了一定的发展。从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二年，北平城委下属组织和党员，先后又发展了一批党员和民先队员。新党员有杨荣竹、高润（以上两人由赵元珠领导），曹光锐、陆孝华（已故）、赵风章（现名俞林）、马毓臻（现名纪波）、林锦双（现名傅秀）、林墨卿（以上六人均属燕大支部）、张大中（育英中学学生，由黄云领导）等。一九四〇年夏天，育英中学建立党支部（党员三人），张大中任支部书记。

一九四一年七月初，点线委员会书记赵普宣通知周彬回根据地，城内工作由黄云负责，城外燕大等处暂由赵普宣直接领导。周彬正在等待上级来人接她出去时，赵普宣突然于九月一日中午到周彬家中，说他已被捕，叫她马上转移。周当天下午乘车离开北平。临行前，让周平（党员，周的妹妹）通知赵元珠、黄云等人立即撤退。周彬到天津

后，住在王少舟（其父之朋友）家里，十一月下旬，她和根据地上级组织取得联系。十二月中旬，由交通员周景岩到津接她出去，于十二月底安全到达晋察冀根据地，随即向北方分局刘慎之汇报了工作，并将北平城委系统党员的关系全部交给了刘。因此，赵普宣的被捕，并未影响北平城委和下属组织与党员的安全。

（二）天津城委。从一九三八年九月到一九四二年二月，城委书记一直是顾磊兼任。顾磊原系全总华北铁路工作委员会秘书长，一九三八年八月，由平调津，任河北省委组织部干事；九月，点线委员会成立，河北省委撤走，转任点线委员会干事。天津市委书记姚依林离津前（姚一九三八年九月离津），将天津地下党的组织关系交给了顾磊，由顾负责天津地下党的工作，并兼管铁路的工作。一九三八年九月至一九三九年五月，顾磊任点线委员会干事兼天津城委书记，由葛琛领导。一九三九年五月至一九四二年二月，顾磊任点线委员会委员兼天津城委书记，由赵普宣领导。城委组织成员有顾磊和杨思宗（干事，又名梁波）。城委系统党员约几十人。顾在天津工作期间住黄家花园福顺里五十号（一九四一年秋迁至法租界教堂前）。城委领导的党支部有：

（1）王兰庄支部，一九三六年建立，支部书记路平是市委派去作农运工作的。天津沦陷后，市委计划在该村建立游击小组，开展武装斗争。姚依林亲自负责筹划枪支弹药，但武器尚未弄到手，日军即在该村设置了岗楼，路平亦无法在村里隐蔽，随即调出。姚依林离津前，将王兰庄

支部的关系交给了顾磊。开始时，顾通过王瑞芳和该村支部联系。为加强领导，后来直接和支部负责人刘振奎、何文彬建立联系，并送刘、何到平西根据地学习过。赵普宣也曾直接和该村支部联系过。一九四一年七、八月间，王继祯和赵普宣被捕，点线委员会设在信昌里十号的备用点和通信地址暴露，王瑞芳（当时化名周明宪）接赵普宣通知后，曾回王兰庄支部隐蔽。一九四二年二月，顾磊撤离天津后，该支部与上级组织失掉了联系。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二年，王兰庄支部的党员有刘振奎、李恩泽、刘振和、何文彬、毕玲、毕有学、安富庆、孙殿甲、郭金伦等。

（2）小站支部，一九三六年秋建立，支部书记王见新（原为宁津县党组织负责人）。“七七”事变后，王被调回宁津县工作，支部书记由王晓（又名王兆凯，化名万金声、石国良）接任。一九三八年九月，点线委员会成立后，王晓由顾磊领导。一九四〇年春，顾磊送王晓去北方分局党校学习。一九四三年春，刘仁又将王晓派回天津工作。王返津后，恢复了顾磊交给北方分局城工部的部分关系。后来，他又在小站和市内发展了几名党员。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五年，小站支部党员有王晓、孙剑秋、马建元、陈长棣、徐庆澜、王广顺、王广盛（以上两人是东亚毛纺厂工人、家在小站）、李学曾等。

（3）公大纱厂和北洋纱厂联合支部，书记田学昭，党员有任树荣、朱铮（均系女师院学生，“七七”事变后党组织派遣到纱厂作工运工作）、何方等。这个支部是日军侵占天津后，市委组织部长李启华领导建立的。市委撤销后，



顾磊曾领导过朱铮、何方等人，但支部已停止活动。

(4)天津“民先”地方队部党员有郝贻谋(民先最后一任大队长)、陈本坚(民先队委，现名陈平舟)、王健(民先队委)、张樾堂(民先队委，现名岳亭)、边晓(民先队委)等。为防止暴露，这届民先大队委中未建党支部，党员由城委干事梁波直接领导。他们是在一九三八年八月接任天津民先大队领导工作的(原大队领导成员是黄元镇、郝贻纯、陈本坚)。从一九三七年八月天津民先地方大队重建到一九三九年八月，恢复和发展“民先”队员二、三百人，队员主要分布在耀华、圣功、中西、省女中、法汉、志达、省一中、广东、工商附中及工商学院等大、中学校。在团结和教育天津各界青年，特别是大、中学校学生进行抗日救国斗争，以及培养和输送干部等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民先”队刊《灯塔》，从一九三七年九月创刊到一九三九年八月停刊，一般每月一期，从未中断。该刊在宣传党的抗日政策，报导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抗击日寇侵略，激励青年救国热情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一九三八年底到一九三九年初，日本侵略军相继占领我国广州、武汉等南方大中城市，日伪气焰十分嚣张。天津日本占领军要挟各国租界当局镇压抗日活动，“引渡”抗日人员，甚至派日本特务明目张胆地进入租界内进行侦察和搜索。在这种形势下，设在租界内的各抗日团体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相继撤离。“民先”队部领导成员陈本坚、张樾堂、郝贻谋等也于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〇年撤离天津，随着他们的撤出，“民先”在天津的工作也告结束。

(5)刘文(原名卢良铺,又名赵权)支部,一九四一年春,由顾磊领导建立。支部书记刘文,党员有郭金铎(现名贾宣)、赵琪(原名居均)、王文源(原名李秉文)等。一九四二年二月,顾磊回晋察冀根据地后,将刘文等人的关系交给了分局城工部刘慎之,由分局城工部直接领导。一九四二年冬,刘仁派人来津和刘文接上关系,支部派王文源回分局向刘仁汇报过工作。此外城委(顾磊)直接领导的党员有郭韵笙(小学教师)、毛韵珊、范玉珍、王素珍(马大夫医院护士)、王瑞芳等。

一九四一年八月,赵普宣被捕,未向敌人暴露顾磊,所以未影响天津城委和下属组织的安全。顾磊一九四二年二月撤回晋察冀根据地后,将天津地下党的组织关系交给了北方分局城工部。城工部派人来津恢复了部分关系。但有一部分关系未得恢复,因而失掉了联系。

(三)唐山城委。领导成员王继楨、张仁(原名刘殿元,开滦煤矿工人)、崔成业(原名崔振华,新洋灰厂工人),交通张象乾(又名张向前)。王继楨在冀东暴动后调到唐山工作,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到一九四一年七月,一直任城委书记,公开职业为唐山车站站务员。城委系统有党员约百人,百分之六十是冀东暴动以后发展的,主要分布在开滦、启新、华新等几家大厂矿企业中。启新洋灰厂党支部最大,有党员五十人左右,支部书记王广义。开滦煤矿支部有党员二十余人,支部书记何善风。华新纱厂支部党员十余人,支部书记是李广宽。开滦中学支部党员二十余人,支部书记张铁如。另有单线联系的党员数人。

一九四〇年，城委委员张仁和崔成业调往冀东根据地。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五日，王继祯被捕，供出开滦、启新、华新等三个支部的负责人和上级领导人；并承认了已落敌手的名单是记载党员交党费的，致使唐山城委和下属组织除开滦中学支部和几个单线联系的党员外，全遭破坏。何善风、王广义、李广宽等十余名党员被敌人逮捕，有的惨遭杀害。此外，还波及本来不属城委系统的唐山车站党支部，损失十分严重。

(四)铁路线党组织。铁路以北宁沿线为主，活动范围：西至南口，东至山海关，南至德州、石家庄。一九三八年九月至一九四二年二月，顾磊一直兼管铁路线党的组织。他利用设在天津法租界教堂后世昌里的秘密联络点(叶克明母亲的住处)领导平、津、唐三个车站支部的负责人。(1)北平站党支部，负责人赵文瀚(列车长)，党员有赵治功(列车长)、王知白(行李员)、翟春芳(电务工)、徐平(魏善庄站扳道员)、沈小田(廊坊站)、许言午(丰台站)、郝成义(前门站)等。(2)天津站党支部，负责人是杨士英(行李员)和马钧(铁路局职员)，党员有郑衍曾(西货场职员)、田鑫(职员)、李向志(职员)等。(3)唐山站党支部，车站一九三六年春天开始发展组织，有李守正和陶策两个党员。“七七”事变后逐渐发展，一九三九年建立支部时，党员已有十几名，支部书记李守正，分三个小组。李守正兼唐山车站小组组长，党员有张向前、张萝才、邢风晕、许××。铁路工厂小组，组长金义铭，党员有王贺玺、芦××。古冶车站小组，党

员只有薛少斋、杨礼民。点线委员会成立前，李守正由中共铁路工作委员会负责人李颀伯直接领导。点线委员会成立后，顾磊通过杨士英领导李守正。一九三九年，杨士英调根据地后，顾磊直接领导李。王继祯被捕供出唐山车站党支部书记李守正和铁路工厂党小组组长金义铭，李、金相继被捕，支部遭到破坏，并波及北平站赵治功和天津站郑衍曾，也遭逮捕，但平津两站的党组织未遭破坏。一九四二年，顾磊回晋察冀根据地后，将铁路线党的组织关系交给北方分局城工部。城工部派郑诚到北平继续领导铁路线党的地下组织，直到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

“七七”事变后，为深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铁路职工在中共铁路工作委员会领导下成立了“铁路员工抗日救国会”。一九三八年九月，河北省委撤离天津后，该会亦交顾磊领导，会员分属平、津、唐三站党支部领导。该会在宣传党的抗战政策，团结铁路职工抗日，为我军传送情报，运送物资等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还办了会刊《铁球》，宣传党的抗战政策，鼓动铁路员工奋起抗击日寇侵略。

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在日寇极其残酷统治的环境下，坚持战斗三年多。他们在晋察冀中央分局和冀热察区党委领导下，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关于白区工作的方针，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第一，恢复和重建了党组织，发展了党员，壮大了党的队伍，为日后党的进一步发展建立了立足点。抗日战争开始后，原设在北平、天津的党的领导机关撤至山西，大



批党员和抗日分子也撤出平、津到农村拿起枪杆子打游击。这完全是正确的，但城市中党的力量很薄弱。点线工作委员会成立后，在学生、职员、教员和工人中逐步发展了一批党员，学校、工厂、企业等各方面建立了一些支部，他们贯彻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和“坚持秘密工作”的方针，为抗日战争后期和胜利后党的大发展打下了一定基础。

第二，为抗日根据地输送了大批干部和党员，特别是一九三九年初到一九四〇年夏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点线工作委员会通过三个城委和铁路线党组织，不断向根据地输送党员和抗日群众，充实了根据地武装部队和地方政府的干部力量。

第三，通过多种渠道为根据地采购和运送物资，如军械、电讯器材、医药、布匹、食盐、纸张、文具等，支援了根据地的军需民用和抗日战争。

第四，搜集了一些重要的军事情报，如铁路沿线日、伪军事力量的部署，日寇炮楼、封锁线、关卡的设置，军队的调动，枪炮弹药、汽车、粮食等辎重的存储装卸地点和运输去向等，为我军出击敌人提供了可靠的情报。

第五，通过秘密交通线护送了一些国际友人到晋察冀根据地参加抗日工作，如奥地利的某医学家和曾在燕京大学任教的英国籍教授林迈可夫妇等就是经过平西，转往晋察冀军区和延安参加抗日工作的。

第六，通过各种途径，宣传党的抗日战争的方针政策 and 统一战线政策，团结爱国力量和广大群众，推动了敌占

华北城市抗日救国运动的深入发展。

总之，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在抗日战争中，坚持党的秘密工作，坚持党的方针路线，为抗日战争作出了贡献。点线工作委员会的大量工作，不仅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为后来解放战争中平、津、唐等地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高涨，党组织的迅速发展壮大都是有贡献的。

（石火、张竹涛执笔整理）

# 抗战时期党在赣南 “工合”中的活动和作用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工合”是中国工业协会的简称。抗日战争时期的赣南工业合作运动，在我党的推动下发展很快。它对动员后方人力物力，支援前方抗日，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对促进赣南地方工业生产的发展，安置难民就业，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还为我党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组织形式。

## 一、中国工业协会的成立

抗日战争爆发后，如何动员后方人力物力发展工业生产，增强抗战经济力量，是关系到能否坚持长期抗战，取得抗战最后胜利的重要问题。为此，当时在中国的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埃德加·斯诺和胡愈之、陈翰生等人，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发起组织“中国工业合作设计委员会”，推举艾黎为这个委员会的召集人。一九三八年五月，制定了中国工业合作社发展计划，提出了建立三万个工业合作社，使工业恢复到战前水平的目标。六月，艾黎到达汉口，着

手筹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这一活动，得到周恩来、博古的积极支持。周恩来提出，“工合”的主要任务，“是推动蒋介石抗战，不让他投降，并尽可能多地争取国际的支持。”这就为“工合”规定了要为巩固和发展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服务的明确方针。周恩来还提出：“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工合’一定要同国民党政权配合，但要保持自己的社会团体的面貌，使‘工合’成为一个群众性组织。”在人事安排上，“最好吸收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的爱国民民主人士，这样可使‘工合’不致发展为一个官僚机构。”

经过一番周折，“工合”的计划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同意。一九三八年八月五日，在汉口正式成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由艾黎出任技术顾问，负责协会的组织工作。接着成立了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和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王世杰、邵力子、张治中、杭立武、俞鸿钧以及爱国民民主人士沈钧儒、黄炎培、莫德惠等在内的理事会，由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任理事长，宋美龄任名誉理事长。为了争取海外的捐款和物资技术援助，筹集发展‘工合’事业的基金，并使海外捐款不被侵吞和挪用，一九三九年一月，在香港组织了“工合”国际委员会，宋庆龄任名誉主席，英国主教何明华任主席，陈翰笙任执行秘书，斯诺、艾黎、宋子文等为委员。此后，“工合”事业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在国民党统治区、解放区、游击区都建起了一批工业生产合作社。在当时的环境下，‘工合’成了一支支援抗日的独特经济力量。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成立后，相继成立了西北、东南、西南、川康四个办事处。一九三八年九月，艾黎来到赣州筹组“东南工业合作协会”办事处。同年十月，孟受曾经党组织安排，由“中国工合”总会委派来赣州协助艾黎工作。经过三个月的筹备，一九三九年初，“东南工合”办事处在赣州城西津路中华圣公会正式成立，后迁至赣州水东沿坝上。“东南工合”办事处第一任主任由艾黎兼任，后来分别由王毓麟、陈志昆<sup>①</sup>担任。办事处设有组织课、财务课、总务课、技术课。“东南工合”管辖江西、广东、福建、浙江、安徽五省的二十八个县级“工合”事务所（或指导站），有七百多个工业生产合作社，八千多名社员。赣南设“工合”事务所（或指导站）的县有：赣县、于都、兴国、瑞金、宁都、会昌、南康、上犹、大余、龙南等十个县，有二百多个工业生产合作社，近三千名社员，合作社的生产行业有四十多个。

## 二、党在赣南“工合”运动中的活动

赣南工业合作运动，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中产生的。它不但是一个经济运动，而且是一个社会运动，是支撑反侵略民族解放斗争的一支生力军。因此，我党组织根据周恩来关于“工合”工作的指示，围绕发展“工合”运动，开展了各项工作。

### 1. 在“工合”中建立党的组织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中共赣南特委派薛扬（现名薛景

---

<sup>①</sup> 陈志昆，旅美华侨。

扬)、张石仁与在“东南工合”任组织课长的孟受曾接上党的组织关系，经孟受曾安排进“工合”工作。接着，中共赣南特委和中共江西省委又相继派了李奕文(现名李福海)、黎雪明，笪移今、黄路平、胡先行等进“工合”工作。一九三九年初，成立了中共“东南工合”支部。从此，“东南工合”有了党的组织。一九三九年六月，中共赣州市委成立，“工合”支部归赣州市委领导。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中共赣西南特委和中共赣州市委机关都曾设在“东南工合”办事处里，成为我党在赣州活动的阵地。一九四〇年夏，成立了中共“东南工合”工委。

这一阶段是赣南“工合”事业兴旺发达的阶段。中共赣州市委的领导成员以“工合”职业为掩护，在赣州“工合”系统中做了大量工作，发展了一批党员，壮大了党的队伍。在赣州城内的工业生产合作社中，先后建立了机器、染布、印刷、皮革、供销联社等五个社的党小组，党员最多时达四十多名，其中有三十多名共产党员担任了“东南工合”办事处课、室的领导和县级“工合”事务所指导员以及合作社的干部。他们为办好“工合”事业而埋头苦干，廉洁奉公，密切联系群众，深受社员群众的好评。

## 2. 推动、帮助办好工业生产合作社

孟受曾等同志到赣州后，在协同艾黎筹组“东南工合”的同时，到赣州城内考察袜子、毛巾、造船、机器等行业的生产和市场情况；到于都、兴国、瑞金等县调查了资源情况。经过调查，艾黎与组社人员共同认为，组社必须立足当地资源，从市场需要出发。鉴于赣州工业生产基础薄

弱，日用工业品奇缺，不能满足抗日军民需要，认为必须发展机器、造纸、纺织等行业的生产，造船、修船业务也应有较大发展。当时，民众抗日救国热情高，大批难民、失业工人谋业无门，是为发展工业生产的有利条件。在组社工作上，首先登记失业工人和有劳动技能的难民，其次宣传合作社的性质、任务和组织起来，自力更生，生产自救的重要性，第三，指导拟定合作社的章程，第四，为即将建立的合作社做好发放贷款的准备。

在此基础上，一九三九年二月，“东南工合”按“中国工合”总会关于组社的有关规定，进行了赣州机器合作社、于都瓷器合作社的组社试点，紧接着在赣州城内全面开展了组社工作。在薛扬等一批共产党员积极努力工作的推动下，从一九三九年开始至一九四〇年上半年，仅在赣州一地组建起来的工业生产合作社就有三十多个（即：机器、造船、印刷、染裱纸、织布、缝纫、纽扣、制革、皮件、制鞋、麻袋、木器、竹器、藤器、篾器、铁铜锡器、染布、毛巾、袜子、雨伞、电镀、酒精、牙刷、肥皂、砖瓦、碾米、油墨、文具、药棉、纱布等）。与此同时，赣南还有十个县相继建立了二百多个工业生产合作社，占“东南工合”所属“工合”基层社的三分之一。为了搞好“工合”的产品销售和原材料采购供应，在赣州成立了供销联社性质的“工合”供销系统。各合作社的门上都有三角黄底红字“工合”会徽，门的两侧写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标语。有“工合”标记的产品充满市场，赣南呈现一派发展战时经济的新景象。

为了办好工业生产合作社，赣南“工合”各县事务所指导员（大部份是共产党员），发动社员群众搞好合作社的民主管理。“工合”社章规定，社员大会是合作社的最高权力机构。社员大会上选举产生社的理事会和监事会，每年选举一次，可以连选连任。合作社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工资形式有计件、死分活值、计时三种。各社从盈利中提取百分之三十为公积金，百分之十为公益金，百分之六十为劳动分配。每年年终，合作社要向社员公布财务收支情况，接受社员的检查监督。

### 3. 培养“工合”干部

为了适应“工合”事业的发展，“东南工合”办事处决定举办“工合”讲习班，培养“工合”干部。孟受曾推荐当时在赣州第四专员公署任职的笪移今负责这项工作，艾黎请笪移今草拟计划并担任“工合”讲习班主任。为此，笪移今向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黄道作了汇报。黄道支持他去“工合”工作，并建议把讲习班办在瑞金，一是因为那里是老苏区，群众基础好，可避开国民党顽固派的干扰破坏；二是红军长征时埋藏了部分枪支在一个水塘里，需要时可以取出来武装群众；三是可派黄路平到“工合”讲习班任社会教员（实为政治教员）。后来党组织又增派了胡先行、钟敏等到“工合”讲习班工作。

从一九三九年六月开始至一九四〇年四月，“东南工合”办事处在瑞金县历任村共办了三期“工合”讲习班，主要是培养“工合”事务所指导员、会计员。学员多数来自江西、福建、广东等地，有我党派去学习的同志，有“工合”基层



社推荐的社员骨干；有从社会上招考的进步青年。每期学习时间三个月。课程有：合作概况、合作法规、合作指导、工合会计、机械、化学工业、农产品加工及冶矿、三民主义（实际上是讲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以及抗日纲领、国际形势与中日问题，还有“工合”运动与中国经济、军事常识等。教学方法是：讲课教授、小组讨论、组社实习、课外活动。讲习班训练原则是：每个学员养成刻苦耐劳的实干精神，养成纪律化的生产习惯，养成朝气蓬勃的人生观，养成深入民间的“工合”干部作风，使经济能配合军事需要。每期讲习班有四十名学员，三期共培养了一百二十多名。他们经过学习，有一种共同的信念，就是要为建立三万所工业合作社而努力、前进、奋斗、创造。

“东南工合”办事处还在赣州办了机械训练班和女社员训练班，由中共党员王诚、张云等负责。在南雄办了两期培养“工合”干部的培黎<sup>①</sup>技术训练班，由中共党员勇龙桂、毕平非等负责。各种专业和技术训练班，为“工合”造就了一批技术人材。

#### 4. 注重经常性的教育工作

中共赣西南特委和市委除了帮助和支持“东南工合”举办“工合”讲习班和不同类型的专业训练班，对干部和社员进行政治思想、技术业务的训练教育外，还十分注意经常性的教育工作。派了中共党员主编《东南工合》、《工合战士》杂志。这两个刊物主要是对社员进行组织起来，发展工业生产，支援前方抗战的教育；宣传我党抗日救亡的主

<sup>①</sup> 培黎，美国人，曾任南京金陵大学教授，是艾黎的老师。

张，揭露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行径。“东南工合”办事处还办了“工合”夜校，定期举行时事讲座，教唱抗日歌曲，开展节日庆祝和文体活动。通过上述不同形式的经常性教育，提高了“工合”干部和社员的思想觉悟，激发了抗日爱国的热忱，进一步坚定了办好“工合”事业的信念。

### 三、赣南“工合”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的作用

“东南工合”办事处成立后，贯彻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外争取国际的同情与援助，吸收侨胞投资和参加工作；对内以合作形式，发动失业工人、技术人员、难胞以及抗日军人眷属组社就业，加紧生产，支持抗日。

#### 1. 团结国内外进步力量

在赣南各级“工合”工作的共产党员，都能团结抗日爱国人士和外国朋友，尊重他们的职权，支持他们的工作，搞好合作共事关系。“工合”创办之初，干部不足，技术管理人才缺乏，艾黎先后到中山大学、厦门大学、江西工专、高商等大专学校演讲，宣传“工合”的性质、任务和“工合”对支援抗日的的作用，选拔了一批优秀学生到“东南工合”办事处、县事务所工作。“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成立不久，又分别在马尼拉、纽约、伦敦成立了“工合”推进委员会。在香港和国外各地特别是英国和美国宣传中国抗日的重大意义，宣传“工合”对支持长期抗日的重要作用。向海外华侨和同情中国抗日的各国社团和朋友募集捐款，争取他们支持中国工合事业。经过广泛宣传，海外华侨中的

爱国进步人士纷纷回国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其中到“东南工合”办事处工作的有：旅加拿大华侨、机械工程硕士王毓麟，任“东南工合”办事处技术课长；旅美华侨、化学博士黄文玮，任“东南工合”办事处技术研究室主任；香港同胞容观成任“东南工合”办事处财务课长。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日的国际朋友中，也有不少人放弃高薪和优裕生活，来中国参加“工合”事业，其中到“东南工合”工作的有：美国朋友、经济学家赖扑吾，在“东南工合”搞经济核算和财务分析；英国朋友、经济学家霍克，任“东南工合”办事处宣传教育课课长；奥地利朋友、医师严斐德，主持“东南工合”办事处医务所工作。他们都为“工合”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 2. 发展有利于抗战和人民生活的地方工业

由于“工合”中的共产党员和“工合”干部的积极努力，充分调动了广大社员的积极性，使赣南二百多个工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蒸蒸日上。从一九三九年开始生产的主要产品有：钨砂、毛铁、木炭引擎、印刷机、碾米机、成套制革机、文化用纸、木帆船，纺织品、土糖等四十多种。这些产品中，有民用的也有军需的；有生活资料也有生产资料；有的在当地市场销售，也有的运销外地。赣州水东机器生产合作社生产的汽车木炭引擎、印刷机、碾米机、宽幅织布机、成套制革机（包括磨皮机、打紧机、上色机、磨米机）等机械产品，除省内销售外，还销往闽粤地区，是赣州历史上机器生产的起点。对织布、袜子、毛巾等行业生产，进行生产技术上的改革，如由织窄幅土布改为织宽幅细布。药棉、纱布、酒精、油墨等产品，填补了当时

赣州市场的空白。造纸由生产土纸改为生产文化用纸，销往桂林，以供当时文化用纸和印刷抗日宣传刊物的需要。于都陶瓷，由原来生产粗碗、钵子等发展到生产细瓷产品。毛巾、牙刷、药棉、纱布、军棉衣等产品陆续运往前线，支援前方抗日。

### **3. 安置难民和失业人员就业**

南昌沦陷后，有一批江浙、南昌等地的难民来到赣州，没有职业，同时赣南各县（镇）也有一批手工业工人和抗日军人家属失业。“东南工合”办事处对失业工人和难民进行了登记。按照社章和办社程序以及各自的劳动技能，帮助他们组织起来。在赣州，安置了九百多名难民和失业工人就业。在瑞金，组织有纺织技术的南昌难民，办了织布合作社，还组织抗日军人家属办起了草鞋生产合作社。在兴国，把有劳动技能的抗日伤员组织起来，办了制鞋、缝纫等合作社，不仅使他们有了正当职业，生活得到改善，并使当地社会秩序好转，深受民众赞扬。

### **4. 争取国民党地方政权的支持**

在“工合”创办和发展过程中，“东南工合”根据周恩来同志关于“工合”工作的建议，从团结抗日的大局出发，在组建“工合”基层社时，都向国民党地方政府申请办理登记手续。对于地方上一些抗日救亡集会和纪念性活动，都积极配合。如组织“工合”社员参加赣县抗敌后援会工界分会的成立大会和“双十”节的纪念活动等。“工合”的一些公开活动，也邀请国民党地方当局和各有关方面人士参加。由于用这些合法斗争手段进行活动，在抗日初期，也曾取得



了国民党政府对“工合”活动的某种默认。

## 四、同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

### 1. 国民党顽固派摧残“工合”事业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的政策逐渐转向积极反共，消极抗日，仇视一切抗日进步事业，对“工合”事业也不例外。赣县县政府开始就拒绝办理各工业生产合作社的登记手续，不发给执照。继而想方设法派国民党顽固分子进入“工合”，企图争夺“工合”领导权，遭到艾黎和“工合”干部的抵制。国民党顽固派因此更加怀恨，常以查户口、抓壮丁为名，迫害“工合”工作人员。一九四〇年四月三十日，国民党特务竟在光天化日之下，追捕赣州染织合作社会计、中共党员甘时鸣。“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特务包围搜查了“东南工合”办事处和“工合”赣县、于都等事务所。“东南工合”办事处主任、爱国华侨王毓麟和近百名“工合”工作人员被捕，有的被关押数年。一九四二年，国民党政府在经济上由限制对“工合”的银行贷款，到巧立名目不择手段地掠夺“工合”财富，把“工合”的设备、产品、物资低价买去，高价卖出，从中牟取暴利，以达到搞垮“工合”的可耻目的。

### 2. 反逮捕

在国民党顽固派对“工合”进行压迫的时候，中共赣州市委领导通过在赣州第四专员公署任职的进步人士周伯皆，了解到国民党特务对“工合”干部要进行大逮捕的阴谋，

即组织党员和干部开展了反逮捕的斗争，有组织有计划地撤退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如市委组织部长薛扬撤出“工合”，经宁都转到新四军。市委宣传部长李奕文撤离“工合”，与中共广东北江特委接上了关系。中共赣州市委改组为中共“工合”工委。中共赣西南特委机关也从“东南工合”办事处迁到赣州水西龙庄。尽管“工合”党组织遭到破坏，我党仍没有放弃这个阵地。一九四一年冬，中共粤北省委派了毕平非、吴知因等同志先后到“东南工合”办事处开展活动。他们一方面积极协助“工合”总会委派来的“东南工合”办事处主任陈志昆营救被捕的同志；另一方面开展同当时在“东南工合”办事处任秘书的国民党特务唐允舜的斗争，揭露他贪污问题，迫使他辞职离开“工合”。毕平非等同志在“东南工合”的活动一直坚持到一九四五年七月。

斯诺是“工合”事业的热情支持者，他对“工合”作了如下评价：

“它给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提供了工作和教育，并且最后证明，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合作运动的先驱。”

“‘工合’成了一个民主合作社会的相当健全的雏型，生产着多种多样有战时价值的物品。”

“这个机构摆脱了贪污舞弊和裙带关系的弊病。因而在一个时期里相对地免受官僚政治的控制。就是因为存在着这一历史上偶然出现的情况，工合组织很快就成为政府中最反动的分子的扼杀对象”。

赣南“工合”发展的历史说明，是党支持和推动了“工合”的发展，而“工合”也掩护了党的活动。“工合”在党的统

一战线工作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工合”应作为南方局领导的抗日救亡工作的一个重要侧面而载入史册。

# 抗战时期党在国统区 统战工作的一些情况

杨圣清 谭宗级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是全国抗日的中心，是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军队的大本营；而设在重庆的南方局则是中共在国统区的司令部和指挥中心，是国统区人民和延安联系的枢纽。

当时国统区党组织的任务，除了领导党的秘密工作，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配合和支持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事斗争外，就是广泛地开展国统区的统一战线工作。南方局的统战工作，由周恩来、董必武和叶剑英亲自领导，日常工作则由董必武、叶剑英分管的南方局统战委员会（下设军政、党派、社会、妇女、青年五个组）和文化委员会等组织去做。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南方局创造性地贯彻和执行了党中央的统战政策，国统区的统战工作获得了显著的成绩。

同国民党领导集团的统战是我党统战工作的主要任务，此外，还要争取、团结中间和进步的广大群众。本文主要介绍后一方面的情况。



## (一)

国民党是一个由复杂成分组成的政党，其内部并非铁板一块。特别是处在中日民族矛盾尖锐化的情况下，它不断地在发生着分化。国民党中除顽固派外，还分化出了民主派和进步人士，如冯玉祥、于右任、孙科、邵力子、贺耀祖、李德全、倪斐君等等。他们主张抗战、团结、进步，反对妥协、分裂和倒退。中共把他们与蒋介石顽固派加以区别。中共南方局主要负责人周恩来、董必武和王若飞等和他们进行广泛的接触，经常邀请他们一起商讨抗日、民主大计；同时，还选派党员干部同他们建立经常性的固定联系。如派王冶秋担任冯玉祥的办公室主任，并有王梓木（原西北军系统的，是冯玉祥的老部下）、赖亚力经常同冯玉祥联系。党对冯玉祥的反蒋斗争予以支持。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四日是冯玉祥六旬寿辰，《新华日报》特地出版专刊表示祝贺。周恩来撰写题为《寿冯焕章（玉祥）先生六十大庆》的专文，高度评价了冯玉祥的革命活动，鼓励他“宏济艰难，为民请命，为国效劳”，并相信他的“革命精神，定能成就伟大事业，不负天下之望”。中国共产党通过王炳南和屈武同于右任保持了经常的联系。一九四一年，于右任因执行监察职权遭到蒋介石的阻拦，愤而离开重庆，移居成都，周恩来立即嘱托屈武代表他向于右任表示慰问，肯定了他的行动的正确，要他不要悲观失望，坚持斗争。贺耀祖当时是国民党重庆市长，其夫人倪斐君思想开明，邓颖超便通过对倪斐君的工作，争取贺耀祖。国民党中央组

组织部副部长兼中统局干事长张冲，是一九三二年国民党特务机关策划的陷害周恩来的所谓“伍豪事件”的主谋者。抗日战争期间，他主张联共抗日，並作为国民党代表多次同我党谈判。周恩来以大局为重，不计前仇，与之交往不下二三百次，彼此增加了友谊，他给予我党不少帮助。一九四一年八月张冲病逝，周恩来题写“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的挽联，並为《新华日报》撰写题为《悼张淮南（张冲）先生》的社论，表示深切悼念。在追悼会上，周恩来发表演讲指出：“追悼淮南先生，当继其志，加强团结，共御外侮。”对张冲为国共合作所作的努力作了充分肯定，这在国民党中产生不小影响。甚至对蒋介石的谋士、秘书陈布雷，中共南方局也不放弃同他的交往。周恩来帮助陈布雷找到“失踪”的爱女陈莲（地下党员），动员她回到重庆，留在陈的身边工作，周恩来还带口信给陈布雷，希望他的笔不要为一个人服务，要为四万万同胞服务。陈布雷对此不能无动于衷。他在抗战中也曾写过一些宣传抗战的文章，还于一九四一年同周恩来等共同联名作为郭沫若祝寿的发起人。

皖南事变后，南方局有计划地将一批党内外干部转移出去，留在重庆的一些党员又受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工作发生困难。这时，为了继续做好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工作，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周恩来提议，由一部分中共党员、爱国人士、国民党左派以及在国民政府中担任较高幕僚职位的人士，在重庆组织了“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又称“小民革”）。参加这一组织的有王昆仑、王炳南、邓初民、刘仲容、许宝驹、许宝骥、屈武、高崇民、曹

孟君、谭惕吾等人，后来发展到二百多人。他们在国民党上层中作了大量工作，对于坚持抗战到底，反对分裂，反对倒退，展开抗日民主活动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 (二)

地方实力派是我们争取的中间势力之一。抗日战争时期，西南地区的地方实力派主要有四川、云南和广西等三大派。这三大派都有自己的地盘，都同蒋介石有着尖锐的矛盾。这三大派在抗日战争前虽然名义上服从蒋介石的中央政府，实际上却是拥兵自重，各据一方，自成一个独立王国。直到一九三五年，蒋介石借“追剿”红军的机会，才把他的嫡系军队开进云南和四川。接着，又借抗战之名，将四川、云南和广西一部分军队调离本地，并把重庆作为陪都，这样，蒋介石的势力便一步步伸入四川、云南等省，排挤地方实力派，从而加深了他与这些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矛盾。如蒋介石控制了四川的主要地区后，将四川军阀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等人的势力挤到川康边境，处心积虑地想把他们吃掉，将四川全部纳入他的统治之下。这就引起刘、潘、邓等人对蒋介石的严重不满。云南地处西南边陲，是国际交通的孔道，有滇缅公路和滇越铁路直通国外。蒋介石为了维护他在西南的统治，企图控制云南，这与龙云、卢汉等云南地方实力派自然形成尖锐的矛盾。在广西，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采用封李（宗仁）中原、拉白（崇禧）入阁，分化上层、拉拢中层、军事分散、财政统制以及经济收买等手段极力控制，广西地方实力派更亲

近蒋介石集团，但他们之间的矛盾并未消除。上述情况便为我党对西南地方实力派开展统战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

早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中国共产党为了联合四川实力派共同抗日，就派代表到四川同刘湘进行了谈判，并签订了抗日停战协定。南方局成立后，周恩来、董必武和王若飞等曾多次同刘文辉、潘文华和邓锡侯面谈，同他们分析抗日战争的形势，阐明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晓以抗日救国大义，要他们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反对投降妥协。一九四二年二月，周恩来在重庆机房街吴晋航宅会见刘文辉时，明确地向他表示：在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独裁的斗争中，共产党愿同国民党民主派合作，尤其希望西南地方的民主派能与共产党密切合作。同年六月，党又从延安派王少春夫妇到刘文辉处建立电台。一九四四年夏，刘文辉派杨家祯到重庆会见王若飞。南方局也曾派华岗等到刘文辉处作工作。这种联系一直保持到一九四九年刘文辉率部起义。我党在潘文华处也设立了电台。一九四九年潘文华率部宣布起义，为解放四川作出了贡献。

南方局也派了不少人到云南做龙云和卢汉的工作。抗战初期，借成立战地文工团的机会，通过罗炳辉的关系，南方局派薛子正到滇军一八四师张冲部工作，薛先后担任张冲部秘书和参谋长等职，还担任了卢汉的参谋，并通过张冲作了龙云工作。一九四二年，南方局决定由张文澄夫妇、方文影、杨才（全福）组成调查研究小组到龙云第二路军张冲部工作。杨才随后又转到龙云的滇黔绥靖公署，在此建立了电台。一九四三年秋华岗到云南，直接与龙云往



来，进一步密切了中共中央、南方局与龙云的关系，促进了龙云的思想变化。以后他积极支持云南人民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独裁，要求民主的斗争，昆明一度民主空气弥漫，在大后方被誉为“民主堡垒”。

李济深是广西地方实力派的领袖，与蒋介石长期处于对立状态。抗日战争开始，李济深继续受到冷遇，直到一九三九年国民党成立战地党政委员会，李始被任命为副主任委员。一九四〇年五月，桂林行营撤销，改为军委会桂林办公厅，李济深又被任命为主任。桂林办公厅虽是一个没有指挥权的办事机构，但李在名义上却成为桂林的最高军事长官。中国共产党利用李济深等桂系人物与蒋介石了间的矛盾，先后派张友渔、梅龚彬、于炳然等去桂林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大批文化人从香港等地辗转来到桂林。南方局派出李亚群到桂林负责统战工作，通过李济深的关系对这批文化人进行保护。蒋介石“邀请”这批人到重庆集中，李济深却在桂林文化界欢迎会上表示：“不强人之所不为，而愿人人心安理得，正直做去，故前不愿奉劝桂林文化人，跋涉数千里，走入雾都。”<sup>①</sup>一九四四年六月，桂林成立“文化界抗敌协会”，李济深任会长，李任仁、阿阳予倩等二十七人为委员。李济深公开发表演说，抨击蒋介石的失败主义，要求国民党当局加强民主，坚持抗战。桂林一时人文荟萃，获得文化城的盛誉。

### （三）

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党派，除中国共产党和国民

<sup>①</sup>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情况资料》，第35页。

党两大政党外，还包括以沈钧儒为首的中国人民救国会，以章伯钧为首的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三党)，以黄炎培为首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以梁漱溟为首的乡村建设派，以曾琦、左舜生为首的中国青年党，以张君勱、张东荪为首的国社党等党派。这些党派因其组织成员的出身及其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他们的政治倾向和政治主张也不尽相同。有的坚持抗战、团结和进步的立场，拥护中共的政治路线和各项主张，思想左倾；有的动摇于国共两党之间，长期坚持中间立场；有的则坚持右的立场，追随国民党，反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这些党派成为国共两党争夺的主要对象。中国共产党为了粉碎国民党蒋介石的“孤立中共”和“拆散各小党派与中共联盟”的阴谋，团结各党派坚持抗战和争取民主，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力地做了争取和团结民主党派的工作。

第一、中共南方局主要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和叶剑英等，同上述各党派的代表人物沈钧儒、邹韬奋、沙千里、史良、章伯钧、黄炎培、张申府、梁漱溟、左舜生、张君勱、罗隆基等，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经常与他们会面和座谈，出席他们组织的各种活动（如聚餐会、时事座谈会等），听取他们的意见，并向他们说明中共的政策，藉以密切彼此间的关系，增进相互间的了解。

第二、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与我党一起同国民党的反共投降活动展开斗争。从一九三九年起，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实行消极抗日和积极反共政策，将抗战初期人民和各民主党派争得的少许权利，一概取消。各民主党派对国民党当局在政

治上的倒行逆施日益不满。在中共发出要求国民党实行民主、实施宪政的号召下，国民参政会中的各民主党派参政员沈钧儒、邹韬奋和黄炎培等人，于一九三九年十月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将国民参政会内“各方热心国事的人士”组织起来，促进国内统一、团结和宪政运动。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加紧反共的同时，也对各民主党派施以种种压迫。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中共南方局又帮助沈钧儒和邹韬奋等人，联络各方面民主力量，于一九四一年三月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以至中国青年党和国社党都加入这个组织，从而进一步扩大了民主党派之间的团结。一九四四年九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称中国民主同盟，十月，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要求“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各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表明民主党派进一步向中共靠拢。中国共产党曾派党员王炳南、张友渔、楚图南、周新民、钱俊瑞等参加民盟组织，在盟内做了大量工作，这对民盟的巩固和扩大起了重要作用。

第三、对民主党派的错误，恰如其分地开展批评。如一九三七年九月一日，章乃器在《申报》上发表题为《少号召，多建设》的文章，认为在全民抗战实现后，应当少作政治号召，多作积极的建议。同年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批评了章乃器的这种意见后，周恩来曾多次同章乃器谈话，指出他的错误，促使他放弃自己的错误观点。

第四、对民主党派政治上的进步予以鼓励，生活等方面的困难予以热情帮助。沈钧儒、邹韬奋、史良、沙千里、李公朴、陶行知等是民主党派中的左派，他们为抗战和民主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周恩来和南方局对他们的斗争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热情的鼓励。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是沈钧儒七十寿辰，重庆各界为他举办了祝寿茶会，董必武致词称誉沈老“始终是一位民主战士”，号召大家学习沈钧儒的精神，为抗战、团结、民主继续奋斗。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四日邹韬奋积劳成疾，与世长辞，中共中央接受他临终时的请求，追认他为中共党员。中共南方局对民主党派人士的生活等方面的困难也给予热情的帮助。曾琦的夫人宋静芳在原籍富顺被敌机炸死，无以为葬，南方局便以“周拱”名义送去奠仪五千元，为之营葬。左舜生的三岁女儿患急性肺炎，束手无策，周恩来和董必武立即派八路军办事处的汽车把她送到医院抢救，使左深受感动。董必武还把延安出版的《列宁选集》送给左舜生，鼓励他转向进步。

由于我党对民主党派采取了团结争取的正确方针，使之在抗战后期政治上日益进步，在民主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 (四)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董必武和王若飞等南方局领导人，同国统区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有着广泛的接触和交往，向他们宣传了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方针和政策，



鼓励他们为抗战作出贡献，同时还支持他们同四大家族官僚资产阶级的斗争。如四川的卢作孚、康心远、胡子昂、吴晋航、余名钰、古耕虞，云南的缪云台，上海的刘鸿生、吴蕴初、胡厥文，天津的李烛尘等，周恩来、董必武和王若飞都曾找他们谈过话和开过座谈会。一九四〇年十月十四日，周恩来、王梓木在曾家岩五十号会见重庆聚兴诚银行经济研究室主任高兴亚，告以中国共产党对待民族资本家的政策，并希望他利用工作职务之便把西南民族资本家联合起来，以与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相对抗。一九四二年一月十日，周恩来参观了余名钰的渝鑫钢铁厂，写下“没有重工业，便没有民族工业的基础，更谈不上国防工业。渝鑫钢铁厂的生产已为民族工业打下了初步的基础”的题词，以资鼓励。一九四五年，周恩来还曾应邀出席了重庆五个工商实业团体（中国工业协会、西南实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国货厂商联合会、中国生产促进会）的“星期五聚餐会”，详细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于发展经济的政策。一九四四年，由王若飞出面在重庆上清寺“特园”组织了一次民族资本家的座谈会，出席者三十余人。上述活动，在国统区的民族资本家中产生了极为深刻和广泛的影响。当时四川的大猪鬃商古耕虞，在解放后回忆周恩来同他们座谈时的情景说：“每次会见总理，他总是虚怀若谷地听取我们介绍工商界的情况和意见，也总是那样海人不倦地耐心向我们讲解当时的形势和革命的道理，特别是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四大家族掠夺人民的真相，使我们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在这些座谈中，总理对当时我们民族工商业的处境

十分同情；同时勉励我们要在困难中努力发展生产，支援抗战”。<sup>①</sup>

通过上述工作，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工商业界中的影响，使愈来愈多的民族资本家消除了对中共的误解，进一步靠拢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了抗战后期国统区的民主运动。一九四四年九月四日，重庆工商、金融、百货、教育文化界联合发表对时局主张，提出九项建议，主张真正实行民主，与民更始。十二月二十四日，重庆市商会、中国全国工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生产促进会、中国西南实业协会、国货厂商联合会等六个工商业团体联合发表对时局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政府实施宪政，厉行民治，並呼吁全国团结一致，争取胜利。

### （五）

南方局坚决执行和贯彻了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同广大知识分子建立了紧密的联系，把他们组织到抗日和民主的伟大斗争中去。

首先，南方局在国统区组织和领导了各种文化团体，把大批进步的和中间的知识分子吸收到这些组织中。抗战初期，由中国共产党实际领导和由郭沫若具体负责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聚集了大批知识分子，成为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一九四〇年九月，第三厅撤销，设立文化工作委员会，它在南方局的领导和支持下，克服了重重困难，为团结知识分子和发展国

<sup>①</sup> 《回忆南方局》（一）

统区进步文化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华全国文艺抗敌协会，聚集了国统区大批文学艺术家，老舍、茅盾等许多进步作家都是该会的成员。一九三九年春，周恩来和潘汉年在重庆领导成立了“自然科学座谈会”，林学家梁希、心理学家潘菽、农学家金善宝、气象学家涂长望等近二十位科学家参加了该组织。一九四四年，在我党领导下，竺可桢、李四光、任鸿隽、丁燮林、严济慈等一百多名科学家又发起组织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筹备会”。次年七月一日，正式成立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这在当时相当散漫而又沉寂的科学界中，真可谓新军突起，使人耳目一新，其影响迅速传到国内外。“中国科协”对团结广大科学工作者，使他们摆脱国民党的蒙蔽和欺骗，起了一定作用。一九四四年冬，“自然科学座谈会”的部分成员又与许德珩、税西恒等共同组织了“民主科学社”，这即是“九三学社”的前身，它的成员比“中国科协”更为广泛，不止限于自然科学工作者，还包括了社会科学工作者等。

其次，南方局通过各种形式，如开座谈会、纪念会和过生日等，对知识分子进行革命前途的教育，启发他们的觉悟，引导他们走上斗争的道路。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邹韬奋、陶行知、马寅初、洪深、翦伯赞、邓初民、侯外庐、沈志远等都是周恩来、董必武经常接近的朋友。特别在皖南事变后的十个月内，周恩来每晚都到民生路新华日报门市部二楼会见各方面朋友，同他们谈团结抗战，谈历史、谈哲学、谈戏剧，把抗战救国的大道理，同来访朋友的专业结合起来。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九日，在重庆文化界

纪念鲁迅逝世四周年晚会上，周恩来指出，“鲁迅先生是一个伟大的文化战士”，他有四大特点值得我们学习：“（一）律己严；（二）认敌清；（三）交友广，（四）疾恶如仇”。周恩来鼓励知识分子“学习鲁迅精神，认清我们的唯一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並加强文艺界的团结，用嘴及笔一齐打击敌人！”<sup>①</sup>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六日，举行了纪念郭沫若五十大寿及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大会。周恩来亲自布置了这个大会的筹备工作。他指出，为郭沫若祝寿是一场重大的政治斗争；为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举行纪念会又是一场重大的文化斗争。通过这次斗争，我们可以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国民党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周恩来指定阳翰笙负责建立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筹备组和起草一个通知，发至成都、昆明、桂林、香港等地党的地下组织。在纪念会上，周恩来高度评价了郭沫若，指出“他不但是革命的诗人，也是革命的战士，无论从他的著作和行动里，都燃烧着火一样的感情。他对祖国、对民族的热爱，是值得我们效法的”。此外，在南方局领导下，还给茅盾、洪深、梁希等祝寿。这些在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对知识分子的进步活动坚决予以支持，並给他们指出正确的斗争方向。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重庆的话剧演出非常活跃，许多著名作家、有经验的导演和著名的演员都参加了话剧演出活动。《新华日报》发表了许多评论文章，支持了这个活动。郭沫若在这时撰写的《棠棣之

<sup>①</sup> 重庆《新华日报》，1940年10月20日。



花》、《孔雀胆》和《屈原》等优秀剧作，深得群众好评。在《屈原》一剧上演前，周恩来同郭沫若一起研究修改剧本；上演后又组织南方局文委写了剧评。郭沫若的剧，周恩来的剧评，成为团结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推动民主运动，打击国民党法西斯的犀利武器。中国著名经济学家、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马寅初，目睹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利用权势，巧取豪夺，囤积居奇，大发横财，置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而不顾的罪恶行径，十分愤慨。他在重庆公开发表演说，严正抨击蒋介石政权的战时经济政策，揭露孔祥熙、宋子文的贪污行为，要求重征发国难财者的财产充实抗日经费；他还讥讽蒋介石“不是民族英雄，而是家族英雄”。蒋介石为此恼羞成怒，将马寅初监禁于息烽。一九四一年三月，重庆大学商学院师生在马寅初六十寿辰之际，掀起了“祝寿活动”，以示抗议。南方局派潘梓年代表《新华日报》出席了“祝寿大会”，送去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联名书赠的“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的寿联。《新华日报》也赠送了“不屈不淫徵气性；敢怒敢言见精神”的寿幛。

第四、对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给予保护，在生活上予以救援。技术精湛、学有专长的留法高级工程师郝贵林，不远万里返回祖国参加抗日战争，却因不容于权贵，报国无门，生活无着，竟然缢死在重庆街头的公共厕所里，抱恨终天。《新华日报》为此撰文揭露国民党的腐朽及黑暗，唤起大后方知识分子的觉醒。“皖南事变”后，国民党蒋介石加紧打击和迫害进步知识分子。南方局指示文委、地下党

及有关同志及时把重庆、桂林等地的左翼文化人和左派民主人士茅盾、宋之的、章泯、叶以群、草明、艾青等疏散到香港和延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方局又指示廖承志、张友渔想方设法将疏散到香港的文化人转移到安全地区。对生活困难的知识分子，南方局予以接济。一九四一年二月，著名戏剧家洪深，因不堪忍受国民党的政治压迫和生活煎熬，一家三口服毒自杀。郭沫若闻讯即带医生赶去抢救。南方局派人前去慰问，并在经济上给予资助，使他一家摆脱困境，转危为安。

由于党在国统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贯彻执行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从而为坚持抗战和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抗战时期的统战工作，有着深远的影响，它为解放战争时期、甚至建国以后的统一战线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建国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许多朋友，都是我们在抗日战争时期结识的老朋友。他们在与中共的长期接触中，逐渐认清了中国的前途，认清了只有跟着中国共产党才有出路，他们不仅同我们一道参加了民主革命，而且同我们一道参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 东北抗日联军组织序列

金字钟 常好礼

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各族人民的抗日武装。它曾经发展到十一个军，三万余人。其中第一至第七军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创建的，其发展经历了反日游击队、人民革命军和抗日联军几个阶段；第八至第十一军，是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号召下，由我党直接帮助而编成的友军部队。在东北抗日联军各军的发展过程中，其组织建制变化比较大。这里，我们把抗联各军各个发展阶段的组织序列整理如下，供参考。

## 一、抗日联军的建立和发展

### (一)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

第一军的前身为盘石反日游击队(初建时称“盘石工农反日义勇军”)和海龙反日游击队(初建时称“海龙工农义勇军”)。

#### 盘石反日游击队

一九三二年六月四日，在中共盘石中心县委的领导下，盘石反日游击队(“盘石工农反日义勇军”)在盘东三道岗建立，共三十余人。

队长：张振国

政委：杨君武(杨佐青)

第一分队 队长：杨君武(兼)

第二分队 队长：孟洁民

政委：李红光

第三分队 队长：何××

政委：朴××

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三日，游击队进行改编，建制是：

总队长：孟洁民

政委：张振国

政治部主任：王 耿

参谋长：满汉生

第一大队 队长：初向臣

第二大队 队长：李万和

第三大队 队长：刘克文

第四大队 队长：李××

一九三二年秋，中共满洲省委派杨靖宇到盘石整顿队伍，将盘石工农反日义勇军改称为中国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亦称盘石游击队）。其建制如下：

总队长：孟洁民

副总队长：王兆兰

政委：初向臣

辖第一、二、三大队和教导队。

一九三三年一月，游击队连续两次遭到反动地主武装的袭击。中旬，杨靖宇从海龙巡视回来，再次对游击队进行整顿，整顿后的建制是：

总队长：袁德胜

政委：杨靖宇

参谋长：李松波

教导队：队长：李明海

政委：李红光

第一大队 队长：朴翰宗



政委：严弼顺

第二大队 队长：韩 浩

政委：朴四平

第三大队 队长：王××

政委：王绍文

全队共二百三十人。

### 海龙反日游击队

一九三二年八月，在中共海龙中心县委的领导下，建立海龙反日游击队（称“海龙工农义勇军”）。一九三三年一月，杨靖宇代表中共满洲省委对海龙工农义勇军进行整顿，并改称为中国红军第三十七军海龙游击队。其建制如下：

队 长：王仁斋

政 委：刘三春

###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

一九三三年九月十八日，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以盘石反日游击队为基础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共三百余人，建制如下：

师 长：杨靖宇

政 委：杨靖宇（兼）

参 谋 长：李红光

政治部主任：宋铁岩

第 一 团 团 长：袁德胜

政 委：朴翰宗

参谋长：李松波

第 三 团 团 长：韩 浩

政 委：曹国安

政治保安连 连 长：崔山好

政 委：程斌（后叛变）

少年营 营长：朴洁

一九三三年九月，海龙反日游击队和抗日军苏（剑飞）营被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南满第一游击大队，属独立师序列。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七日，经中共南满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正式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建制如下：

军长：杨靖宇

政委：杨靖宇（兼）

参谋长：朴翰宗

政治部主任：宋铁岩

第一师 师长：李红光

副师长：韩浩

政委：李红光（兼）

政治部主任：程斌（后叛变）

第三团 团长：韩浩（兼）

第五团 团长：李明海

第六团 团长：刘仁凤

政委：王世奎

第二师 师长：曹国安

政委：曹国安（兼）

参谋长：李松波

政治部主任：张云志（后为朴四平）

第八团 团长：李永浩

教导团

一九三五年春，苏剑飞牺牲，南满第一游击大队改编为第二教导团，杨俊恒任团长，周建华任政委，直属军部。到一九三五年末，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发展到一千六百余人。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

一九三六年七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正式改编为东北抗

日联军第一军，全军三千余人，建制如下：

军 长：杨靖宇  
政 委：杨靖宇（兼）  
参 谋 长：安光勋（后叛变）  
政治部主任：宋铁岩  
秘书处 长：韩仁和  
军需处 长：严弼顺  
军医处 长：徐 哲

第一师 师 长：程斌  
政 委：程斌（兼）  
参 谋 长：李敏焕  
政治部主任：胡国臣  
军需部 长：韩震

第二师 师 长：曹国安  
政 委：曹国安（兼）  
参 谋 长：李希敏  
军需部 长：朴顺一

第三师 师 长：王仁斋  
政 委：周建华  
参 谋 长：杨俊恒  
政治部主任：柳万熙

教导团 团 长：许国有  
政 委：安昌勋  
政治部主任：黄海峰

## （二）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

第二军的前身是延吉反日游击队、和龙反日游击队、汪清反日游击队和琿春反日游击队。

### **延吉反日游击队**

一九三二年夏，在中共延吉县委领导下，先后建立了老头沟游击队、依兰沟游击队、海兰区游击队 and 花莲里游击队。一九三三年一月，以上述各游击队为基础，正式成立延吉反日游击大队，共一百三十余人。

大队长：朴东根

政委：朴洁

### **和龙反日游击队**

一九三二年六、七月间，在中共和龙县委领导下，先后在开山区、大砬子、平岗等地建立了几支游击队。以此为基础，于一九三三年三月正式建立和龙反日游击大队，共八十余人。

大队长：张承汉

政委：车龙德

### **汪清反日游击队**

一九三二年三月，在中共汪清县委领导下，在小汪清成立一支游击队；同时，县委派李光等十余人到救国军中参加战斗，组成别动队。同年十一月，别动队以及由安图转来的反日游击队与汪清游击队合并，正式编成汪清反日游击大队，共九十余人。

大队长：梁成龙

政委：金银植

### **琿春反日游击队**

一九三二年六月，中共琿春县委在烟囱砬子建立岭南反日游击队，队员三十余人。同年七月，又在大荒沟成立岭北反日游击队，队员三十余人。一九三三年四月，岭南、岭北两支游击队合编建立琿春反日游击队总队，岭北反日游击队为第一大队，岭南反日游击队为第二大队。

总队长：孔宪琛

政委：朴泰益



##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

一九三四年三月，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以上述四支游击队为基础，组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共六百四十余人。

师 长：朱 镇（后叛变）

政 委：王德泰

第一团 团长：朴东华

政委：崔学哲（后为林水山）

第二团 团长：孟昭祥

政委：金洛天

第三团 团长：赵春学（后为方振声）

政委：

第四团 团长：何德润

政委：金 铉

一九三五年三月增建独立团，直属师部。

一九三五年五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正式建立，全军一千二百余人，建制如下：

军 长：王德泰

政 委：魏拯民

参谋长：刘汉兴

政治部主任：李学忠

教导队

第一团 团 长：安奉学（后叛变）

政 委：周树东

第二团 团 长：张泉玉

政 委：曹亚范

第三团 团 长：方振声

政 委：

第四团 团长：侯国忠  
政委：王润成  
游击大队 大队长：钱永林  
政委：金山浩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军扩编为二个师，辖四个团：

军长：王德泰  
政委：魏拯民  
参谋长：刘汉兴  
政治部主任：李学忠

第一师 师长：王德泰（兼）  
政委：李学忠（兼）

第一团 团长：安奉学  
政委：周树东

第二团 团长：张泉玉  
政委：曹亚范

第二师 师长：刘汉兴（代理）  
政委：王润成  
参谋长：陈翰章

第四团 团长：侯国忠  
政委：王润成（兼）

第五团 团长：方振声  
政委：

#### 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

一九三六年三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全军达三千人，建制如下：

军长：王德泰  
政委：魏拯民  
参谋长：刘汉兴

政治部主任：李学忠

第一师 师 长：安奉学  
政 委：周树东  
参谋长：朴德范（后叛变）  
政治部主任：吕伯歧（后叛变）

第二师 师 长：史忠恒（陈翰章代理）  
政 委：王润成  
参谋长：陈翰章

第三师 师 长：  
政 委：曹亚范

### （三）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

第三军的前身为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

#### 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

一九三二年六月，中共满洲省委派军委书记赵尚志到巴彦游击队工作。一九三三年初巴彦游击队失败后，赵尚志又到义勇军孙朝阳部队工作。在孙部瓦解时，赵尚志等七名同志脱险，并找到珠河中心县委。县委立即派六名同志与赵尚志会合。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在中共珠河中心县委的领导下，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在珠河县（今尚志县）三股流建立，队员十三人。

队 长：赵尚志

政委兼党支部书记：李福林

#### 哈东支队

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九日，以珠河游击队为基础，吸收一部分义勇军和反日山林队正式编成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全队四百五十余人。建制如下：

司 令：赵尚志

政 委：张寿箴（李兆麟）

参谋长：梁佐术

第一总队 队长：赵尚志（兼）  
队副：王甲三  
政委：张寿箴（李兆麟）  
第二总队 队长：黄英（后叛变）  
队副：梁佐术（兼）  
政委：马宏力  
第三总队 队长：曹德生  
队副：李靖远  
政委：韩光

一九三四年秋，哈东支队进行整编，建制是：

司令：赵尚志

政治部主任：韩光

经济部长：金策

秘书长：侯启刚

副官处：关化新

第一执法处

第二执法处

第一大队 队长：李熙山（许亨植）

第三大队 队长：张连科

第五大队 队长：姜德山

第七大队 队长：刘海涛

第九大队 队长：李树林

政治保安队

少年队

骑兵团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八日，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以东



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为基础，编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辖第一师（独立师），共五百余人。

军 长：赵尚志

政治部主任：冯仲云（后张敬山接任）

司令部直属：秘书处

副官处

军需处

执法处

稽查处

少年连

保安营

第一师（独立师） 师长：赵尚志（兼）

第一团 团 长：刘海涛

政治部主任：李福林（后金策接任）

第二团 团 长：李熙山（后王惠同接任）

政治部主任：张寿箴（后赵一曼接任）

第三团 团 长：张连科

政治部主任：马宏力（后李泰接任）

一九三五年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扩编为六个团：

第一团 团 长：刘海涛

政治部主任：张寿箴

第二团 团 长：王惠同

政治部主任：李熙山

第三团 团 长：张连科

政治部主任：侯启刚

第四团 团 长：郝贵林

政治部主任：金策

第五团 团 长：尹庆树

第六团 团长：孟广才  
政治部主任：祁占海

此外，山林队“明山队”（祁致中部）与三军共同作战，编为延方游击团。

一九三五年底到一九三六年七月间，第三军在原有六个团的基础上逐步扩编为六个师。

第一师 师长：刘海涛  
政治部主任：张寿箴

第二师 师长：吴兴才  
政治部主任：关化新

第三师 师长：张连科  
政治部主任：李熙山

第四师 师长：郝贵林  
政治部主任：金策

第五师 师长：景永安  
政治部主任：蔡近葵

第六师 师长：张光迪  
政治部主任：兰志渊（后叛变）

### 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

一九三六年八月一日，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为基础，正式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全军六千人，建制如下：

军长：赵尚志  
政治部主任：张寿箴（一九三七年六月任）  
司令部直属：秘书处  
副官处  
执法处  
经济处  
稽查处

- |     |                           |
|-----|---------------------------|
| 第一师 | 师 长：刘海涛<br>政治部主任：李熙山      |
| 第二师 | 师 长：关化新<br>政治部主任：吴兴才      |
| 第三师 | 师 长：张连科<br>政治部主任：吴景才      |
| 第四师 | 师 长：郝贵林<br>政治部主任：金策       |
| 第五师 | 师 长：景永安<br>政治部主任：蔡近葵      |
| 第六师 | 师 长：张光迪<br>政治部主任：兰志渊（后叛变） |
| 第七师 | 师 长：于海云（叛变处死）<br>政治部主任：张德 |
| 第八师 | 师 长：考风林（后叛变）              |
| 第九师 | 师 长：李振远<br>政治部主任：雷炎       |
| 第十师 | 师 长：高士魁（后叛变）              |

另有政治保安师，师长为常有钧，直属军部。

一九三八年六月，根据北满省委第八次常委会的决定，抗联第三军进行缩编。由金策任军政治部主任。此时因赵尚志赴苏联未归，军长暂缺。北满临时省委决定，在没有军长的情况下，由张寿篈以北满反日联合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资格领导三军工作。部队缩编为四个师和一个警卫团。

- |     |                      |
|-----|----------------------|
| 第一师 | 政治部主任：周庶范            |
| 第二师 | 师 长：兰志渊<br>政治部主任：吴景才 |
| 第三师 | 师 长：李熙山              |

政治部主任：常有钧

第四师 师 长：陆希田（后为陈云升，陈后变节离队）

政治部主任：于保合（代理）

警卫团 团 长：姜立新

政治部主任：朴吉松。

一九三九年五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组成，这时三军改编为三个师，属三路军序列：

军 长：许亨植（李熙山）

政治部主任：张兰生

第一师 师 长：杨洪杰

副师长：任永富

政治部主任：周庶范

第二师 师长兼政治部主任：李泰

第三师 师 长：张光迪

政治部主任：赵敬夫

#### （四）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

第四军的前身是东北抗日救国游击军和密山反日游击队。

#### 东北抗日救国游击军

一九三三年一月四日，根据中共绥宁中心县委的指示，在救国军瓦解之际，李延禄率原救国军补充团脱离救国军，成立了反日游击总队。队长李延禄，政委孟泾清，参谋长张建东。同年一月下旬，李延禄联合救国军王毓峰、冯守臣等部，在宁安南部的孟寡妇屯召开大会，宣布成立抗日救国游击军，共八百余人。建制如下：

军 长：李延禄

一 团 团长：杨太和



二 团 团长：王毓峰  
三 团 团长：史忠恒  
步兵营 营长：李凤山  
骑兵营 营长：冯守臣  
游击支队 队长：李延平

根据中共吉东局的提议，为便于联合其他部队共同抗日，救国游击军于一九三三年七月改称东北人民抗日革命军。

### 密山反日游击队

在中共密山县委领导下，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日密山游击队建立。

队 长：张宝山（后朱守一接任，朱牺牲后由张奎接任）  
副队长：崔成浩

### 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共密山县委扩大会议决定，密山反日游击队与人民抗日革命军合并组成抗日同盟军司令部，李延禄为总司令。不久即正式成立抗日同盟军第四军，共二百三十余人。建制如下：

军 长：李延禄  
政治部主任：何忠国  
参谋长：胡伦

一团 团长：杨太和  
政委：李守忠  
二团 团长：张奎  
政委：何忠国（兼）  
三团 团长：苏衍仁（报号“小白龙”）  
政委：邓化南  
独立营 营长：文荣（报号“打东洋”）  
卫队连 连长：崔成浩

一九三五年九月，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扩编，饶河反日游击大队加入四军序列，为第四团。扩编后的建制是：

军 长：李延禄

政治部主任：罗英（代理，后叛变）

参谋长：胡伦

一团 团 长：杨太和

政 委：李守忠

二团 团 长：张奎

政 委：郑洪涛

三团 团 长：苏衍仁

政 委：邓化南

四团 团 长：李学福

副团长：朴振宇

参谋长：崔石泉

政治部主任：李斗文

五团 团 长：李天柱

六团 团 长：孙成仁

七团 团 长：宫显庭（后叛变）

独立第五旅 旅长：郭德福

#### 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

一九三六年三月，抗日同盟军第四军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全军二千一百余人。建制如下：

军 长：李延禄（李延平代理，一九三六年三月李延

禄奉调入关，一九三七年九月李延平正式接任军长）

政治部主任：黄玉清

副 官 长：朱鸿恩

军部秘书：彭施鲁

- 一师 师 长：李延平  
政治部主任：黄玉清（兼）
- 二师（原四团改编而成）  
师 长：郑鲁岩（后叛变，被处决）  
副师长：李学福  
政治部主任：崔荣华  
参谋长：崔石泉
- 三师 师 长：李天柱
- 四师（一九三六年七月编成）  
师 长：刘振国  
政治部主任：朴德山

一九三六年九月，在抗联四军二师的基础上建立抗日联军第七军。四军遂将原第三师改编为第二师，另以原三师七团为基础，建立新三师。师长为宫显庭（后叛变）；一、四师建制不变。

#### （五）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

第五军的前身是绥宁反日同盟军。

##### 绥宁反日同盟军

一九三四年二月，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周保中以原救国军边区军一、三连和工农义务队为基础，并吸收救国军柴世荣旅、傅显明团、王毓峰团、王汝起团各部以及八道河子农民自卫队等，组成“反日同盟军办事处”，办事处主任为周保中，正式组成了绥宁反日同盟军，共五百余人。同年三月，办事处改为“反日同盟军联合办事处”，办事处主任仍为周保中。

一九三四年五月，宁安反日游击队建立，亦加入反日同盟军办事处。

##### 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日，反日同盟军改编为东北反日联合军第

五军，全军九百余人，建制如下：

军 长：周保中

副军长：柴世荣

政治部主任：胡仁

参谋长：张建东

第一师 师 长：李荆璞

政治部主任：关书范（后叛变被枪决）

第二师 师 长：傅显明

副师长：姜振荣

政治部主任：李光林

参谋长：陈翰章

#### 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

一九三六年二月，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改编为抗日联军第五军，全军三千余人，建制如下：

军 长：周保中

副军长：柴世荣

政治部主任：宋一夫（后叛变）

参谋长：张建东

第一师 师 长：李荆璞

副师长：姜振荣

政治部主任：关书范（后叛变）

参谋长：张镇华

第二师 师 长：傅显明

政治部主任：李光林（后季青接任）

参谋长：陈翰章

军部教导队



## (六) 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

第六军的前身是汤原反日游击队

### 汤原反日游击队

一九三二年十月，中共汤原中心县委建立了红军三十三军汤原民众反日游击队，但不久遭土匪袭击而失败。后几经挫折，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在中共汤原中心县委的领导下，创建了汤原反日游击队，共五十余人：

队长：戴鸿宾

参谋长：李仁根

青年队长：裴敬天

中年队长：“高丽王”

一九三四年秋，根据中共满洲省委指示，汤原游击队改编为汤原民众反日游击总队，建制如下：

总队长：戴鸿宾

政委：夏云杰

参谋长：李仁根

一中队 队长：戴鸿宾（兼）

指导员：裴敬天

二中队 队长：马治纲

指导员：黄福堂

三中队 队长：张传福

指导员：徐文彬

到一九三六年初，汤原反日游击总队发展到七百余人。

###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

一九三六年一月，汤原民众反日游击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建制如下：

军长：夏云杰

政治部主任：张寿箴（代理）

参谋长：冯治纲（一九三六年六月任职）

一团 团长：王秀芝

二团 团长：戴鸿宾

三团 团长：冯治纲

四团 团长：张传福

### 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

一九三六年六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扩编为八个团。九月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建制如下：

军 长：夏云杰

政治部主任：张寿箴（代理）

参谋长：冯治纲

军部秘书长：李德言（即黄吟秋）

一团 团 长：刘俊峰

政治部主任：李云峰

二团 团 长：王秀芝

政治部主任：尹锡昌（后为关树勋）

三团 团 长：张传福（后由陈绍宾代理）

政治部主任：徐文彬（代理）

四团 团 长：戴鸿宾

政治部主任：马德山

五团 团 长：郭复东

政治部主任：周云峰（后叛变）

六团 团 长：黄名新

政治部主任：尹锡昌

七团 团 长：王居选

政治部主任：吴玉光

留守团 团 长：耿殿君

军直属保安连 连长：李凤林

一九三七年二月，根据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决定，六军进行整编。全军约二千人，建制是：

军 长：戴鸿宾

政治部主任：兰志渊（后叛变）

参谋长：冯治纲

秘书长：黄吟秋

第一师 师 长：马德山

政治部主任：徐光海

第二师 师 长：张传福（张养病，由陈绍宾代理）

政治部主任：张兴德

第三师 师 长：周云峰

政治部主任：周云峰（兼）

第四师 师 长：戴鸿宾（兼）

政治部主任：吴玉光

一九三七年四月，增编第五师，师长刘振声，政治部主任高玉斌、参谋长邱金海。

### （七）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

第七军的前身是饶河反日游击队（当时称“饶河农工义勇军”）。

饶河反日游击队（饶河农工义勇军）

一九三三年四月，在中共饶河中心县委领导下，饶河农工义勇军在饶河县大叶子沟建立：

队 长：崔石泉

政治部主任：金文亨

一九三三年六月，饶河农工义勇军编入饶河县境内高禹山所部救国军第一旅，为特务营，建制如下：

营 长：金文亨

参谋长：崔石泉

政治员：朴振宇

第一连 连 长：金龙化

第二连 连 长：朴英根

副连长：许资善

第三连 连 长：许成在

手枪队长：金东天

一九三四年二月，特务营脱离救国军，改编为饶河民众反日游击大队：

大队长：李学福（后为张文楷）

参谋长：崔石泉

政治员：朴振宇

一中队 队长：崔石峰

二中队 队长：许资善

手枪队 队长：金东天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八日，根据中共吉东特委的指示，饶河民众反日游击大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四团，共二百五十余人。建制如下：

团 长：李学福

副团长：朴振宇

政治部主任：李斗文

参谋长：崔石泉

党委书记：吴福林

一 连 连长：金龙化

二 连 连长：王宗昌

三 连 连长：张文清

四 连 连长：王青山



保安连 连长：崔勇进

一九三六年三月，四军四团扩编为抗日联军第四军第二师，  
辖四、五两个团，仍属四军序列。

师 长：郑鲁岩（后叛变）

副师长：李学福

参谋长：崔石泉

政治部主任：崔荣华

四团 团 长：李学福（兼）

副团长：姜向平

五团 团 长：邹其昌

一九三七年三月，部队扩编，新编第六、七、八团：

六团 团 长：王凤林

七团 团 长：贾瑞福

八团 团 长：君子人

### 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第四军第二师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  
第七军，全军七百余人，建制如下：

军 长：陈荣久（后李学福接任）

参谋长：崔石泉

经济部长：董墨林

副官长：毕玉民

一师 师 长：陈荣久（兼）

二师 师 长：李学福

参谋长：金铎

三师 师 长：景乐亭

政治部主任：金铁宇

参谋长：阎敬山

一九三七年一月，七军召开党代表会议，决定对部队实行改

编。改编后的建制和干部情况是：

因陈荣久牺牲，由崔石泉担任军党委书记兼代理军长；

第一、第二师合编为第一师，李学福任师长；

原第五团扩编为第二师，邹其昌任师长，云鹤英任政治部主任。景乐亭仍任三师师长，李一平任三师政治部主任。

到一九三八年夏，七军发展到八百八十余人。

#### (八) 东北抗日联军第八军

一九三四年三月，土龙山反日暴动后，以谢文东、景振卿为首组成民众救国军。同年十月，民众救国军失败，余部在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帮助下重整队伍。一九三六年九月，该部被改编为抗日联军第八军，共三百多人。

军 长：谢文东（后叛变）

副 军 长：滕松柏（后叛变）

政治部主任：刘曙华

参 谋 长：于光世

#### (九) 东北抗日联军第九军

该军前身为李华堂所部自卫军混成旅第二支队。一九三四年末，该支队遭到重大损失，后在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的帮助下于一九三七年一月改编为抗联第九军。

军 长：李华堂（后叛变）

参谋长：李向阳

一师 师长：郭 成

二师 师长：王振祥（后叛变）

三师 师长：张学忠（后叛变）

### (十) 东北抗日联军第十军

该军前身为汪雅臣为首的反日山林队“双龙”队。一九三六年初，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将该队改编为人民革命军第八军，辖五个团和一个保安连，共八百余人。

军 长：汪雅臣

政治部主任：侯启刚

参 谋 长：王维宇

一九三六年冬，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决定将该军改编为抗日联军第十军，十军辖十余团，共一千余人。

军 长：汪雅臣

副 军 长：齐云禄（齐叛变被处死后由张忠喜接任）

政治部主任：王维宇

### (十一) 东北抗日联军第十一军

该军前身为祁宝堂（祁致中）为首的反日山林队“明山”队。一九三六年一月，在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和中共勃利县委帮助下改编为抗日联军独立师，建制如下：

师 长：祁致中

政治部主任：富振声（后为周庶范）

后来，独立师经整顿建三个旅，直属师部。

第一旅 旅 长：张建国

政治部主任：金正国

第二旅 旅 长：胡文权

政治部主任：祁致中（兼）

第三旅 旅 长：姜宝林

政治部主任：李学忠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在北满联军总司令部和抗联第三、第五

军帮助下正式建立抗联第十一军，共一千五百余人：

军 长：祁致中

政治部主任：金正国（后为张显德）

参 谋 长：白云峰（后叛变）

随军学校教育长：于树平（于天放）

一师 师长：李景荫（代理）

第一旅 旅长：张建国

政治部主任：金正国（兼，后于天放接任）

第二旅 旅长：胡文权

政治部主任：王济舟

第三旅 旅长：姜宝林

政治部主任：李学忠

## 二、东北抗日联军各军组成三个路军

中共满洲省委撤销后，先后成立了中共南满省委、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和中共吉东省委。为了便于对抗联部队统一领导，东北抗日联军各军先后编为第一路军、第二路军和第三路军。

### 第 一 路 军

一九三六年七月，南满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抗日联军第一、第二军合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下辖三个军。

总司令兼政委：杨靖宇

副总司令：王德泰

政治部主任：魏拯民

第一军 军 长：杨靖宇

政 委：杨靖宇（兼）

参谋长：安光勋（后叛变）

政治部主任：宋铁岩



	军需处长：严弼顺
	军医处长：徐哲
第一师	师长：程斌（后叛变） 政委：程斌（兼） 参谋长：李敏焕 政治部主任：胡国臣（后叛变）
第二师	师长：曹国安 政委：曹国安（兼） 参谋长：李希敏
第三师	师长：王仁斋 政委：周建华 参谋长：杨俊恒 政治部主任：柳万熙
教导团	团长：许国有 政委：安昌勋 政治部主任：黄海峰
第二军	军长：王德泰 政委：魏拯民 政治部主任：全光（后叛变）
第四师	师长：安奉学（后叛变） 政委：周树东 参谋长：朴德范
第五师	师长：陈翰章（代理） 政委：王润成 参谋长：陈翰章、张东奎
第六师	师长： 政委：曹亚范

一九三八年八月以后，第一路军实行新的建制，取消军的番

号，在总司令部下组成一个警卫旅和三个方面军，建制如下：

总司令兼政委：杨靖宇

副总司令兼政治部主任：魏拯民

第一方面军 指 挥：曹亚范

政治部主任：伊俊山

参谋长：尹夏太

第二方面军 指 挥：

政治部主任：吕伯歧（后叛变）

参谋长：林水山（后叛变）

第三方面军 指 挥：陈翰章

副指挥：侯国忠

参谋长：朴德范（后叛变）

警 卫 旅 旅 长：方振声

政 委：韩仁和

## 第 二 路 军

一九三七年九月，中共吉东省委决定成立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筹备委员会，十月十日，成立第二路军总指挥部，下辖五个军。第二路军建制如下：

总指挥：周保中

参谋长：崔石泉

### 第四军

一九三七年九、十月间，抗联四军进行改编，建制是：

军 长：李延平

副 军 长：王光宇

政治部主任：黄玉清

一师 师 长：张相武

政治部主任：黄玉清（兼）

二师 师 长：宫显庭（后为王毓峰）  
政治部主任：曲成山（后叛变）

### 第五军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军共三千余人，建制如下：

军 长：柴世荣

政治部主任：宋一夫（后叛变）

一师 师 长：关书范（后叛变）

二师 副师长：张镇华  
政治部主任：季 青

三师 师 长：李文彬  
政治部主任：王效明

一九三七年末，吉东省委对五军干部作了部分调整：

军 长：柴世荣

政治部主任：宋一夫（后叛变）

一师 师 长：关书范  
政 委：颜 志

二师 师 长：宋一夫（兼）  
副师长：张镇华  
政治部主任：季 青

一九三八年二路军西征前，五军二、三师的干部又有调整。

原二师政治部主任季青调任三师政治部主任，二师政治部主任由陶净非接任。

原三师政治部主任王效明调任二路军总指挥部参谋处长。

### 第七军

一九三八年一月，在下江特委的领导下，七军调整了领导，改编了队伍，全军一千五百余人，建制如下：

军 长：李学福

政治部主任：郑鲁岩（后叛变）

参 谋 长：崔石泉  
一师 师 长：王汝起  
政治部主任：何可人  
二师 师 长：邹其昌  
三师 师 长：景乐亭  
政治部主任：刘廷仲

一九三九年，吉东省委下江三人团重新调整七军干部：

党 委 书 记：崔石泉  
军 长：景乐亭（代理）  
政治部主任：王效明  
参 谋 长：崔石泉

一师 师 长：王汝起  
政治部主任：彭施鲁  
二师 师 长：邹其昌  
三师 师 长：隋长青  
政治部主任：鲍 林

## 第八军

军 长：谢文东（后叛变）  
副 军 长：滕松柏（后叛变）  
政治部主任：刘曙华  
参 谋 长：于光世

一九三七年六月，八军在原有四个团的基础上扩编为六个师；  
全军二千余人。

一师 师 长：秦秀权（后叛变）  
二师 师 长：关文吉（后叛变）  
三师 师 长：王自孚（后叛变）  
政治部主任：金根  
四师 师 长：尤连生



政治部主任：柴荫轩

五师 师 长：董宪章（后叛变）

六师 师 长：赵庆祥（后赵福山继任）

### 第十军

军 长：汪雅臣

副 军 长：张忠喜

政治部主任：王维宇

此外，救世军（王荫武部）、义勇军（姚振山部）亦归二路军领导。

一九四〇年四月，第七军改编为第二路军第二支队；五军三师余部在姜信太率领下亦编入二支队。

支 队 长：王汝起

副支队长：刘雁来

政 委：王效明

特 派 员：鲍 林

### 第三路军

自一九三八年夏到年底，抗联第三、六、九、十一各军分批西征。西征部队到达嫩海地区后，成立西北临时指挥部，张寿篈、许亨植（李熙山）分别为政治、军事负责人。一九三九年初，西北临时指挥部将西征部队统一编为第一、二、三、四支队和第一、二两个独立师。

第一支队，由三军四师八团一部分和六军一师六团组成。

支 队 长：张光迪

政治负责人：陈 雷

第二支队，由六军二师十一团、十二团组成。

支队长：冯治纲

政 委：冯治纲（兼）

第三支队，由六军三师八团，六军教导队组成。

支队长：王明贵

政委：于天放

第四支队，由六军教导队一部分、六军十九团、九军二师组成。

支队长：雷炎

政委：关树勋

参谋长：郭铁坚

独立一师，由原三军一师组成。

师长：任永富

政治部主任：周庶范

独立二师，由原三军三师七团及十一军一师一部分组成。

师长：马光德

政治部主任：朴吉松

此外，主力部队西征后，下江留守部队由下江特委书记高禹民和六军一师政治部主任徐光海负责。

一九三九年四月，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第二次执委会决定，以第三、六、九、十一各军为基础，建立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及其总指挥部。同年五月，第三路军正式建立。

总指挥：张寿篈

政委：冯仲云（一九四〇年四月任）

总参谋长：许亨植

与此同时，为加强三、六军领导，决定：

许亨植任三军军长，张兰生任三军政治部主任；

张寿篈兼任六军军长，冯仲云兼任六军政治部主任。

一九四〇年春，抗联第三路军各部分别改编为第三、六、九、十二四个支队：

第三支队 支队长：王明贵

政 委：赵敬夫（赵牺牲后由高禹民继任）  
 参谋长：王 钧  
 第六支队 支队长：张光迪  
 副支队长：高继贤  
 政 委：于天放  
 第九支队 支队长：边凤祥  
 政 委：周云峰  
 参谋长：郭铁坚  
 第十二支队 支队长：戴鸿宾  
 政 委：许亨植（兼）

### 三、东北抗日联军组建抗联教导旅

一九四〇年冬以后，第一、第二、第三路军各部队陆续进入苏联境内进行整训。一九四二年八月，抗联整训部队组建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亦称苏联远东方面军步兵第八十八旅）。

旅 长：周保中

政治副旅长：张寿篈

参谋长： 崔石泉

第一教导营 营长： 政 委：

第二教导营 营长：王效明 政 委：姜信泰

第三教导营 营长：许亨植（后王明贵继任）

政 委：金 策

第四教导营 营长：柴世荣（后姜信泰继任）

政 委：季 青

通讯连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中共党史资料 第十八辑

作者 =

页数 = 1 0 0 0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目录  
正文